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當打工變成體驗西方：

台灣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的研究

Experience The West:

A Study on Taiwan Working Holiday Maker in Austria

張慧慈

Hui-Tzu Chang

指導教授：曾嬿芬 博士

Advisor: Yen-Fen Tseng,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July 2014



謝辭

四年，換來這樣一篇論文，看來是值得了吧。從踏入清大人社系，再到台大社會所，我無法說明社會學帶給我的苦痛與感動；也無法讓社會學概念與思維從我生活中消失。我想，這就是學以致用吧。記得從小到大唯一堅定我繼續向學的信念來自於家庭。出身於工人階級又重男輕女的家庭，母親從小只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把書念好，或做到黑幫老大。兩者相比之下，前者似乎對於女性而言比較容易做到，於是，我向著前方的目標孜孜不倦的努力，為的是不陷入工人階級女性的泥淖中，在工廠與家庭之前浮沉。

但曾經，我以為一切都是上輩子沒有做好事，沒有積陰德的結果。

然而，進入人社系，上了第一堂社會學的課，了解了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個人時，我覺得我解脫了，從過往罪己的想法中解放了，這是社會學帶給我的感動。於是埋首於社會學相關書籍，反駁新聞中對事件的刻板描述，也試圖為我的過去做項論文，為的是讓更多像我一樣背景的人也能接觸社會學，也能知道這一切不完全是自己的問題，因此，我繼續就讀研究所。我的初衷是想要研究一個有趣的問題引發他們的興趣，然後用淺顯易懂的文句讓他們了解社會學的思考邏輯。

研究所時期，我發現一切都變了，變得更加困難。生活困難、學術研究困難，所有的所有都變成了困境。我被困在之中，我發現過往我身處的環境已經不像自己所想的一樣，身邊的朋友也不再是畢業後會進入工廠，然後進入婚姻的人。而是畢業後會找到白領工作，或者乾脆出國深造的中產階級。我試著找回自己的初心，因此我以女工為題，試圖解答過往困住我的問題。但遇到了瓶頸。

輾轉過了兩年，正當想要放棄之時，我找到了一個切入點：青年問題，所以我以近年來吵得沸沸揚揚的打工度假為題。當我決定研究這個題目後，我才意識到身邊有如此多的朋友曾經去過澳洲打工。他們與一般人不同，帶著更多的自信與正向，並且琅琅上口澳洲的點點滴滴。但並非單純的回憶，而是帶著一種莫名的成就與正面在描述澳洲打工度假生活。為何一趟澳洲打工度假，可以讓一群人



帶回滿滿的自信與成就感？究竟打工度假的人到底在想什麼？而且打工度假似乎是去澳洲從事低階勞動工作，那為什麼我的朋友們會有如此大正面的改變？這樣的現象讓我將題目轉彎，從勞動變成動機與結果。完成了這份研究，我認為我已經實現了我的初衷，至於內容那是後話

研究的過程緩慢又匆匆，回首可能早已忘了是如何度過，但唯一不能忘的便是這一路上幫助過、鼓勵過、責罵過以及經歷過得一切人事物。放眼整個求學過程，我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媽媽。只有國中學歷的她，一直不斷告訴我們讀書的重要性，她在我們小時候曾經審吃檢用，偷偷訂過一整套百科全書，藏在衣櫃深處不讓爸爸拿去丟掉，為的就是讓我們能夠吸收更多資訊。當時，我們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爸爸出門的時候，我們可以翻開衣櫃，隨手挑起一本書，就著微弱的燈光偷偷看著沒有注音的絢爛世界，一切都是如此的刺激。國小畢業後才發現，我們只要有什麼地方有疑問，媽媽就會在工廠下班後，或是假日時，去學校拜託老師教會她，好回來教內向害羞的我們。到了國中，媽媽日以繼夜地加班工作，幫我們報名補習班，讓我們不落人後。印象中想要玩具沒有實現過半次，但關於教育的東西總是沒有落空的。上了高中，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媽媽帶我去工廠工作了兩個月。那兩個月，讓我感受到工廠的勞動條件之惡劣，也使我明瞭，我唯一能翻身的途徑唯有讀書，否則就是進入工廠，結婚，然後過著跟我媽媽一樣的人生。媽媽一生最遺憾的就是沒能讀書，她功課很好，但家境很差。所以她賺錢讓我們上學，雖然我們必須要半工半讀，申請許多獎學金，但至少我們以後是可以坐辦公室的，是識字與有智慧的，媽媽常常得意說。這一切都是到了大學以後，當我得知我同學與我天差地遠的家庭背景後才瞬間明白，明白我媽媽為我們犧牲了多少，即使我們仍舊常常吵架。因此，我這本論文第一個要獻給以及感謝的就是我的媽媽。當然還有我的弟弟妹妹，渟渟，讓我了解技職院校對打工度假的態度。祐銘，你煮的便當讓我高中生活能夠更加輕鬆。家瑜，總是答應我任何請求，有你們這群家人真好。



媽媽讓我知道讀書的重要性，而姚人多老師使我感受到了師生情。姚老師是我社會學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心中最實踐社會學的老師。大一時，興奮的進入社會學的世界，卻發現經典不只是經典，也是需要經濟能力的比較點。但姚老師卻私底下詢問協助若是同學印製書籍，並且從未拒絕替我寫推薦信。當時，曾經有一個獎學金我來不及送件，因此我打開了推薦信。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一樣，只是噴洩出來的是希望與溫情。裡面字字句句充滿著關心，以及通過給予我這項獎學金，具體能夠使社會階級流動之類的話語。即便出了社會，老師的關照依舊不減，真心感謝清大人社系讓我有這個機會認識到姚人多老師，不枉此生。

曾嬿芬老師，甄試我進台大社會所，後來又是我的老闆兼指導的氣質美女教授。老師在我最徬徨的時候，看著我寫的兩頁不成調的想法，收了我當指導學生，給予的不僅是學術上的支持、實質上的助理工作以及人生方向的鼓勵。最幸福的時刻便是與老師討論關於年輕人在想什麼，中國有什麼吸引人的，或是一些生活周遭的趣聞。雖然我總是要畢業，但能夠當老師一輩子的學生，我想是我研究所生涯中最值得的一個收穫。

我在甄試前完整看完的便是跨國灰姑娘，當年抱著小粉絲的心態選了藍佩嘉老師的課程，之後也有幸跟著老師做田野，從中學習到了田野觀察以及訪談技巧。記得老師曾經在火車上對我說：妳有一個特別的母親，讓我眼淚差點奪眶而出。在計畫書口試時，老師提醒了我是否忘記當初跟她提到關於打工度假者的社會位置差異，讓我得以在日後將這個重要的概念置放回我的論文。種種回憶，希望以後還能繼續當老師的小粉絲。宏仁老師總是給我最寶貴的建議以及鼓勵，讓我覺得我的論文似乎真的很有趣，一掃論文寫作時的憂傷與低落。雖然一直都沒有機會修讀老師的課程，但通過老師擔任口試委員，我深深覺得成為老師的學生一定非常的幸福。而文蘭老師是相見恨晚，但好險有相見的老師。在老師的課堂上，我找回了對社會學的熱情以及題目。老師無時無刻的關心以及提供的幫助，讓我在研究的路上事半功倍。即使不是老師的學生，老師的關心也依舊不減。



在研究的路上，長期以來一直陪伴我的便是我的朋友們。

晏權，我從高中到現在的好朋友，雖然我們時常吵架，但透過彼此看見了社會的真實與滑稽。湯湯，我大學認識到最值的朋友之一，在英國也不忘繼續鼓勵我，雖然我仍舊無法跟你一起畢業。阿蘇，我回台北的日子，好險有你的陪伴與激勵，我才能跟大家保持聯絡以及繼續努力。阿甲（嘉心），你的眼淚讓我能夠開懷大笑，也讓我感受到你無微不至的體貼與照顧，也恭喜你畢業。沛沛，跟我背景最像的朋友，希望你總有一天能夠重回校園，寫下屬於你的碩士論文。有蓉，到了法國依舊連線，關心我的論文進度，給予非常重要的建議與方向，讓我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會忘東忘西。珮青與apple，我在研究所最照顧我的人，雖然現在一個在日本，一個在臺南，但每當與你們相聚我都感到無比開心。夏咩與崇任，我們曾經是魯蛇三人組，希望可以一起完成碩士學業。雅菱學姐與我一起走過好幾哩路，也帶給我許多深刻的建議與希望。晨碩讓我看到研究可以如何用心以及循序漸進，還有惠文、玉儒、怡馨、上銓、奐怡，感謝你們，R99的朋友。

高中的朋友，小孜，我相信你可以寫出非常棒的論文。佳宜，謝謝你持續的關心以及照顧。咖宏，你是讓我不至於與大學的人斷了聯繫，以及拓展更多朋友的人，謝謝你的打氣與熱情。魚丸，我的好室友，照顧我的生活及提供我訪談的人。雨馨，沒有你我的論文絕對不會完成，我真怕對不起你，也深深感謝著你。鮮果團的各位，DD、豹哥、地瓜、柯草、奕樟，謝謝你們的不離不棄。電台的各位，大禹、小白、之馨、腦大，與你們的聚會就是 empower 的場合。13 與珮瑄是我活力的來源，很開心能在研究所跟你們認識與變熟。曉蝶是最意外的美好，跟你聊天與討論的時光真的很懷念，希望你能幸福。還有我現在的同事們。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受訪者們，雖然不能在這裡說出你們的名字，但沒有你們就沒有這篇論文，希望未來你們一切安好。謝謝，我現在所有的一切。

張慧慈

2014 年 8 月



摘要

本文從臺灣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為研究切入點，試圖瞭解臺灣青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動機與結果。2004 年台澳雙方簽訂打工度假備忘錄，台灣每年數以千計的青年遠赴澳洲打工度假，成為澳洲重要的青年勞動力移入來源，澳洲也成為台灣青年海外工作居留最多的國家。2012 年今週刊關於澳洲打工度假的報導呈現了打工度假的真實樣貌，台勞論述隨之而來。

臺灣青年赴澳洲打工的動機諸多，從經濟層面來看，受到台灣日益惡化的青年勞動市場以及低薪化的影響，相對高薪的澳洲產生經濟上的拉力。從文化層面觀看，現代性與對西方國家的嚮往也推動著臺灣青年赴同屬西方國家的澳洲打工。當這群臺灣青年進入澳洲當地，實際上從事以勞力為主的第一級產業工作時，他們卻以體驗作為論述方式，將辛苦的勞動條件轉化成體驗西方文化的必經過程。

因此，本文試圖從已有工作經驗的澳洲打工度假青年出發，分析其出走的經濟與文化動機。同時分析這群青年如何透過人際網絡與仲介來尋找工作，讓他們能夠順利的留在當地。當打工度假青年在澳洲面臨辛苦的工作環境與明顯被剝削的勞動條件時，他們如何利用體驗作為合理化打工度假行為，進而將就業市場的向下流動，轉變為文化體驗資本的累積，藉以區別出他們與其他人的不同。

關鍵字：澳洲打工度假、遷移動機、現代性、西方體驗、文化體驗資本



Abstract

The “Taiwan-Australia working holiday agreement” was signed in 2004; since then, thousands of Taiwanese youth heading to Australia, and created the major resource of labor force for Australia. Australia has become the country where the most Taiwanese youth working overseas stays. Aiming at Taiwanese youth as working holiday maker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 and results of the phenomenon. In 2012, *Business Today* released the relevant article, and expos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working holiday; after that, the idea of “Tai lau” (Taiwanese labor) was forme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Taiwanese youth choose Australia. Economically, influenced by the deteriorating labor market and low-paid jobs in Taiwan, the well-paid jobs in Australia generate the attraction. Culturally, modernity and the expectation toward West countries motivate Taiwanese youth leave domestic market for Australia. When the so-called WHMs enter the Australia labor market, they are involved into primary sector of economic activity; however, by means of “experiencing the West”, they transfer all the physical hard works to the inevitabl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the West. Therefore, through interviewing the previous WH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motivations. Meanwhile, how the youth find the jobs by social network and agents will also be explained. In shor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plain how the WHMs rationalize the working holiday behavior when facing the hard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exploitation; and moreover transfer the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to cultural experience capital accumulation. Eventually, jus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others.

Key Words: Working Holiday Maker in Austria, Migration Motive, modernity, West Experience, cultural experience capital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 |
|--------------------------|----|
| 壹、前言 | 1 |
| 貳、研究背景 | 2 |
| 參、文獻回顧 | 6 |
| 一、解釋遷移動機 | 7 |
| 二、現代性與文化消費 | 9 |
| 三、前往與留下：遷移行為中的社會網絡 | 12 |
| 四、遷移與社會流動 | 13 |
| 五、遷移的性別化 | 14 |
| 肆、研究設計 | 15 |
| 伍、研究提問與章節安排 | 16 |

第二章 台灣打工度假青年的澳洲夢

| | |
|-------------------------|----|
| 第一節 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規定與狀況 | 19 |
| 第二節 生命的插曲—打工度假 | 20 |
| 一、兩種面向的遷移動機 | 22 |
| 二、加深遷移意願的社會網絡 | 26 |
| 第三節 現代性想像的消費與實踐 | 31 |
| 一、現代性的文化消費形式 | 31 |
| 二、實踐現代性想像 | 37 |



| | |
|---|----|
| 第四節 階層化的現代性追求 | 39 |
| 一、日本：親近的現代性 | 40 |
| 二、西方現代性：初階的澳洲與進階的歐美 | 42 |
| 三、歐美：西方現代性的頂端 | 44 |
| 第五節 小結 | 47 |
| 第三章 社會位置與打工度假經驗 | |
| 第一節 打工度假者的四種類型 | 49 |
| 第二節 富含經濟與文化資本的第 I 類型 | 51 |
| 一、能夠自由選擇首次降落地點 | 51 |
| 二、以度假為主要目的 | 54 |
| 第三節 經濟資本充裕文化資本較缺乏的第 II 類型 | 55 |
| 一、目的導向的首站選擇 | 55 |
| 二、累積文化資本為主要目的 | 57 |
| 第四節 文化資本充足卻缺乏經濟資本的第 III 類型 | 59 |
| 一、低成本高報酬的首站 | 59 |
| 二、打工與度假合而為一 | 60 |
| 第五節 經濟與文化資本相對較低的第 IV 類型 | 61 |
| 一、逐水草與網絡而居 | 61 |
| 二、精心計算下的打工與度假 | 64 |
| 三、最大化工作效益 | 67 |
| 第六節 打工度假者的主觀評價 | 70 |
| 一、傳統 gap year 的仿效：第 I 類型對西方現代性的追求 | 71 |
| 二、積累文化資本：第 II、III 類型的文化向上流動 | 74 |
| 三、體驗即是向上：第 IV 類的升級經驗值累積 | 78 |



| | |
|--------------|----|
| 第七節 小結 | 81 |
|--------------|----|

第四章 遷移經驗的性別化

| | |
|-------------------------|----|
| 第一節 性別文化脈絡下的打工度假者 | 84 |
|-------------------------|----|

| | |
|------------------------|----|
| 第二節 困境轉變為獨立自主的實踐 | 90 |
|------------------------|----|

| | |
|------------------------|----|
| 第三節 台灣性別延伸的身體與婚配 | 96 |
|------------------------|----|

| | |
|--------------|----|
| 第四節 小結 | 99 |
|--------------|----|

第五章 結論

| | |
|----------------|-----|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102 |
|----------------|-----|

| | |
|-------------------|-----|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 106 |
|-------------------|-----|

| | |
|------------|-----|
| 參考文獻 | 108 |
|------------|-----|

| | |
|-------------------|-----|
| 附錄 1 受訪者資料表 | 113 |
|-------------------|-----|

| | |
|-----------------|-----|
| 附錄 2 訪談大綱 | 115 |
|-----------------|-----|



圖目錄

| | |
|-------------------------|---|
| 圖一：國人赴海外打工度假人數統計..... | 3 |
| 圖二：台灣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人數..... | 5 |
| 圖三：2013 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人數..... | 6 |



表目錄

| | |
|---------------------------------|----|
| 表一：開放台灣打工度假之國家比較..... | 4 |
| 表二：國人赴各國海外打工度假人數統計表 | 5 |
| 表三：澳洲打工度假 417 與 462 簽證之比較 | 19 |
| 表四：各國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之學歷 | 33 |
| 表五：四種類型的打工度假者 | 50 |
| 表六：各國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之男女比例 | 83 |



第一章 緒論

壹、 前言

「根據台灣人力仲介業者 yes123 的調查，93%的勞工皆有興趣到國外工作，主要原因在於提供的薪資較高，還可培養全球視野。調查亦發現，中國、美國和新加坡是台灣人最嚮往的三大工作地點。此外，語言和薪水通常是在決定工作地點時的首要考量，18.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期在國外賺的錢是國內的兩倍。」(yes123, 2013/4/10)

打工度假指的是為促進台灣與其他國家青年互動交流與瞭解的政策，申請人之目的在於度假，打工係為使度假展期而附帶賺取旅遊生活費。2004 年，台灣與紐西蘭簽訂打工度假協議，開啟台灣青年赴外國打工之門。一般認知中的打工度假較像是青年背著背包在異國到處遊歷，當旅費殆盡時，便從事短期的打工來賺取日後旅費的行為。「打工」在這裡被想像成從事服務業，例如在度假勝地販賣物品之類接觸人群的工作。多數台灣人認為，打工度假者是以體驗國外生活為主要目的，打工則是為了賺取旅費所需。因此，打工度假者帶回台灣的不只是金錢，而是國際觀、文化歷練以及大幅進步的外語能力。

2012 年 9 月，今周刊的報導敲碎了如夢似幻般的打工度假美景，揭露了隱藏其中的事實。打工度假者多半從事勞力性質的工作，他們每日曝曬在烈日底下採集水果、悶熱的廠房內包裝食材，或者是在低溫的冷凍櫃搬運、切割肉品。終日在農場、工廠內做著單調去技術化的勞動，每個人都待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對大量的農畜產品，幾乎不會也需要開口說話。而且，為了找尋季節性的農場工作，許多打工度假者在農場一待就是一個產季。從季節開始錢、旺季然後淡季，



然後再轉移到下一個農場，重複相同的行為。在工廠工作的人甚至一待就是一年，整日工廠宿舍來回移動。單調且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嚴重工傷的工作環境被披露，台勞論述也隨之而來。

然而，台灣青年打工度假的人數卻不減反增。因此，我在這裡想問的是，打工度假的勞動狀況每況愈下，但台灣每年出國打工的人數卻不斷增加，影響台灣青年選擇出國打工度假的動機為何？又與台灣簽訂打工度假協議的國家越來越多，台灣青年卻大多選擇澳洲。台灣青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人數從 2005 年的 739 人，一路攀升至 2012 年的 22393 人，到了 2013 年更達到了 35761 人之多，顯見澳洲打工度假的真實圖像並未讓台灣青年卻步不前，在被揭露之後反而更多青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然比較各國打工度假的條件後可知澳洲並非最佳選擇，究竟是怎樣的因素讓他們較為偏愛選擇澳洲？台灣青年如何將到澳洲擔任非技術外勞包裝成外國生活體驗的珍貴資源？

貳、 研究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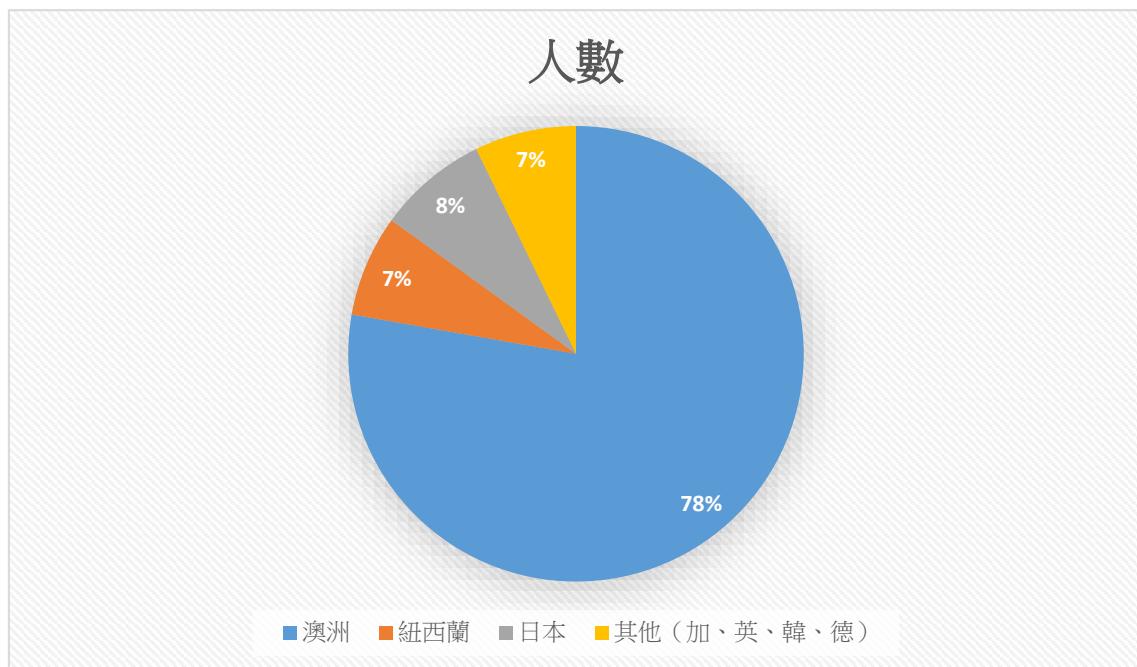
台灣近年來積極與各國簽訂打工度假協議，政府也鼓勵國內青年通過打工度假來擴展國際觀，以壯遊之名輸出台灣 18 至 30 歲的青年。根據外交部統計，台灣申請出國打工度假的人從 1.2 萬人(2004-2007)成長至 6.5 萬人(2008-2012)之多。而前往的國家依數量排序前三名分別是澳洲、日本以及紐西蘭，其中，前往澳洲的人數已突破十萬人，澳洲也成為台灣青年海外工作居留最多的國家。教育部也從 2005 年 7 月開辦青年海外生活體驗專案貸款，提供每位青年最高 12 萬元的貸款，協助台灣青年前往海外生活體驗。由於申請人數超出可借額度，在 2013 年初一度停辦（中國時報，2013/9/21）。青年署針對獲貸人數統計分析，申貸目的以打工度假為最多，佔 77.3%；目的地則以紐澳為主，佔 73.5%。而性別統計上，女性佔 69.5%，非在學人數佔 89% 以上，顯見申請人可能以畢業後前往紐澳



打工度假的人居多，其中女性佔了較多數（國際與兩岸教育司，2013）。以下將對澳洲的打工度假政策的客觀條件、勞動環境等做背景性的介紹。

打工度假各國政策之比較

2004 年開始至今，台灣陸續與紐西蘭、澳洲與日本等 11 個國家簽訂打工度假協議。從圖一可以看到，台灣青年赴海外各國打工度假的人數以澳洲居冠，佔了將近八成，其次分別是日本和紐西蘭。加拿大、英國、韓國與德國佔了 0.7 成，顯見國人在出國打工度假的目的地選擇上偏好澳洲。



圖一：國人赴各國海外打工度假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外交部

而從表一我們可以比較各國的客觀條件。從 2004 年台灣與紐澳兩地簽訂打工度假協議為開始，2009 年日本也開放台灣前往打工度假。2010 年，加拿大、德國與韓國也與台灣簽訂打工度假協議。直至 2012 年的英國，與台灣簽訂並確實有打工度假往來的國家為七個。從年齡上來看，加拿大申請年齡限制最寬可至



35 歲。澳洲在人數上無限制，其他六個國家都有人數限制。在停留期限上，除了英國可以達兩年以外，其他國家以一年為限，澳洲則能通過二簽多留一年。欲申請二簽者必須在官方認可之偏遠地區，從事第一級產業並累積工作時間 88 天以上，且申請時年齡必須介於 18 至 30 歲之間且無未成年子女。符合上述資格者，才能在簽證期滿後申請第二次簽證。此外，並非所有國家都有最低時薪以及雇主雇用時間限制，澳洲規定打工度假者只能在同一雇主下工作六個月，且有最低時薪 8-15 元澳幣的限制。其他如紐西蘭跟德國則限制同一雇主下只能工作三個月，紐西蘭、加拿大跟英國才有最低時薪限制。從生活費用來看，亞洲的日本與韓國且兩國所需的生活費用相對於歐美國家而言較低，最多一個月二萬元台幣便能維生。歐美國家中以加拿大與紐西蘭較低，平均三萬台幣即可。英國跟德國兩國生活費則偏高，平均四萬到七萬不等。

表一 開放台灣打工度假之國家比較

| 開放台灣打工度假之國家 | | | | | | | |
|--------------|-------|-------|-------|-------|-------|-------|-------|
| 國家 | 紐西蘭 | 澳洲 | 日本 | 加拿大 | 德國 | 韓國 | 英國 |
| 開放時間 | 2004 | 2004 | 2009 | 2010 | 2010 | 2010 | 2012 |
| 年齡 | 18-30 | 18-30 | 18-30 | 18-35 | 18-30 | 18-30 | 18-30 |
| 名額/年 | 600 | 無限 | 2000 | 1000 | 200 | 400 | 1000 |
| 停留期限 | 1 | 1 | 1 | 1 | 1 | 1 | 2 |
| 二簽 | X | O | X | X | X | X | X |
| 最低時薪 | 13.5 | 8-15 | 無 | 10.25 | 無 | 無 | 6.08 |
| 同一雇主 工作限制 | 3 | 6 | 無 | 無 | 3 | 無 | 無 |
| 生活費用 預(月) | 25000 | 30000 | 15000 | 25000 | 50000 | 15000 | 40000 |

資料來源：澳洲移民局

從表二則可看出台灣申請打工度假之目的地中，以澳洲人數居多，至 2011 年已有 5 萬多人前往。其他國家除了因為人數限制，雖年額滿但人數相對澳洲較少外，韓國與德國兩個國家均未滿人數限制。



表二 國人赴各國海外打工度假人數統計表

| 國人赴各國海外打工度假人數統計表 | | |
|------------------|--------|---------------|
| 國家 | 人數 | 統計期間 |
| 澳大利亞 | 51,761 | 2004-2011/12 |
| 日本 | 5,200 | 2009/6-2012/8 |
| 紐西蘭 | 4,800 | 2004-2012/9 |
| 加拿大 | 2,672 | 2010-2012/9 |
| 英國 | 810 | 2012/1-8 |
| 韓國 | 332 | 2011/1-2012/8 |
| 德國 | 240 | 2010-2012/9 |

資料來源：改編自外交部

圖二顯示前往澳洲從 2005 年的 739 人一路成長到 2013 年的 35,761 人（此人文數包含二簽），幾乎年年以倍數成長。累計至 2013 年 6 月為止，台灣已有超過 10 萬名 18 歲至 30 歲的青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澳洲也成為台灣青年工作居留最多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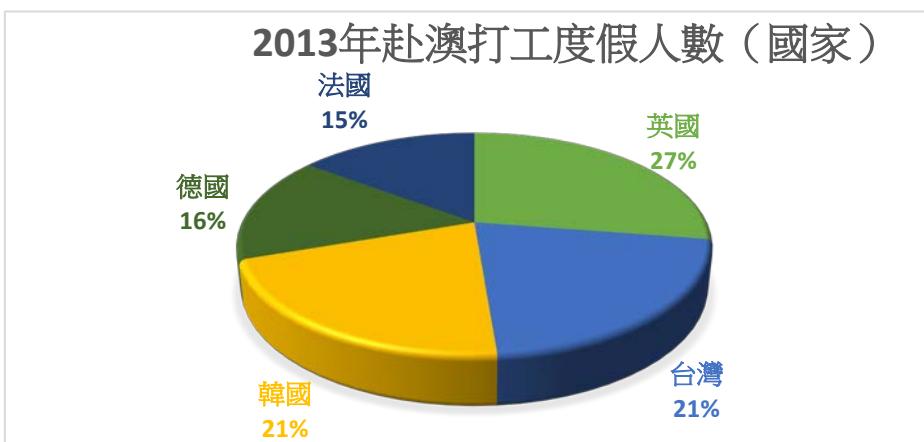
圖二：台灣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人數

資料來源：澳洲移民局

然而，2012 年《今周刊》一篇〈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屠夫〉的報導訪談了三個澳洲打工度假青年，通過他們的敘述，台灣民眾首次瞭解澳洲打工度假的實際樣貌。多數打工度假者每日曝曬在大太陽底下採集水果、或是在悶熱無空調的鐵皮屋裡包裝食材以及在容易失溫的冷凍櫃裡搬運肉品。無數類似於廉價外勞



工作條件的場景顛覆了以往一般印象裡對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也讓台灣民眾懷疑台灣青年究竟是為了體驗生活而遠赴澳洲打工度假，還是為了賺取高額時薪才去澳洲做台勞。但台勞論述並未使台灣青年降低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想法，根據澳洲移民局在 2013 年公布的報告書的統計，澳洲政府在 2012 年 6 月到 2013 年 6 月發給台灣青年 35,761 張簽證。初次前往澳洲的簽證數量高達 28,599 張，較去年成長了五成；二簽則有 7,162 張（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2013）。從圖三中可見，台灣在 2013 年首次以 35,761 人超越了韓國的 35,220 人，一舉躍升澳洲海外打工度假來源國第二名，僅次於英國。顯見澳洲打工度假的勞動狀況以及隨之而來的台勞論述不僅沒有嚇退台灣青年，反而吸引了更多台灣青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



圖三：2013 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人數

資料來源：澳洲移民局

參、 文獻回顧

在台灣，出國打工度假已經盛行多年，然而，國內對於打工度假、打工遊學以及短期打工的相關研究卻十分有限。除此之外，大部份的研究處理的是個人選擇與適應的問題，較少對於整體圖像進行討論。既有研究中，關於參與動機的研究結果顯示其參與動機的多元（吳家瑋，2008；呂昭瑩，2009；巫佳芬，2010）。另一些研究則分析空間流動導致的跨文化衝擊如何影響個人認同（彭詩



容，2010）；此外，還包括面對文化衝擊所採取的適應策略研究（劉佩昀，2013）。亦有不少研究針對人格特質進行分析，將他們進一步分類（劉怡伶，2012；杜億婷，2012）。以及打工度假經驗如何讓自我成長與能力提升（林耿平，2009；呂美慧，2011；張巧臆，2012）。綜觀以上國內相關碩博士論文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參與動機上的研究雖然強調其多元，但仍舊是以個人為出發，將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選擇視為個人的理性選擇，而未能有更多討論。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也指出打工度假經驗能夠促進個人自我成長與能力提升，但內容所涉及的提升均偏向抽象的心態改變或是人生態度的調整等心理層面的成長。且當期滿結束回台後，打工度假經驗對於求職的影響幾乎沒有著墨。既有研究多半聚焦於被研究者的人格特性或是其遷移動機，對於他們為何願意接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留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並未有任何討論。對他們勞動狀態的討論的缺漏，將會使他們的接受與留下成為必然而非經過思考後的決定。雖然既有研究有涉及打工度假者對於打工度假經驗的分析，但這裡的分析集中在個人成長上，卻未討論他們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打工度假經驗，忽略了打工度假者也是處在特定的結構之中。

綜合而論，目前對出國打工度假的研究缺乏將此現象放在遷移社會學的知識脈絡來分析，人之所以會遷移，不只是個人經由理性思考後做出選擇而已，還必須分析個人所屬的經濟與文化結構，如此才能更深入探討遷移的動機。因此，我將從經濟與文化動機切入，分析其選擇澳洲的原因為何。在他們面臨惡劣的工作環境時，他們如何說服自己留下來。以及他們經歷了短暫的社會流動後，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打工度假經驗。

一、解釋遷徙動機

人們會從一個國家遷徙到另一個國家，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生活會更好（Stalker, 2002:31）。在解釋人們為何會遷徙時，最簡單的是「推拉理論」。推拉



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會遷徙，是被貧窮驅動的；而移入國的勞動力短缺以及相對較好的生活環境則成為移入主因。然而，從許多例子上看來，我們會發現菲律賓並非全世界 GDP 最低的國家，但國內的人民卻大量的遷徙到外國工作。而希臘人也並未大舉遷入盧森堡這個國民平均所得高出兩倍的國家。因此，推拉理論有其侷限性，無法全面地解釋人們為何會移動。Stalker(2002)在研究中指出，每一個選擇遷徙的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經驗與動機。個體因素強調每一個移民都具有理性，對於其遷徙的選擇會做謹慎的評估，選擇最輕鬆的路走（待遇最好、工作好找）。結構因素則強調個人的遷徙並不完全基於理性，而是被鑲嵌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之中。輸出國內的人民可能因為貧窮、缺乏工作機會甚至是文化迫害（比如性傾向）而選擇離開。而輸入國內相對於穩定的經濟型態、季節工的缺乏以及較友善的文化（比如性別）環境，都可以是吸引這些移民的原因。

現代化也成為驅動人們移動的動力。因為全球媒體大量出現，以及網路跟運輸的技術日益增高。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只要「打開電視」或是「看電影」，其他工業化國家理想生活的圖像便會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會讓人想到這些國家追求「更好的生活」。Sassen(2006)主張國際遷徙行為的出現並非導因於單一因素。相反地，是受到許多經濟或地緣政治的過程下交錯影響的產物，在這個過程也將許多相關國家連結在一起。因此，如果想要理解遷徙問題，必須將政府、個人、媒體以及國家內的整體人民，是「如何、為何、何時參與此移民的過程」(Sassen, 2006:1)。

驅動遷移的經濟誘因與文化因素

台灣青年選擇遠赴澳洲打工的動機各有不同，但高於台灣數倍的薪資卻是許多人選擇到澳洲而不到其他國家的最大原因。探索性資料顯示，當受訪者面臨同樣屬於南太平洋國家且工作條件與環境相差不遠的紐西蘭時，除了紐西蘭有名額



限制外，薪資相對於澳洲較低也是他們選擇澳洲的原因之一。而同樣所屬英語系國家，英國相對澳洲來講更高額的生活費也是讓打工度假者卻步不前的主要原因。許多台灣青年選擇放棄既有的工作或者於大學剛畢業時出國打工或工作的主因是台灣的低薪化。從主計處公布的統計中可以得知，台灣 30-34 歲以及 40-44 歲者的收入均不如 16 年前，顯示薪資凍漲多年。曾嬿芬（2014）認為，近年台灣的遷移者出現一種新的類型，資淺或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因為台灣薪資水準低迷以及就業市場的侷限，找工作也傾向前往中國。而到歐美深造並取得學位的台灣青年，當他們回亞洲工作時，也是以中國為首選，並不願回到台灣。

勞動力之所以會跨國遷移，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輸出國的貧窮形成推力，而輸入國的高薪資便成為強大的拉力，驅動著這些打工度假者前往澳洲淘金。因此，澳洲高額的薪資驅動著台灣青年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對多數的台灣打工度者而言，經濟誘因是出國的主要動機。但地主國與母國之間的薪資落差只是型塑出國決定的一樣必要(necessary)而非充分(sufficient)的條件(Massy et al, 1998:175，引用自藍佩嘉)。藍佩嘉(2008)在其研究中發現菲籍移工大多不是來自窮鄉僻壤，而是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城市及都會邊緣地區。在金錢壓力和經濟貧困之外，還有其他中介因素影響了移工的決定。這些中介因素包括了母國社會對成就、探索等概念的建構，以及在後殖民、全球化的脈絡中所型塑的對於現代性的想像（藍佩嘉，2008:177）。而台灣青年到澳洲打工度假除了賺取高出台灣數倍的薪水外，對於國外生活的想像與現代化西方文化的憧憬可能才是真正驅使他們離開台灣的原因。

二、 現代性與文化消費

「體驗國外生活」是外交部與部分台灣打工度假者對打工度假這項行為所做的結論，而國外生活我認為正是一種在全球化下對國外的現代性想像。阿帕度萊



(Arjun Appadurai)認為全球化現象是複雜的和變動的政治經濟樣態，其核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之間的非互斥關係（Appadurai，1990）。阿帕度萊認為科技在這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舉了電影、電視、小說、旅行等等為例，認為這些科技物都是全球化重要的媒介。特別是電影和小說反映出了當代的社會現象與集體想像，這些想像與全球化及跨國現象息息相關（Appadurai，1991）

Appadurai(1988)徵引 Pico Iyer 的例子來說明亞洲對於西方的渴望。Iyer 在他的亞洲之旅中，發現菲律賓人十分熱愛美國流行音樂，美國流行音樂在菲律賓相當普及以外，許多菲律賓人在傳唱流行樂時，對於其中的神韻以及曲調詮釋的精闢入裡，甚至比多數美國人唱的更好。但菲律賓人的生活與歌曲所來自的美國生活相差甚遠，形成一種十分扭曲的現象。因此 Appadurai 用這個例子來強調如果有一種稱為全球化系統存在於當代社會，那它的表現形式在亞洲將會偽裝成對西方事物的被動接受，而且可能是無止盡的渴望碰觸到西方事物。

近年來 Gap year 在大專院校頗廣為流傳，影響不少台灣青年。「Gap year」指的是歐洲青年在高中畢業要進入大學前，會離開舒適圈到國外體驗及探索世界。台灣青年大多是在大學時期透過學校講座或相關青年活動接收到這樣的資訊。所以，大學畢業到進入職場這段時間，便成了台灣人 Gap year 最好的時機，而「到國外生活一陣子」這樣盛行於歐美國家的青少年文化，也成為當代台灣青年追求的理想人生樣貌。然而，出國留遊學所需花費的金額甚高，並非所有人都負擔得起。到國外工作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能力可勝任，打工度假便成了相對簡單且可體驗國外生活的最佳途徑。

然而，選擇打工度假作為體驗國外生活的文化動機，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消費形式，這種消費形式以休閒的形式實踐。休閒作為一種階級性的文化消費，是起源於 19 世紀後半葉的有閒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幾乎不用從事生產性工作，也輕視生產勞動，他們以禁止勞動和炫耀性消費作為保持身份的必要條件（Veblen，1899）。20 世紀初，這樣的休閒概念普及到一般勞工大眾，休閒成為



一項義務，也成了某種程度現代化的指標。到了當代，對於「正確的」休閒方式有新的見解，強調休閒必須要消費、花錢度假甚至出國旅遊。因此，休閒是一種現代社會才會出現的議題，需要勞工大眾擁有相對穩定的薪資才能推動，且被越來越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活動（張晉芬，2011）。

上層階級將休閒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而中產階級模仿這樣的行為，形成了一種對於休閒的中產階級式消費方式。旅遊成為了中產階級為了炫耀自己的階級地位的消費方式，中產階級把旅遊當作是一次接受教育的經歷，而不僅是一次放鬆休假（朱敏，2010）。這樣的旅遊形式，變成了一種「體驗」異國生活的方式。旅遊必須獲得些什麼，而這些獲得是以「體驗」這種方式得來的，體驗成了一種定義這群人的文化體驗資本。Bourdieu(1984)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來分析優勢階級地位如何建立與鞏固。文化資本是指將知識或思想形式作為一種資本，用來建立身份與權力的合法性，並幫助優勢階級獲得其所欲想的職業地位。文化資本以個人舉止、品味(taste)以及學歷三種形式展現，用以區隔他者與凝聚階級意識。一種源於經濟不平等所形成了權力與支配關係，透過文化消費的模式進而確保及正當化。品味(taste)成為了分類的形式，通過文化的消費，不僅分類了群眾，也維持了社會差異。因此品味成了一種階級的標示，區分出了不同階級所應有的文化消費。雖然打工度假者與留學生擁有的經濟資本有差異，但對打工度假進行文化消費所獲得體驗經驗與休閒品味，卻使他們在主觀評價上認為自己與其他擁有出國能力的中產階級青年擁有相同的文化體驗品味。

我認為可能因為打工度假者自我認知上以為自己正在進行文化消費，並且累積了足以提昇品味的文化體驗資本，所以才安於從事低階勞力性工作。勞動經驗與轉換為文化體驗資本的過程是如何運作的，其與現代性之關連為何，也是我想要在研究中釐清的。



三、前往與留下：遷移行為中的社會網絡

幾乎沒有人會在預計前往的目的地沒有人脈的情況下動身，即使沒有足夠的人脈，也可以透過仲介保障在目的地的住處以及工作。Massy(1988)指出網絡形式可能是國際遷移的重要結構作用過程。網絡理論強調國際之連續性、開放性的移民資訊，通過親友跟來自同一社群這樣的人際網絡，直接或間接的保證遷移的成功。剛開始出發的移民可能有許多原因驅動他們前往目的地，但人數越來越多，對於當地的消息也日漸豐富時，擴大的移民網絡將會降低遷移的成本與風險，進而使移民的數量有所上升。這種由移民組成的網絡，可以具體的提供給後續移民者關於移入地的政治和文化資訊，能夠達到實質意義的移民流動（Massy, 1988；邱淑雯，2003）。Boyd(1989)則將遷移理解為一種社會行動，認為移民不是單獨做決定，而是整個家庭成員一起共同分擔。而移民的過程是更多因素互動後所得的結果，政治經濟結構往往是透過社會關係來影響個人的移民行為。而網絡關係如同移民自身的社會資本，移民可以透過網絡獲得海外工作的機會，並且因為有網絡，他們會更有意願進行遷移(Boyd, 1989; Gurak & Caces, 1992)。移民網絡的形成十分複雜，Boyd(1989)認為在研究移民網絡時，必須將性別觀點加入，進而再思考移民網絡內各種不同的影響變數與關係是否會有性別差異。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關係是可以被商品化後拿來販賣的（藍佩嘉，2000），像是仲介角色的出現。當人脈網絡成效不彰或無法發揮效果時，仲介便會進入。當仲介出現之時，仲介會以既有的社會網絡不停擴大再生產過程，完成對於利潤的追求（在王宏仁、張書銘，2003）。全球化之下，勞工遷移是通過人力仲介公司進行的，它們是移入國勞動體制彈性化的結果(Antonio Tujan Jr. , 2006:9)。

然而，仲介有時並不只有仲介勞動力，也可能深化種族歧視或是刻板印象。曾嬿芬在研究中指出，每個國家的移民政策要區分移民的階級並且設立不同的移



民管道，都需要正當性。而此正當性建立在階級主義上。當國家在核發資格時，歡迎經濟社會地位高的外國人，而不希望低階的藍領移民留下。誰可以成為我們以及誰可以進入我國，便成為一個帶有廣義階級意識的判斷（曾嬿芬，2006）。遷移的階級並非僅指經濟地位的不同位階，而需將其國家納入全球排序。

四、遷移與社會流動

Rhacel Parrenas(2001)對移居在洛杉磯及羅馬的低階菲律賓家務移工的研究中指出，移工在移居的國家中感受到社會階級向下流動。藍佩嘉(2008)台灣菲籍家務移工的研究中，也同樣發現她們到台灣追求更高薪資的同時，也面臨了社會地位下降的問題。她們認為從事海外家務工作只是短暫的妥協犧牲，這樣的犧牲讓她們可以預期自己與子女可以成功向上流動，或是移動到更高層級的國家工作。

華勒斯坦在其歷史的資本主義（Historical Capitalism）一書中指出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基本上是一個尋求更低成本的勞動力的過程。他提出了「半無產階級化」(semi-proletarianization)這一概念分析為何在此過程中，資本家願意雇用半無產階級化的家庭中的工人勝過於無產階級化的家庭中工人(Wallerstein, 1983 : 27)。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半無產階級化的人—也就是擁有生產工具的農夫—因為同時具有農夫跟工人的身分，而甘於更低的薪資。因此，台灣打工度假者是否因為同時具有背包客與勞工這雙重身份，使得他們能夠接受在台灣可能不列入考慮的低階勞力性工作，以及這樣的工作經驗如何轉化為他們體驗生活的重要資源，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之一。



五、遷移的性別化

正如研究背景指出，到澳洲工作的亞洲打工度假者多半為女性，因此遷移與性別的關連在理解上述遷移動機與網絡維持時，需要特別關注。遷移具有選擇性，不同的個人對於遷移的機會反應相當不同，這個反應常常因為性別而有所差異(Sassen, 1999)。過往對於遷移的研究以男性為主，忽略了遷移男性背後的女性，或者乾脆將女性視為男性遷移的附屬品，並未深入討論女性遷移經驗。「將女性放進來」成為最初解決此項問題的方法，然而，雖然將女性置入遷移社會學的研究中可以補充女性的遷移經驗，但著重研究女性遷移者的同時，也讓男性經驗去性別，反而邊緣化女性的遷移經驗（Pierrette Hondagneu-Sotelo, 2003）。為了修正這樣的分析所造成的偏誤，研究者將性別放入分析脈絡中，將男性與女性視為一組相對、流動的社會建構（藍佩嘉，2007:229）。另一方面，由於早期的女性研究多半將女性視為同質的群體，忽略了她們也是來自不同的國家、種族與階級等等面向，扁平化了這群女性遷移者。因此近期的研究也將性別放入父權體制、資本主義與異性戀霸權等等權力關係的結構內。通過分析權力交織下的性別影響，對於遷移中的性別差異也有了更進一步的探索。

對於女性而言，通往遷移的路上障礙通常比男性多，一方面遷移一開始需要一些資金投入，女性比男性缺乏這樣的經濟資源；另一方面，大部分地主國需要自外國引進勞力補充多為男性的工作(比如公共建設、營建業)。然而，台灣女性遠赴澳洲打工度假的比例仍高。那是由於女性遷移的動機除了著眼於經濟資源增加之外，也會希望藉由收入增加以提升性別關係中的權力位置，改變她們原本的性別位置。從動機上來看，個體藉由移動來獲得更好的生活，鄉村移動到城市，或者是移動到他國尋找美好的未來。其移動的動機可以是經濟層面的，菲籍移工移動到台灣從事家務工作，或者是商品化的跨國婚配等等，都是從經濟上出發，企圖賺取更多的經濟資本以及改善家庭狀況。因為收入增加，女性能夠藉此提升原



有性別關係中的權力位置。Kibria(1990)針對美國費城低收入戶越南移民的研究發現，費城的越南女性移民的社群網絡，在斡旋經濟資源以及調停夫妻爭執上發揮了莫大的效果。但雖然社群網絡上女性有力量與男性抗衡，但她們仍支持越南式的父權體制，並未因此走向獨立自主。

對女性而言，遷移往往也會改變生活型態，比如藍佩嘉的研究指出，菲律賓籍的女性移工在「結婚之前出去看看世界」，除了可以延緩進入婚姻，更可脫離母國生活與父權家庭的想望（藍佩嘉，2008）。遷移可能讓已婚婦女從無酬的家庭重擔中解脫(Rhacel, 2001)；也可能使單身女性擺脫父母的控管以及成為探索異國的手段(藍佩嘉，2007)。所以，我們也可以推論，相對的自由也帶來了婚配對象的多元選擇(比如與外國人交往或結婚)。

肆、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打工度假者出國的動機以及如何討論他們的打工經驗。因此本研究以質性訪談為主，試圖以受訪者對於自身打工度假的描述與詮釋，來探討他們為何選擇澳洲作為出國打工度假的目的地。而他們到了澳洲以後，面對當地艱困的勞動環境以及惡劣的勞動條件，他們又為何選擇留下。當他們回來以後，對於自身打工度假經驗賦予怎樣的意義，我認為以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能夠得到他們對於打工度假經驗的主觀描述與評價。

受訪者方面，主要以立意抽樣為主，主要訪談對象以有過工作經驗的受訪者為主，少數為無工作經驗者。我認為出國打工前有過工作經驗的打工度假者，由於他們有離開工作崗位的經驗，在面對其親朋好友對其打工度假之目的的疑問時，所提出的理由與詮釋可能也會比剛從學校畢業的打工度假者更多。因此，我通過周遭朋友找尋已有工作經驗的打工度假者，並且用滾雪球的方式找尋其他類似的受訪者。此外，我也訪問了幾位剛從學校畢業或是不完全是以打工度假為主



的受訪者。然而，由於主要以滾雪球方式尋找受訪者，所以不容易訪問到完全在工廠、農場或是其他特殊領域工作之台灣青年，可能會有抽樣偏誤。受訪者的打工時間涵蓋 2008 年到 2014 年，試圖比較不同時間點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的經驗，特別是金融海嘯與清大屠夫事件前後的差別。本研究正式訪問了 17 位受訪者，9 位受訪者是大學畢業，8 位是技職院校。年齡介於 25 至 34 歲，現行規定為 18 到 30 歲的青年即可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但台灣多數青年在高中畢業後便直接進入大學，因此受訪者年齡座落在大學畢業的 22 歲以上。在性別比例上，受訪者中的男性為 7 名，女性為 10 名。男性受訪者的比例較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在打工度假中，女性與男性的比例大約是 7：3，女性數量明顯多於男性。二是男性受訪者的拒訪率頗高，女性幾乎不會拒絕訪談，也因此受訪者以女性居多。最後，目前已完成訪談的受訪者大多已有工作經驗，在訪談的過程中，比起尚未有工作經驗的打工度假者，這群有工作經驗的打工度假者傾向使用更多的描述來向我證明從打工度假內有所斬獲。

伍、研究提問及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對研究主題「澳洲打工度假」先做現象描述，接著對打工度假做全面性的背景介紹與比較。背景介紹之後，耙梳遷移研究中關於動機、現代性、文化、人際網絡、階級及性別等相關的文獻。同時提問了最主要的三個問題，首先是台灣赴海外打工度假的人數年年增加，驅動打工度假者出國的動機為何？而這些打工度假者在面對眾多國家可供選擇時，為何大多選擇澳洲？其次是當澳洲真實的勞動狀況被披露後，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人數不減反增，打工度假者鍾情澳洲的原因為何？最後是當澳洲打工的勞動狀況每況愈下，諸多類似非技術低階外勞的工作為何未能使他們卻步，反而成為其將這些經驗包裝成外國生活體驗的珍貴資源，究竟他們是如何合理化這些經歷的？他們的社會



位置與性別是如何在其中作用？通過這三個問題，本研究將為大家揭示台灣青年之所以會出國打工度假的文化與現代性驅動力，以及異質性的個體其性別與階級如何在其中運作著。因此，第二章將焦點放在分析打工度假者選擇澳洲的動機上，通過分析這些動機，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與現代性如何影響個體選擇澳洲而不選其他國家。同時，個人的人際網絡如何驅動他們真正起身前往，又如何協助他們在澳洲順利地完成打工度假這件事情。釐清了現代性與文化因素如何促使個人以打工度假為出國的最佳手段以後，第三章進入不同的個體做討論。個人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同，其對於打工度假的動機與目的便不盡相同，而其合理化經歷的敘述也大相逕庭，所以我將從他們對於第一個降落站的選擇的分析開始，先向大家展開不同社會位置的打工度假者的思考方式。承襲著這樣的思考方式，他們是如何運用金錢，這種不同的經濟資本運用方式，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不同的社會位置採取的不同策略，進而這樣的不同如何展現在他們對於工作的挑選與重複上。

此外，不同社會位置的打工度假者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也不盡相同，我將從各個打工度假者對於打工度假的資訊來源以及其他相關訊息著手，分析擁有文化資本的多寡如何在這兩個地方展現，進而開展出異質化的打工度假者。第四章從性別切入，分析赴澳洲打工度假者為何以女性居多，遷移的性別化將形成怎樣的結果，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會如何因為性別化的生涯規劃而做出怎樣的判斷，進而影響到他們/她們在澳洲的去/留決定。



第二章 打工度假者的澳洲夢

本章企圖從赴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論述出發，他們為何選擇打工度假作為出國的手段，分析打工度假與一般的旅遊和留遊學在台灣當代文化中所隱含的不同意義，因此當他們採取打工度假作為出國體驗生活的手段時，同時也展現出打工度假所帶有的文化與現代性。在打工度假目的國家的選擇上，台灣至今已與將近 11 個國家簽訂協議並有正式打工度假往來，但在實際運作上，選擇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卻仍居高不下。透過分析台灣青年為何多半選擇澳洲作為打工度假的居留國，我們同時可以納入經濟與文化層面的動機作考量，同時也將可使我們瞭解全球化下的台灣如何將澳洲與西方現代國家做連結，進而將澳洲打工度假作為一種探索世界且追求成就的方式。

第一節 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規定與狀況

澳洲打工度假政策的前身是 1975 年澳洲與加拿大、英國和以色列之間暫時的遷徙機制。此計畫允許 18 到 30 歲的青年到澳洲學習、旅遊以及工作。2000 年，澳洲政府採行獨立的打工度假系統，只開放給具有協定關係國家。在這套打工度假系統之下，澳洲政府開放 Working Holiday Visa 417 號簽證給台灣，而非 Working and Holiday Visa 462 號簽證。兩者的差異如表三所述，在於 462 號簽證對於學歷和英語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申請人數也有限制。而 417 號簽證不限人數，不限制工作類型且在期限內可自由進出澳洲，且雇主也可以提出臨時延長簽證的要求，若滿足二簽需求後還可續留澳洲一年。除了人數限制以外，在學歷、良民證以及語言上 462 號簽證都有嚴格限制，領取 462 號簽證的青年必須擁有大專同等學歷或大學至少修業兩年的限制，也必須提供官方認證的良民證。語言上



也有一定要求，以馬來西亞為例，必須要具備 IELT4.5 以上的資格。從簽證的相關規定之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澳洲發放給台灣的 417 號簽證所需的條件限制（如名額、學歷等）較少，而具備的優惠（如延長簽證）也比 462 號簽證多。

表三 澳洲打工度假 417 與 462 簽證之比較

| 澳洲打工度假 417 與 462 簽證之比較 | | |
|------------------------|--|---|
| 簽證名稱/類別 | Working Holiday Visa (Subclass417) | Working and Holiday Visa (Subclass462) |
| 開放申請國家 | 臺灣、日本、南韓、比利時、加拿大、賽普勒斯、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義大利、馬爾他、荷蘭、挪威、瑞典、英國、香港行政區 | 智利、孟加拉、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美國、土耳其、阿根廷、烏拉圭、巴布亞新幾內亞 |
| 年齡限制 | 18-30 之國家公民 | |
| 工作限制 | 單一雇主六個月 | |
| 就學/受訓限制 | 上限四個月 | |
| 出發限制 | 簽證核發後 12 個月內 | 簽證核發後 3 個月內 |
| 名額限制 | 無 | 各國規定不同，每年約 100 名 |
| 學歷限制 | 無 | 大專及同等專門學校畢業或大學至少修業兩年 |
| 官方 | 無 | 需提供官方認證(良民證) |
| 語言 | 無 | 各國規定不同 |
| 臨時延長簽證 | 需提出雇主相關證明，最多不可超過一個月 | 不可 |
| 第二次簽證 | 於核可之工作類別與工作區域，工作滿 88 天及符合相關規定。 | 不可 |

資料來源：澳洲移民局

對台灣青年而言，打工度假除了可以獲得國際化視野外，也能學到英文。然而，台灣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青年所從事的工作類型可能較為傾向低階勞動性工作。外交部公布的「國人赴澳洲度假打工之注意事項」中，政府單位在工作注意事項內提到在澳洲「部分職場工作十分耗費體力」(外交部，2012)，因此呼籲台灣青年要注意工作場所的安全性以及提防工安意外。另一方面，台灣打工度假青



年網站（T-WHY）¹的系列報導中，也針對台灣打工度假青年做了問卷調查。調查²指出，台灣打工度假者可能會因為受限語言問題，僅能找尋低階勞力性工作，如農場；或者是華人仲介所承包的低薪工作（T-WHY，2013）。由於工作風險越來越多，台灣政府日前發文希望打工度假者慎選工作地點，注重自身勞動權益。更呼籲台灣打工度假者必須將自己定位成壯遊跟度假，不要將大部分時間花費在打工上，有損打工度假的美意（外交部，2012）。

澳洲政府在 2009 年為因應日益攀升的打工度假人數，針對打工度假計畫進行評估調查，研究成果為 Evaluation of Australia's Working Holiday Maker Program(Yan Tan, Sue Richardson, Laurence Lester, Tracy Bai, Lulu Sun., 2009)。報告指出，澳洲政府原本預期透過此項計畫，讓簽有協定的青年至澳洲當地進行短期打工以補貼旅費，藉以延長旅遊時間。這些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各國青年平均支出大於收入，對挹注澳洲的觀光產業與消費有莫大的助益。通過打工度假，這群打工度假青年大量補充了澳洲當地的季節工與臨時工需求，成為成本低廉的勞動力。打工「度假」逐漸變成了「打工」度假。

第二節 生命的插曲—打工度假

度假打工計畫旨在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間青年之互動交流與瞭解，申請人之目的在於度假，打工係為使度假展期而附帶賺取旅遊生活費，並非入境主因。（外交部旅外安全資訊，2013）

「為什麼有一群為數不少的打工度假者出國打工度假？」，要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回到最原始的問題，那就是：「人為什麼要移動？」。每個個體

¹ 台灣打工度假青年（T-WHY）網站，是由一群關注台灣青年在國外打工度假勞動權益者所架設，主要目的是解決打工度假者發生的勞資糾紛等問題，並且翻譯及撰寫打工度假相關報導或法令解析。主要編寫人目前在澳洲綠黨籍國會議員的辦公室實習，並有在 NGO 組織工作的經驗。

² T-WHY 網路問卷，樣本數 422 份。



的移動都具有特殊意義，在工業化時代，大量失去農地的人們離開鄉村移動到都市另尋生存機會。在台灣，許多來自台灣各個鄉鎮的學生移動到大城市就學，為了將來有更好的出路。而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許多個體開始進行更長途的移動，不只是地理距離加長，連文化距離也隨之加深。人們在國際間進行移動，那是因為他們相信生活會更好。懷抱著這樣的理念，個體遊走於全世界，成為國際間的游牧民族，追逐著更豐美的水草、肥沃的土地，或者是一個現代性的想像。因此，有一群人出現了，他們以體驗國外生活為目的，進行大約一至兩年的移動，並在移動的土地上以勞力換取生活資料與旅遊資金，我們將這樣的移動稱之為打工度假。

近年來台灣積極與世界各國簽訂打工度假協議，為的是打開台灣與其他國家互動的大門，並且促進兩國文化交流。為了延長旅遊時間，互動期間打工度假者可以藉由打工賺取旅遊生活費。因此我們大多想像台灣青年在他國從事簡單的服務業，使用他國語言與客人互動，除了可以賺取旅費也可以增進語言能力，待旅費足夠便繼續度假行程。然而，打工度假的真實樣貌卻在 2012 年，今周刊採訪三名台灣赴澳洲打工度假青年的報導中揭露出來。打工度假並不如想像中的輕鬆乾淨且充滿互動，多數的打工度假者從事體力性勞動，骯髒勞累外，幾乎很少跟他人交流。真相曝光在台灣民眾的眼前，許多人開始質疑台灣青年為何放著台灣相對輕鬆的白領工作不做，要跑到澳洲做台勞，其中，又以台灣每年數以萬計，佔據移居國人數第一名的澳洲最蔚為討論。「台灣青年為何出國打工度假」的原因眾說紛紜，有的人是為了賺第一桶金，也有人是要體驗生活，更有人是想仿效 gap year 探索世界。因此，本節將從打工度假的動機切入，分析為何台灣青年選擇打工度假作為探索世界的方式，又為何要選擇澳洲作為打工度假的目的地。

打工度假者多半在畢業、退伍或是工作了一陣子之後，興起了到國外走走，甚至生活一陣子的念頭。但擁有的存款可能僅能支持他們到附近的國家旅遊一段時間，而不能讓他們在國外生活一陣子。因此，當他們從學生時代、同事、朋友



或是自行得知了打工度假的訊息，便可能興起藉由打工度假來延長旅遊時間的念頭。打工度假，顧名思義就是打工加上度假，度假不足的金額可以用打工賺取經費來彌補，所以許多打工度假者便決定採用打工度假作為出國體驗生活的方法。於是，他們開始查找資料或是求助於周遭人際網絡，準備了一段時間（通常很短）之後，便出發進行打工度假之旅。對於他們來說，到了移居國首先面臨到的就是兩件事情：食宿跟工作。因此，他們多半選擇資訊最多或是有朋友在的國家前往，而澳洲作為台灣海外打工度假開放國的先驅，以及台灣海外工作居留人數最多的國家，通常是台灣打工度假者的首選。而形成澳洲成為首選的第一個原因便是社會網絡。因為移動總是具有風險，風險的高低與遷移者的意願成反比，即使遷移者有遷移的意願，若要真的行動，還必須有其他驅動力來加深他們移動的意願並且促使他們確實進行移動，而社會網絡就扮演起這樣的角色。

一、 兩種面向的遷移動機

「我想要去那邊賺錢，有一桶金，我想做生意」(20140206，Oliver 訪談)。

「（朋友）跟我說在澳洲一個禮拜你就可以賺台幣一個月的薪水，你說要不要去試試看，這是很吸引一個在當兵的人」(20140428，Webb 訪談)

人們之所以移動，是因為他們認為移動帶來的結果是好的，在遷移社會學的傳統脈絡中，這裡的好是經濟上的。從推拉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於個人的經濟資本相較於地主國的有著大幅落差，而地主國恰好又有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一來一往間，經濟差的跑到經濟好的，經濟好的也因此獲得充足勞動力。對於部分打工度假者來說，經濟因素確實是驅使他們出國打工度假最重要的原因。台灣的經濟狀況與勞動條件比起多數東南亞國家而言，尚在水準之上。但近年來台灣青年勞動力市場日趨惡化，青年畢業後面臨的是低薪化與責任制，許多年輕人即便在職場上苦守，薪水卻不見長，對他們而言，如何幫自己快速且有效的累積資本以



便將來有出頭的日子便成了首要任務。因此，打工度假乘勢而起，成為當代多數青年賺取第一桶金的好方法。

事實上，根據主計處的資料，2013 年台灣的實質薪資上平均為 44,739 元，略低於 15 年前的 44,798 元。其中受雇就業者月薪不滿 3 萬元的高達四成，7 成月薪不足四萬，其中尤以年輕人薪水最差。月薪不到 4 萬元的年輕人逾 177 萬人，佔整體年輕人口的 87.9%，而 20 到 24 歲的平均月薪只有 24,269 元，顯示青貧族的窮忙現象不僅未改善，甚至還日漸加劇。同時，在 2013 年男女薪資落差依舊顯著，女性平均薪資為 40,903 元，僅為男性 50,269 元的 81.37%，女性在勞動所得上仍舊不及男性。由此可知，台灣當代青年面對這樣的勞動狀況與條件時，海外打工度假帶來的高報酬是足以讓他們暫時停下（或放棄）現有的工作，甚至是在大學一畢業就先出國，將累積工作資歷之類的職場考量拋諸腦後。而從統計資料也可看出女性在台灣的勞動市場面臨的處境更糟，這也與女性選擇海外度假的人數多於男性有正向關係，關於性別的部分將會在第四章深入討論。但從這裡我們可以初步理解年輕女性除了在勞動市場受挫以外，更因為其性別而成為弱勢中的弱勢，海外打工度假的高薪資收入也成為了推動她們走出國門的重要吸力之一。

Stalker(2002)在其研究中以個體因素與結構因素強調了個體的遷徙都是基於自身的經驗與動機。從個體因素上來看，每個移動的個人會完善的評估移動的風險後，做出最有效率的選擇，例如選擇待遇最好的國家，或是勞動力更為缺乏的地方前往，以理性計算自己移動到他國後所能生存以及獲取的經濟資本的多寡。因此，即便每一個開放台灣前往打工度假的國家都跟台灣有著數倍的落差，但權衡物價、薪資以及工作好不好找等因素後，澳洲成為了待遇最好，物價相對低廉以及工作較好上手的首選之地。所以「一個禮拜是台灣一個月的薪水」這樣的描述不斷地在訪談中出現，顯見澳洲的經濟誘因是如此之大。就如同引言中 Oliver 跟 Webb 一樣，他們的目標十分一致，就是要去澳洲賺錢，雖然背後的動機不盡



相同，但同樣的是，澳洲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可以賺取高於台灣數倍薪水的地方。

然而，經濟誘因有其侷限，地主國與母國的薪資落差只是影響決定出國的一項必要因素（Massy et al, 1998），尤其是針對海外打工度假這部分的台灣青年。訪談資料顯示，許多受訪者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理由並非金錢使然，想去國外生活一陣子，或是體驗生活這兩個理由幾乎出現在每一個受訪者的訪談中。我們以新加坡為例，更可以了解經濟誘因並非打工度假者選擇海外工作地點的唯一考量。除了打工度假以外，也有越來越多國家提供給台灣青年出國工作的機會，如新加坡近期不斷向台灣徵才，提供給台灣青年以 WP(Work Permit)為主的工作。所謂的 WP 是新加坡最低階的工作准證，簽證以 2 年為一期。年齡限制為 16-50 歲，且每月薪資需在 2200 元新幣以下，並且需扣除稅額的非技術性外國勞工。以餐飲服務業為例，一個月的稅額是 370 元新幣，扣除下來一個月約 43000 元台幣。澳洲平均打工月薪大約 2000-2400 元澳幣，相當於台幣 60000-72000 元，白工才需扣稅。但澳洲平均生活費用比起新加坡要高許多，也必須要面臨工作不穩定等因素。

新加坡的最低工作准證對於工作的穩定性以及薪資上都較澳洲來的高一點，新加坡也名列台灣第二大最愛海外工作地點。然而，即使新加坡具備了許多比澳洲還好的優點，甚至可以以中文溝通，降低語言障礙，但多數青年仍舊選擇澳洲而非新加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新加坡並非台灣打工度假者想體驗的國外生活，大部分打工度假者理想的國外生活，指的是西方國家的生活，而非任意國家。

從訪談資料顯示，「在國外生活一陣子」是許多海外打工度假者的最主要動機，而這個動機的型塑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必須放置在台灣在全球的架構中。Stalker(2002)解釋人之所以要遷移的動機之一是個體因素，個體因素強調的是個人基於理性的判斷下，會選擇最簡單的路走。而另一個影響動機的因素便是結構因素，個體身處在結構之中，所做的判斷會受到所處社會所影響，社會中的經



濟、文化與政治都能夠成為影響決策與判斷的原因。因此，遷移不單單只會發生在窮國與富國之間，富國跟富國之間依然會有遷移的行為出現。全球化下的台灣並不是一個需要靠出口勞動力成為外匯來源的國家，卻有數以萬計的青年移動到其他締約國打工度假，藉此體驗國外生活。

我來打工度假最主要的因素其實也不是因為錢，只是一直想要出國體驗。

(20140123, Kiki 訪談)

我是因為我以前就很想去國外走走看看，但因為我沒有錢，那時候剛好聽到有這個機會。(20140424, Allen 訪談)

之前就想要去國外生活，台灣文化跟外國文化差很多，還有就是在想法方面，就是各方面，所以我那時候想說我畢業後先工作賺點錢，然後到國外去過一段外國人的生活，去感受一下在外國的生活是怎麼樣。

(20140127, Hana 訪談)

帶了十萬台幣，主要想體驗生活。(20140217, Oscar 訪談)

從上述的四段引言可以清楚的看到，打工度假者對於這趟打工度假所預期達成的主要目標就是體驗外國生活，因為想要去國外走走，因為台灣跟外國文化差很多等諸多理由，不分性別也不分階級，來自於各個階層的打工度假者持著這樣的信念出國，企圖藉由打工度假讓他們得到外國生活體驗的經驗。而，打工度假並不是台灣青年與世界接軌的唯一方式，相較於菲律賓移工出國管道多半僅能透過海外工作達成，台灣青年的出國選擇其實豐富許多。從訪談資料顯示，每一位受訪者都曾經有短暫的海外旅行經驗，甚至其中有部分受訪者還曾經有遊學、工作（出差）甚至是接待家庭的經驗。顯然這種短暫的海外旅遊經驗在當代台灣的文化脈絡下可能不能算是一種體驗外國的方式。



從打工度假者的動機切入，我們可以看到由於薪資落差而帶來的經濟誘因，以及因為想要到外國體驗而驅動他們移動的文化因素，經濟與文化兩種面向的誘因令他們產生遷移的動機。遷移是為了滿足體驗國外生活的目標，而實現這樣的目標最佳管道便是打工度假，而採用打工度假作為體驗國外生活的手段，則是對於文化的消費與現代性想像的實踐。

二、 加深遷移意願的社會網絡

長距離的移動具有相當高的風險，幾乎沒有任何打工度假者會在目的地沒有人脈或與自己來自同樣國家的人的情況下動身前往。從打工度假者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初降落地的選擇以及在當地求職的方式，我們可以發現社會網絡在國際遷移中扮演著重要結構作用過程的角色(Massy, 1988)。在跨國遷移的起初，可能有許多被稱為拓荒者的人們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開啟了他們的遷移之路，但隨著人數越來越多，移入地的資訊也漸漸地被充實時，移民的人數也會有明顯的上升。那是由於這種擴大的移民網絡具有降低遷移成本與風險的功能，通過來自同一社群的人際網絡，可以提高移動的成功率。這樣由移民所組成的網絡，能夠提供給後續移民者關於移入地的相關資訊，進而達成實質意義的移民流動（Massy, 1988；邱淑雯，2003）。

社會網絡的建立進而提高遷移的意願，許多打工度假者基於經濟文化動機以及現代性想像而選擇澳洲，但驅使他們真正動身的驅動力便是社會網絡的健全。「選擇澳洲，因為資訊比較多³」也是不少打工度假者前往澳洲的原因之一，因為資訊多，所以能夠得到更多關於陌生當地的資料，擴大對澳洲的了解程度，以確保自己能夠順利地度過打工度假。事實上，澳洲打工度假者幾乎都會使用背包客棧作為蒐集資料的來源。而在背包客棧上關於打工度假的討論中，也以澳洲相

³ 20140424，Allen 訪談；20130423，Leo 訪談；20140206，Wayne 訪談。



關的討論佔多數。因此對打工度假者而言，前往澳洲所能得到的資料量比起其他國家而言充足許多。

個體決定是否移動、移動到哪個國家是許多因素互動後的結果，且往往是通過社會關係影響著移動的個體。Danny 敘述他如何知道打工度假訊息進而決定出發便是社會網絡影響遷移者行動的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他 2011 年去澳洲。我的生活圈裡面沒有一個朋友知道這個訊息，所以我也不知道。剛好一個機會他的一個朋友去了，他知道。又換他要去了，就換我知道這件事。有一次他朋友說他要移動了，問我要不要去澳洲，因為澳洲要一直移動，我就說好，所以兩個禮拜後就出發了。因為那時候很趕，我去送他飛機的時候就想說，如果我也能去多好，因為那時候我自己也沒有想過要去幹嘛，是他跟我講的。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或聽說過這種東西阿，聽到覺得好像蠻好玩，蠻厲害的。那是不是我也有這個機會，能不能也做一樣的事情。對我來講，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東西，剛好碰到了，我會想我能不能，這種事情放到我身上，我有沒有辦法去做，我會這樣想，想一想剛好我朋友問我說要不要去。

如果他這個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沒有告訴 Danny 自己要去澳洲打工度假，也沒有跟他保持聯絡，那 Danny 可能這一生都不會知道打工度假為何物。可以說他那打工度假的朋友是他唯一的資訊來源，沒有朋友他就不會知道打工度假資訊。因為網絡關係就像是移民的社會資本，打工度假者藉由網絡得到關於打工度假的資訊，因為有社會網絡，所以移民才有更大的意願進行遷移(Boyd, 1989; Gurak&Caces, 1992)。社會網絡促成並維持了台灣每年數以萬計的打工度假者前往澳洲打工度假，通過社會網絡的越加鞏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將成為一條阻力最小，風險最少的路，越加吸引後繼者選擇到澳洲這個資訊較多的國家。

人際網絡的重要性除了提昇台灣打工度假者選擇澳洲的意願外，也展現在工作的尋找之上。通過打工度假這種方式前往澳洲的台灣青年，打工跟度假在比重上



可能有所不同，但打工跟度假都是必不可少的兩項行為。打工度假者因為其經濟與文化資本的多寡，影響到他們能找的工作類型，但無論是那類型的工作，人際網絡都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台灣打工度假者在澳洲多半只能從事第一級產業的工作，這類型的工作因為需求量大，多委託仲介招募勞工。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關係常常被商品化進而販賣（藍佩嘉，2000）。當人際網絡缺乏或無法發揮效能時，仲介便會進入，並且將利用既有的社會網絡擴大再生產的過程，達成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王宏仁、張書銘，2003）。因此，在全球化下，勞動力的遷移是通過人力仲介公司進行的，是一種勞動體制彈性化的結果（Tujan, 2006）。

澳洲作為畜牧業國家，第一級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大，澳洲政府開放打工度假的理由之一也是為了補充季節性臨時工需求。因此像是農場、工廠以及大賣場傾向透過仲介招募勞工，減少面試與尋工所需的成本。而台灣打工度假者多半能從事的工作也在這個範圍內，因此他們或多或少都有接觸當地仲介的經驗。當地仲介不只是單純的仲介勞動力，他同時也具有區分工作與分類勞工這兩種重要功能。

澳洲因為地大，許多農場、工廠傾向透過仲介尋找員工，以因應大量的季節勞動臨時工需求。而一些咖啡廳、飯店打掃等工作也多半通過仲介聘用，雇主可以省下面試與尋工的時間成本。這些仲介成為了實際操控的直接雇主，讓公司免負雇主應負的責任，如社會福利(Tujan, 2006:9)。澳洲的工作分為三種，一種是白工，所謂的白工是符合澳洲勞動規範的工作，雇主必須提撥稅退休金，而勞工也要繳納定額稅金到退休金戶頭。通過澳洲當地仲介找到的工作多半數這一類型，抽成等也遵守澳洲當地的法律。黑工為非法僱用關係，從事黑工工作的勞工領取現金，沒有報稅與工作申報，因此雇主也沒有義務提撥退休金。這類的黑工仲介通常多為亞洲人或華人擔任，也常常有詐騙糾紛或是剝削的情形產生。灰工則是夾雜在白工與黑工之間，通常是雇主為了避稅或是會計做帳時使用。

對於打工度假者來說，白工是最好的工作，除了薪水較高以外，離開澳洲仍可以退稅還有領退休金，且具有完整保障。黑工多半是急需金錢時才會從事的工



作。所以打工度假者選擇哪種類型的仲介公司，就會決定其工作性質是白工還黑工。此外，需要仲介的工作多半是需要大量臨時勞動力的工作，當打工度假者經由仲介求職時，幾乎也就確定自己會去農場、工廠或大賣場之類的地方工作。因此，仲介除了具有區分工作類型與工作身份的功能外，另一項功能便是將打工度假者做分類。

大家都會想應徵白領工作，但是我到現在都沒有聽過，完全沒有聽過。以服務生來講的確是亞洲人比白人更沒有優勢。但是蠻多收銀員是亞洲人的，尤其是當你週末看到一些收銀員大部分都是亞洲人，大型量販店的。咖啡廳的就還好。量販店的收銀員比較多亞洲人，因為當地人覺得假日的時候就是要放假。（20130423，Leo訪談）

Leo 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為何從事的多半屬於勞力性工作做出了這樣一段描述，從他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亞洲人與白人的區別。澳洲仲介在仲介不同的工作時，會先將白人優先納入低階白領或者是服務業等工作中，那是因為仲介認為白人打工度假者的形象符合這類型的工作。仲介在仲介勞動力時，有時候看到的並不是求職的個體，而是個體所處的國家以及其國家所處的全球化位置。

對於澳洲仲介來說，他們歡迎也希望來自西方國家的打工度假者能夠進入澳洲，因此在工作引介上會傾向將他們分配到較有可能取得工作簽證的低階白領工作中。這種判斷方式其實加強了種族歧視以及刻板印象，所以相對於白人容易被派往低階白領或服務業的工作，亞洲人在仲介的印象裡就是不在乎休閒的人，因此很適合擔任假日的賣場收銀員，因為同樣來自西方世界的白人打工度假者可能與他們一樣擁有假日就是要放假的文化思維。澳洲當地仲介擁有這樣的想法的正當性是建立在階級主義上，以此所作的決定常常帶有廣義階級意識的判斷（曾嬿芬，2006）。

即便仲介掌握了工廠與農場所需的人力缺額，但其影響的效果卻不如個人的人際網絡來的大。「出外靠朋友」幾乎是每個打工度假者都會提到的一句話，那



是由於朋友在澳洲打工度假中帶來的角色意義，特別是在找工作上。

澳洲靠關係超重要的，但是不一定這個工作是好的，可是會比較容易。所以你在澳洲如果不想交朋友的話，妳的工作會很難找。（20130923，Isabel 訪談）

Isabel 在訪談中提到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如何影響打工度假者在工作機會的取得上，由於在澳洲的開銷大，當打工度假者的工作不穩定或是未能找到工作時，可能就必須要提早結束旅程回台灣。因此，打工度假者到澳洲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找工作。然而，礙於個人語言能力的高低，能找的工作類型落差不小。語文能力好的基本上什麼類型的工作都能找到，能力相對較差的可能只能進入工廠與農場之類不需要太多與人互動的工作場所。此時有沒有人脈，有沒有關係可靠便十分重要。即便找尋農場的工作能夠通過澳洲當地的仲介，但許多工作的缺額卻早已迅速的補滿。

根據訪談資料，在農場工作的受訪者都會清楚的表明自己能找到農場工作多半不是靠登門拜訪或是仲介就能得到，而是透過認識的人在農場工作時，有缺額立刻通知的情況下才進入農場工作的。

出外要靠朋友，我只能那樣說。朋友介紹是最快的，網路投履歷最沒有用，都不會回，可能同樣投履歷的很多人。朋友會介紹你進去就一定是有缺，我就去工作拉。（20140129，Hana 訪談）

通過 Hana 敘述她在澳洲求職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朋友介紹的成功率遠高於網路投履歷。雖然農場跟工廠多半藉由仲介公司引進勞動力，但多數的雇主在僱用來自不同國家的打工度假者之後，心中也會有自己的判斷準則。他們將打工度假者以國家作為分類依據，對於其認為較為適合這類型工作的人，他們來自於哪個國家（例如勤奮、不偷懶級肯加班的台灣人）有時候成為了雇主僱用的準則。因此，透過仲介找來的人可能並不合適的情況可能發生時，雇主便會傾向詢問其僱用的勞工有無認識的勞工想要進入，以確保勞動效率與品質的維持。就像 Isabel



提到：「後來有些工作就是變成人拉人，我們要走了就拉下一個人進來，所以根本也不需要仲介。我們要走了老闆就會問我們說：「你們有沒有朋友要來？」。因為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也因此許多打工度假者必須要再澳洲當地有足夠的人脈才能縮短等工的時間，甚至預防自己陷入沒有工作的窘境之中，這也是社會關係在澳洲打工度假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原因。

第三節 現代性想像的消費與實踐

一、 現代性的文化消費形式

休閒，在當代台灣社會佔有一席之地，不會休閒的人似乎便不具備某種品味。休閒起源於 19 世紀後半葉的有閒階級，有閒階級的成員基本上無需從事任何生產性工作，他們也對這類的勞動工作嗤之以鼻，休閒成為一種階級性的文化消費形式（Veblen, 1899）。隨著時間的更迭，休閒的意義也傳至了一般勞工階層，休閒成為現代化的指標，也不在只是有閒階級專屬的行為，而是一種義務。工作後休閒是理所當然，不會休閒就是不會生活這樣的概念也從日本統治時期開始奠定下來。到了當代，休閒的意義已然轉變，像個人自我實現、創造性和決定的自由，這些「新」價值有其作用。這個「價值轉型」不可避免的造成，存在或實現價值的生活領域的改變；在此價值轉型中，工作的主觀意義下滑，而休閒領域的重要性增加(C. Offe, 1985:154，取自張人傑：197)。

休閒成為一種價值觀，而正確的休閒方式則是其準則。當代社會對於休閒有了新的看法，休閒中的消費層面被提出，在家裡休息、到公園散心等不是正確的休閒方式，充其量只能是休息。真正的休閒是必須要有支出的，因此遊樂園遊玩、海內外旅行度假才能稱得上是休閒活動。因此，休閒是現代社會才會被重視的議題，因為它需要勞工階層擁有穩定的薪資才能流行。



19世紀來自上層的有閒階級的休閒行為是自然而然的，這樣的行動是內化在其階級文化中，是其品味的展現。而中產階級擁有了足夠的經濟資本後，為了提升自己的品味，便模仿了這樣的行為。有閒階級的休閒方式必須基於禁止勞動與炫耀性消費上，他們可以通過舉辦宴會、參加俱樂部、出席文化沙龍、加入慈善組織等具有社會功能的文化活動以彰顯其階級品味。或者是由妻子展示一種越位休閒的消費，以及由奴僕提供輔助越位休閒所需（Veblen, 1899）。然而中產階級的財力並無法使他們負擔上述的休閒與消費，即使能夠負擔，其妻子奴僕展現的越位休閒也無法躋身上層階級，因此，中產階級形成了一種屬於中產階級式的消費方式，那就是旅遊，一種不需要有強大的財力與社會地位也能達成的休閒活動。然而，在當代社會中勞工階級也開始具有負擔旅遊這類休閒活動的財力，並且旅遊也成為勞工階級的休閒主要方式時，中產階級便把旅遊當作是一次接受教育的經驗，而不只是休假（朱敏，2010）。為了鞏固中產階級式的休閒活動方式，他們將旅遊中休假的成份降低，進而提高獲得經驗的重要性，所以，旅遊中的獲得便成為休閒的主體，決定了休閒的階級性。

重視獲得的中產階級式休閒活動，強調從旅遊中獲得了何種文化資本。這樣的旅遊方式，形成了體驗異國生活的準則，「體驗」成為可以用來累積的文化資本形式，進而用來定義這群人的階級。藉由文化資本的累積，中產階級可以將旅遊變成他們專屬的休閒活動方式。同時，企圖達成階級流動的中下階級，也期望透過旅遊中所獲得的文化資本來躋身中產階級。階級被建立後必須被鞏固，流動也是如此。階級如何被建立與鞏固，Bourdieu 以文化資本的概念做了精湛的分析。所謂的文化資本指的是將知識以及思想方式作為資本，用來建立身份與權力的合法性。由於文化資本以個人舉止、品味(taste)與學歷三種形式出現，每個階級可取得的文化資本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文化資本也可用來協助優勢階級獲得理想的社會位置，同時擁有區隔他者與凝聚階級意識的功能（Bourdieu, 1984）。



統計資料顯示，赴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學歷（表四）以來自亞洲的兩個國家（韓國跟日本）以及法國和英國的打工度假者之學歷較高，以大學（含以上）居冠；德國則以高中（含以下）佔多數，超過 41% (Tan et al., 2009)。而台灣據統計，大學以上學歷超過 86% (康文文教基金會, 2013)。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現象，其原因有二，一是台灣就讀大學的比例偏高，二是大學畢業後具備的英文能力可能比較高，因此台灣打工度假青年的學歷才可能偏高。

表四 各國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之學歷

| | 大學（含以上）(%) | 專科及高中職(%) | 高中職（含以下）(%) |
|-----|-------------|------------|-------------|
| 韓國 | 69.7 | 10.8 | 19.5 |
| 日本 | 49.9 | 28.5 | 21.6 |
| 德國 | 32.2 | 26.5 | 41.3 |
| 英國 | 54.3 | 33.0 | 12.7 |
| 法國 | 65.9 | 17.0 | 17.1 |
| 義大利 | 47.1 | 17.3 | 35.5 |
| 荷蘭 | 46.1 | 25.4 | 28.5 |
| 加拿大 | 45.5 | 29.3 | 25.1 |
| 台灣 | 86.7 | 6.6 | 6.6 |

資料來源：Evaluation of Australia's working Holiday Maker (WHM) program (2009)

台灣部分資料來源：康文文教基金會⁴

但學歷在當代台灣社會區隔階級的能力幾乎不復存在。因此，品味變成了區分出階級最好的標示之一。不同階級的人各自有著應有的文化消費型態，而通過不同的文化消費方式，社會差異便被妥善的維持。

以往上層階級藉由留學、遊學及工作等方式拉長在異地生活的時間，而中產階級則通過深度旅遊的方式來獲得在國外生活的體驗，中下階級礙於經濟資本的多寡，多半只能進行短暫的出國旅遊。隨著體驗國外生活的長度，階級被良好的鞏固著。然而，打工度假卻有效的打破此藩籬，來自於中下階級的群眾也能藉此延長體驗生活的時間，獲得體驗與休閒等文化體驗資本。我認為，台灣打工度假

⁴ 財團法人康文文教基金會，在 2013 年 9 月 19 日公布針對打工度假所做的網路問卷結果，有效樣本數為 226 份。



者透過打工度假，累積了以往只有出國留遊學的中上階級青年才能擁有的國外體驗資本，並且藉由這些資本，在主觀上與這些人更加接近，甚至自我感覺略勝這些出國留遊學的人一籌。因此，我用文化體驗資本來論述這些打工度假者主觀上感受到的文化體驗積累的結果，並且透過文化體驗資本的累積，讓他們可以區別出跟他人不同，並且有一種相對較高一階的論述。但也有部份打工度假者確實從打工度假中累積了與外國人相處的經驗以及英文變好等，可轉化為其他經濟資本的文化資本。

打工度假者藉由打工度假獲得了珍貴的體驗經驗，這樣的經驗經由他們對於澳洲的觀察與感受轉化成文化體驗資本。這種轉化並非直接導致他們在文化上向上流動，而是透過他們對於澳洲這樣現代西方國家在工作評價及工作型態中與台灣的差異比較中展現，從這樣的比較中也讓人了解他們真的累積了某類型的文化體驗資本，這類型的文化體驗資本積累則必須透過打工度假才能體驗到的。當他們企圖落實所得到的文化體驗資本時，也試圖向他人證明自己確實累積了某類型的透過打工度假所得的文化體驗資本。

你知道在澳洲什麼階級的人薪水領最高嗎？藍領的階級，就是做工地的薪水最高。（20140127，Hana 訪談）

所謂澳洲很好一點是他覺得勞動力值那個價錢，他並不覺得你坐辦公室應該比你在路上一個小時多。（20130923，Isabel 訪談）

在澳洲，台灣打工度假者面臨到不同於台灣等亞洲國家對於職業的評價以及給予的薪水待遇時，他們會立刻拿來與台灣做比較，這種比較呈現出文化的優劣性。在澳洲從事藍領階級工作享有的高報酬與良好職業聲望是不曾出現在台灣社會的，澳洲將勞動力視為給薪的依據，而非學歷或是勞心的工作才值得高薪，當台灣打工度假者經歷過這樣的環境，靠自己的勞動力換取高於台灣數倍的薪資時，卻沒有得到嘲諷甚至輕視的目光及評價，這種與台灣職業文化相差甚遠的工



作評比方式使得打工度假者驚訝。驚訝過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富有現代性的平等思維進入打工度假者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在台灣經歷了責任制與低薪化，部份受訪者因為來自於後段大學，無法獲得一個好崗位，免不了職業聲望低落的不滿。在澳洲，他們感受到了工作的不同評價方式，而這樣的方式出自於比台灣要現代化的澳洲，其代表的也是比台灣更先進的意義，所以，他們在訪談中闡明了他們的比較之餘，也向我們宣示了他們所經歷到的一項文化體驗資本—現代西方國家專屬的藍領白領的平等思維。

藍領工作突顯了澳洲社會對於職業類別的平等思維，而在職業內他們的平等仍舊存在，且讓台灣人印象深刻。Oscar 以他在餐廳當服務生的經驗告訴我們澳洲人對於服務生的態度與台灣不同，他們給予服務生尊重的態度，而同為亞洲人開的中國餐廳，就是延續著在亞洲對待服務生的態度，因此，外國人的餐廳是好的，在那裡工作感受得到快樂。即便是作服務生的工作，台灣打工度假者都能由此感受到澳洲的現代性，而這樣的感覺也成了可供轉換的體驗資本。

印象深刻的是我覺得，我在餐廳工作，外國人對 waiter 真的很尊重。有遇到那種中國餐廳，反正就是亞洲人，對服務生的態度就是很差。我就是覺得差別很大，外國人真的很有禮貌，所以在做外國人的餐廳就很快樂。

(20140217，Oscar 訪談)

工作評價的不同讓這群打工度假者經歷了西方社會對於職業的尊重態度，而澳洲人對於工作應有型態的堅持更讓台灣人大開眼界。

他會有類似 tea time 之類的，因為澳洲人很注重休閒，他們只要時間一到，你就放下手邊的工作，不管你在幹嘛，放下手邊的工作就去休息。休息時間 15 分鐘，他會有一個休息室，會提供咖啡、茶，免費的，你可以使用。(20140127，Hana 訪談)

Hana 舉了她在龍蝦場工作的例子，像我們展示出澳洲人對於工作與休閒的比例拿捏以及工作環境的舒適性。通過對於澳洲工作與休閒比例分配的觀察，台灣人看



到來自於澳洲對於勞動者權利的保障與維持，進而提供舒適的工作環境表達對勞動者的重視這樣的現代文化，正是台灣這類亞洲國家所欠缺的。

在台灣就是沒日沒夜加班，但澳洲很早就下班。比較少看到他們在加班幹麻的。感覺比較懂得生活。(20140206, Wendy 訪談)

而澳洲人對個人權利的堅持也透過他們對於工作的長短拿捏展現出來，Wendy 認為澳洲人不加班的行為對比台灣的高工時，更突顯出他們比較懂得生活的工作文化。懂得生活近代成為西方人生活風格的代名詞，也突顯出了休閒的重要性。而前文提到重視休閒的想法正是一種現代化的指標，因此，澳洲所具有的現代性再一次通過其對於工作的態度表現出來。這種工作條件與態度同樣影響著台灣青年對於理想工作的想像，以台灣青年求職理想公司為例，許多新鮮人渴望進臉書、Google 之類的外商公司工作，就是相中了西方文化對於工作應有態度的尊重以及外商公司對於工作環境的舒適 (ETToday, 2012/12/2)。進入這樣的公司工作所擁有的不僅是良好的待遇與工作條件，更帶有比在台系公司工作更高一等的想法隱含在其中。

很嚮往國外的工作型態，所以我要把自己的 team 搞成那樣，就是熱愛自己的工作，沒有壓力的工作，但是你績效還是有出來，這在台灣很難做到。(20140206, Oliver 訪談)

這樣的工作型態是台灣人所嚮往的，而打工度假者藉由打工度假真實地在澳洲體驗到這樣的工作方式，當他們企圖把這種工作型態落實在他們在台灣的工作時，也宣示了他們確實擁有這樣的文化體驗，而這文化體驗資本便是通過在西方現代性國家澳洲中進行打工度假所取得的。



二、 實踐現代性想像

台灣青年為了體驗國外生活，以打工度假的方式前往與台灣締結契約的國家。他們選擇打工度假作為體驗國外生活的方式，其實是一種現代性想像的實踐，特別是對於流行於歐洲的 gap year 計畫的實踐。Gap year 象徵歐美青年探索世界的一種方式，他們定義自己為背包客，運用打工度假的方式遊走於世界。因此，台灣青年為了實現現代性想像而採取打工度假作為體驗外國生活的方式即是一種文化消費形式，通過打工度假這樣的文化消費方式，打工度假者累積了文化體驗資本。

2004 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成立了「流浪者計畫」，提供年輕的藝術家資金贊助他們在亞洲從事「貧窮旅行」，gap year 一詞躍上報紙版面。2006 年遠見雜誌以「休耕年」來翻譯 gap year，鼓勵上班族向外出走，看看這個世界。到了 10 年，gap year 被運用在鼓勵大學生出國擔任國際志工，體驗貧窮與助人的快樂。而從 2011 年開始，gap year 開始與壯遊相結合，成為到國外旅行的一種重要方式，作家王文華甚至在文章中以「台灣，也可以把二〇一二年，當做『Gap Year』」來形容 gap year 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台灣青年在近幾年之間，對於 gap year 這樣來自西方文化的名詞似乎是越來越熟悉。

Gap Year 起源於歐洲，由於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入學考試通過後到就讀中間常會有九個月的空窗，這段時間學校鼓勵學生前往世界各地探索世界，拓展視野而來。而這股風潮從 90 年代開始在歐洲流行，近年來也延燒至亞洲國家，台灣也在熱潮之中。台灣青年大多是在大學時期透過學校講座或是相關的青年社團、活動而接收到關於 gap year 的資訊，而 gap year 這種盛行於歐美國家的青少年文化似乎也成為當代台灣青年追求的理想人生樣貌。實際上，台灣受到歐美青少年文化中的 Gap year 以及由青輔會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大力倡導的壯遊理念的影響，一個長時間的在地生活概念已經流行開來。這種旅遊的方式強調的是在某個



異地待一段時間，融入當地生活，與當地人從事一樣的行為，並且自食其力，用相對於留遊學更少的錢在某地住一陣子。這種探索世界的新方式引領著台灣青年採取打工度假作為遊歷海外的方式，而且只能是打工度假，這種富含背包客精神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展現。

Gap year 更是現代性的展現，Ian 在訪談中提到：「像我來澳洲，人家會問我來這裡幹嘛，我就會說 this is my gap year。我在這邊，我只要講 gap year，她們就會知道我是學生，只是來這裡遊歷的」。Gap year 在此承載了西方國家的論述，同為全球化下的一員，Ian 只要在澳洲這塊西方世界的土地上使用同樣的詞彙，就能收到正確的反應，而這樣的反應正是一種現代性想像的具體實踐。也因為驅動打工度假者出國打工最重要的動機是對現代性的想像，這種想像能落實的地方只能是比台灣更進步、更現代的國家，特別是歐美等劃歸為西方範疇的國家。因此，這樣的想法也支配了打工度假者傾向選擇西方國家。

由於 Gap year 是現代性想像的實踐，因此打工度假便成為實現這種理想人生的最佳途徑。比起留學所需的長時間與高額花費，打工度假所需的時間適中，約在一兩年內即可完成。加上可以透過在當地打工賺取旅費，因此必須準備的費用遠低於留學。另一方面，打工度假又比旅遊待的更久，且實際上生活在當地，體驗到的生活深度完全不同，因此打工度假變成了簡單易入手的體驗國外生活的方式。雖然打工度假作為一個體驗方式是每個打工度假者都可以採用的方式，但定義自己的角色為背包客，才能實踐 gap year 的精神。

無論是從報章雜誌或者是網路社群，「我是一名背包客」是許多打工度假者定義自己身份的角色。所謂的背包客，是來自於英文的 backpacker，指的是背著背包進行長途自助旅行之人。背包客常常是在有限預算下進行旅遊的人。他們對於旅行如何規劃有獨特的見解。通常背包客會積極融入當地生活，並在一地停留相對於觀光客更久的時間，以便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



背包客的旅行方式與一般觀光客是不同的，Isabel 為我們做了比較：

像我們在旅行的人旅行久了之後會把 traveler 跟 tourist 分開，因為我們覺得 tourist 是那種令你討厭的，traveler 是 traveler，是做不一樣事情的人，觀光客跟旅行者是不一樣的。對我們來說，是你會認識，你會跟當地的人一起生活，做一樣的事情。譬如說一起趕公車，一起去市場殺價，瞭解當地什麼東西盛產，什麼東西好吃。可是觀光客只是去拍照了。

(20130923, Isabel 訪談)

台灣赴海外打工度假者藉由區分出自己與普通觀光客的不同來證明體驗國外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也只能是打工度假，而且是一種背包客型態的打工度假才是正確的選擇，也才能真正深入體驗國外生活。

對現代性的嚮往影響了打工度假者對於打工度假目的國的選擇，也決定打工度假者使用打工度假作為體驗國外生活的手段。Gap year 作為現代性想像的實踐，打工度假者將自己定義為背包客，藉由打工度假來追求現代性的實踐。使用打工度假作為消費與實踐現代性想像的手段，能夠使得打工度假者獲得相關的文化體驗資本，進而晉升至更高的階級。但要達成這樣的流動，前提是必須在現代性國家進行打工度假行為才可獲得。因此，即便「體驗外國生活」幾乎是打工度假者一致的目標，但也並非泛指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要選擇在比我們進步、更具有現代性的國家內打工度假才符合要求。

第四節 階層化的現代性追求

每一個移動的個體，無論移動的時間、距離長短，都是為了追求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對觀光客而言，移動到他處觀光，可以是休閒、拓展視野或者是觀看美好風景。對於背包客而言，勇闖異地也是一種青春的展現。對於歐美度過 Gap Year 的青年而言，離開舒適圈前往他鄉是一種訓練，這樣的訓練有助於幫助他們



度過以往的人生。而對於在全球化下移動的個人而言，更是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以及實現對於現代性的想像。美好的生活不是專屬於個人的，它通常是被建構出來的，被大眾媒體、文學作品、戲劇作品等傳播文化觀點的媒介建構出來的。個體企圖追求並實現對美好生活的想像所採取的行動，就是一種以文化消費形式所呈現的行為，他們採取的方式便是打工度假。

一、 日本：親近的現代性

近代日本與台灣的關係緊密，日本文化深深地影響台灣等亞洲國家，哈日現象依舊在台灣延燒。對於部份打工度假者而言，當日語能力的擁有與否不構成妨礙時，日本這個選項便成為了他們的首選。

假如沒有設限的話我會考慮日本，因為我對那裡比較有興趣，我會比較想要去日本那邊學習。比方說找他們餐廳，學習他們廚房是怎麼運作的。
(20140428，Webb訪談)

日劇我還一直看，就很嚮往。日本，我想去體驗那邊的生活阿，如果可以的話，我還真想去那邊體驗一陣子。算嚮往，也是想體驗他的生活，去那邊工作。（20140424，Danny訪談）

我可能還是會選日本吧。我覺得台灣跟日本文化之間有一些關連性，在大學時我副修文化研究，我修的科目很多跟日本有關，尤其是台灣跟日本之間的文化關連，導致我真的想選的話會選日本。（20140125，Ian訪談）
選擇日本的打工度假者多半基於對於日本文化（如Ian對台日文化有興趣）、那邊的工作型態（如Webb對日式餐廳的料理與運作有興趣）或生活等有興趣，或者被日本流行文化所影響（如Danny）所以他們想要選擇日本作為打工度假的目的



地。台灣與日本在文化上是相當具有親近性，五十嵐曉郎（1988）在其著作中分析日本大眾文化在亞洲的日本化為主要討論宗旨，他認為亞洲有著日本化的文化想像。形成這樣日本化原因奠基于資本、都會中產階級以及文化的共通性。首先是資本，戰後日本企業對亞洲投資的增加，許多日本的家電用品銷至亞洲地區，made in Japan成為高級的象徵。此外，電視、漫畫、影視節目等大眾文化商品也成功地進入亞洲內的各個國家。其次是都會中產階級的興起，亞洲鄰近國家都會中產階級對日本文化的接受度高，樂於追棒日本潮流，成為其主要擁戴者，也有助於日本文化進入。最後是文化的共通性，早在日本文化滲透進來之前，美國的自由、民主等美國式理念以先行進入亞洲地區。因為有美國式理念作為基礎，亞洲各國其實共享了類似的經驗，這些共通的基礎有利於日後日本文化的擴散。

此外，因為日本在亞洲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文化「先天」就容易進入亞洲（李文鐸，2002）。從五十嵐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日本文化能夠全面地進入亞洲地區，使得亞洲多數國家日本化的原因。而日本作為現代性的想像，則可由梶原景昭對於日本脫亞入歐主張（脫亞論）的分析中看出端倪。在其研究中指出，日本在此主張發表後，對於亞洲的態度同時具有兩種心態，一是強調日本和亞洲的差異性，二是強調日本和亞洲文化的親近性（李文鐸，2002）。因為強調差異性，所以亞洲作為後進國，日本的優良傳統不一定能夠傳到亞洲。因為強調親近，所以日本式的經營管理可順利進入亞洲。就像是日本式的料理方法未必能進來台灣，所以Webb才會想要到日本打工度假，藉以學習日本式的廚房經營方式與態度。而Ian認為因為台灣跟日本的文化關連性強烈，因此他想承襲大學時代的學習，到日本打工度假，以期之後能進入日本相關研究院就讀，繼續鑽研日本文化。而Danny更是透過日劇被日本文化感染，嚮往著去日本當地體驗一陣子。

由此可知，因為脫亞論後的日本以兩種心態在經營亞洲地區，一方面藉由強調亞洲的後進性將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拋諸腦後，形成日本較為先進、現代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過強調日本與亞洲文化的共通性，將日本文化滲透進



亞洲各國，影響亞洲國家大眾文化的形成。所以，即使這些受訪者在去除所有障礙後選擇了日本，仍舊是一種對於現代性的追求。但實際上台灣打工度假者選擇日本的人數並不算多，澳洲才是台灣打工度假者趨之若鶩的對象，形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在於對現代性孰高孰低的想像。

選擇澳洲的原因眾多，前文已從經濟、文化與社會網絡進行分析，強調無論是在薪資水準上、體驗外國生活的目標以及資訊和人際網絡等方面，澳洲都是台灣打工度假青年的最佳選擇。再加上在台灣教育脈絡下，我們使用英文作為第一外語，許多台灣青年多半只能選擇英語系國家，將語言帶來的隔閡與影響降到最低，因此選擇澳洲等英語系國家也是阻力相對較小的道路。有趣的是，在訪談資料中同時也顯示許多擁有他國外語能力，特別是日語能力的打工度假者，卻不以日本為打工度假的目的地，反而選了澳洲作為其打工居留的國家，這仍是基於現代性想像做出的選擇。有別於日本的現代性，還有一種更為普遍的現代性想像在全球化下被渲染開來，受到這種現代性想像所影響的國家遍及全球，那就是西方現代性想像，這才是打工度假者偏好澳洲作為打工度假居留地最重要的原因。

二、 西方現代性：初階的澳洲與進階的歐美

台灣青年進行打工度假計畫時大多數具有共同的目的，「體驗國外生活」。這裡的國外生活並非所有的國家都一體適用，而是特指西方世界國家，所以當他們面臨在眾多國家中選擇一個目的地時，許多打工度假者幾乎不加思索的選擇了澳洲，這一個可以用來追求現代性的西方國家。從經濟誘因來看，澳洲與紐西蘭同樣都是畜牧業國家，澳洲的薪資比起紐西蘭略高一些。而第一級產業的工作台灣人也比較容易上手，因此兩相權衡之下，選擇澳洲的經濟因素十分符合打工度假者快速賺取旅費的計畫。其二是台灣的教育文化，在台灣的教育訓練過程中，英文是我們的第一外語，相較於歐語系以及亞洲語系國家，選擇英語系的澳洲、英



國與加拿大要更合理些。

弔詭的是，實際上前往英國跟加拿大人數卻遠低於澳洲，形成此現象的理由可從三個層面來看，首先是名額。相較於澳洲，英國跟加拿大都有名額限制，造成申請的人數成長受限。接著，相較於英國與加拿大，澳洲相對「好去」。澳洲作為多種族移民國家，以強調多元文化著稱。與同屬西方國家的英國相比，對於接納外來移民的接受度高。最後是語言問題，以第一級產業為主的澳洲社會比起以服務業為主英國與加拿大兩個國家，對於非英語系國家居民的台灣人來說，英文的門檻相對的低許多。除了上述的外在因素外，我認為身為亞洲國家的台灣人對於西方的現代性想像才是打工度假者選擇澳洲而不選英加的主因。這種對於西方現代性想像的方式就是一種階層化的想像。

從前往亞洲與中東地區工作的菲籍移工的例子可知，這些移工並不以亞洲或者中東地區作為最終的目標，台灣或中東國家只是他們在現階段累積經濟與現代性資本的跳板，藉由在台灣積累的資本，他們企圖讓自己或是下一代跳向全球經濟體系，邁向歐美西方國家等更具現代性的海外工作（黃承泰，2008；陳輝立，2011）。菲籍移工藉由遷移到像台灣這樣亞洲現代國家工作，進而前往歐美國家的行動，便是基於對現代性的階層化想像。藍佩嘉（2005）在研究菲律賓移工時，到了當地看到的是充滿台灣意象的商品，像是流星花園的海報、衣服以及盜版的DVD。出國工作對菲律賓移工來說不僅是賺錢而已，在某個意義上已經成為「到現代國家富裕生活的朝聖之旅」（藍佩嘉，2005：40）。因為全球流行文化藉由媒體傳播至世界各地，這群菲律賓的移工藉此型塑了對現代性的全球想像。台灣人也藉由媒體等科技物與世界連線，我們看好萊塢的電影，吃歐美風味的食物，甚至學習、模仿歐美文化。因此台灣海外打工度假者無疑地也將打工度假的旅程當成一趟朝聖之旅。

這種想法展現在訪談時，當我問起去除了所有阻礙因素以後，為何還是不選亞洲國家作為打工度假居留地時得到了解答。對於台灣打工度假者來說，即便扣



除語言因素，亞洲仍較少被列入考慮項目。因為比起歐洲美洲國家，亞洲國家的可抵達性高，花費又低，通常透過旅遊就可以到達，不需要花費一年甚至兩年的時間在當地打工度假。他們的心態其實就像是 Gill 所形容的「**韓國跟日本，跟到高雄一樣，幹麻去阿**。跟高鐵一樣一下子就到了，很近阿，飛首爾兩個小時，飛東京也兩個小時，反正很近。那幹麻去，跟走廚房一樣。(歐洲還是會想去)那個才叫做西方文化」，因為亞洲國家在地理上相近，且文化上太過相似，即使日本與韓國使他們國家發展比台灣快，也具有一定的現代性，但其文化並沒有驅使台灣打工度假青年前往體驗的吸引力，而其所有的現代性也無法與西方現代性相匹敵，這也是為何澳洲能吸引那麼多台灣打工度假者的原因。而像第一章所提到的新加坡例子同樣也可以用來解釋西方現代性整體高於亞洲現代性的想像，對於台灣打工度假者而言，同屬亞洲國家的新加坡即使使用英文且發展比台灣更前，但仍舊使台灣青年興趣缺缺，遠不如澳洲文化來的讓他們渴望。

三、 歐美：西方現代性的頂端

台灣的打工度假者與菲律賓移工的動機十分相似，都是「體驗國外生活」或者是「我想要看看國外的生活是如何」。所謂的國外生活並非任何一個國家都能符合標準，而必須是具有現代性的國家。因此，台灣多數的打工度假者選擇澳洲作為打工度假的目的地，原因是因為台灣青年將打工度假視為追求成就與探索世界的方式。但澳洲也並非是他們對於現代性想像的終點，更不是這群打工度假者的最終理想目標，澳洲只是一個中繼站，是他們可以前往其他歐美西方國家的跳板。因此當我假設在沒有任何的隔閡（語言、經濟資本的多寡、人際網絡的有無等等）的情況下，他們最想去哪一個國家打工度假時，從他們的回答也表達了對前進他們認定的更高階之現代性國家的渴求。



比利時那時候沒開放，因為他太晚了，如果比利時有的話，我會選擇歐洲。（20140125，Gill訪談）

我那時候本來考慮去年還是去去年剛開辦的荷蘭？就是威士忌的出產地，我忘記那一個了，北歐太多種國家，反正想去那邊。（20140206，Oliver訪談）

今天如果我還有機會可以去打工，我可以去美國的話，我就會去美國，因為我是棒球迷，如果有機會可以去打工度假一兩年，我會想去美國。（20140424，Allen訪談）

Gill、Oliver 與 Allen 在沒有任何條件限制的情形下，幾乎是不加思索地就選了歐美國家作為其打工度假的首選地，這樣的選擇結果顯示出歐美國家是台灣多數打工度假者更理想的國家，原因就是歐美國家才是台灣現代性想像的根本。相反地，即使他們已經去過歐洲，仍是以歐洲為嚮往之地，顯示歐洲更屬於西方文化的中心。菲籍移工遷移到其他國家工作時，思考的不只是經濟誘因，還包含了母國社會對成就與探索概念的建構，加上在全球化下被型塑的現代性想像，構成了她們出國工作的重要驅動力（藍佩嘉，2008）。台灣打工度假者也將海外打工度假當作一種對於成就與探索，而其目標仍是以歐美國家為優先。到歐美國家留學甚至工作都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耀，當代台灣社會仍存有喝過洋墨水就是比較好的印象。對於知名大學的學生來說，留學接著留在國外工作便是光宗耀祖的最佳展現。然而，對於預算有限的打工度假者而言，打工度假作為一種在當地打工（工作）的方式，長時間身處在西方國家中，體驗他們的生活形態，也能達成成就與探索，這樣的心態就跟 Gill 看待打工度假的意義一樣，「我沒有喝過洋墨水，所以這應該也算是過水的一種吧」。



從反面看來也能理解歐美國家比澳洲具有更高一層現代性的想像，部份的打工度假者受限於人力資本的不足，對於更高一層的歐美國家其實是懷著一種害怕的感覺。選擇到澳洲打工的 Danny 的回答就帶出了這樣的陌生恐懼：「說真的，美國對我來說比較難去，對我來講太陌生了」。太陌生，並非意指美國很少出現台灣人的生活中，事實上比起澳洲台灣受美國流行文化影響更深，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模式上也常帶有美式風格。但美國風格在台灣人的印象中是更高一層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想像，比起澳洲或是日本等亞洲國家，打工度假者對於在美國當地的生活較無自信，因此 Danny 才會認為他太難去，是一種力所未逮想像。因此，選擇澳洲作為打工度假的目的地便成為了能力所及最佳朝聖之地。即便有機會前往更高度現代化的歐美西方國家，也不是所有打工度假者可以想像與有能力去實行的。

台灣青年赴海外打工度假的動機涵括了經濟與文化，而影響他們對於目的國家的選擇則是基於現代性的想像。身為亞洲國家的台灣，對於現代性的想像分為兩種，一種是文化較為親近的日本，一種是絕對現代性的西方世界。由於日本文化深刻地影響亞洲國家，因此台灣對於日本具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性想像，而這樣的想像又帶有更多的親近性，所以部份打工度假者對於日本懷著高度興趣。然而，這樣的現代性是專屬於亞洲國家的，在全球化下，對於現代性的想像來自於西方現代國家的文化傳播與影響，因而他們在眾多的打工度假國家中傾向選擇同屬西方國家的澳洲。但澳洲並非現代化的終點，通過澳洲，台灣青年企圖前往更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因此當語言隔閡不存在時，許多打工度假者的首選便改成歐美國家，顯示歐美國家更具現代性的特質。形成這樣的現象來自於對現代性的階層化想像，我們將澳洲視為較低階現代性的國家，因此對於台灣打工度假者而言是相對容易進入與生活在當地的。而歐洲、美加等國家具有的現代性更高，門檻也高，雖是打工度假者最終的聖地，但並不是現階段可以企及的國家。同樣的思考邏輯也發生在同樣來自於東南亞國家的菲籍移工，對他們而言，來台灣工作是



一種到具有現代性國家的朝聖之旅，但台灣僅僅代表亞洲的現代性。因為在像台灣這種現代國家之外，還有更高一層的現代化國家，就是所謂的歐美西方國家，而這樣的國家才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移居地，台灣僅是作為他們前進西方現代國家的跳板之一。

第五節 小結

澳洲打工度假作為近代台灣社會中青年大量遷移的一種管道與手段，呈現出來的是當代台灣青年對於成就與探索的一種新的方式。打工度假者的動機可分為經濟層面與文化層面。從經濟動機來看，澳洲高於台灣數倍的薪資吸引著在身處在低薪化與責任制窘境中的台灣青年。而從文化上來看，體驗國外生活成為當代台灣青年想要達成的目標之一。這樣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近年來 gap year 這種流行於歐美國家的青年探索世界的方法席捲台灣青年，許多台灣青年認為 gap year 具有現代性的象徵，通過進行 gap year 行為，也是一種獲得西方現代性經驗的方式。因此，在國家的選擇上則必須以西方國家為主，而澳洲最符合以英文為第一外語且嚮往西方現代性的台灣青年的目的地。

然而，前往西方國家體驗生活所費不貲，所以打工度假是他們能採取的最佳方式。打工度假包含的背包客精神以及探索世界的方式，恰好與歐美青年 gap year 的方式類似，因此選擇打工度假做為體驗世界的方式也是實踐現代性想像的手段。因為出國所帶回來的經歷，已經讓這些打工度假者獲得與在家鄉的親朋好友不同的身份地位（藍佩嘉，2005），因此他們在澳洲當地所有經歷過得一切都可以是一種購買現代性的身份的方式（林秀麗，2000）。因此，採用打工度假作為體驗西方生活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消費形式，藉由這樣的方式，以將體驗經驗轉化為文化體驗資本，在主觀評價上區別自身與其他打工度假者的不同。



移動之所以可能，進而被完成，除了驅動個體移動的動機外，社會網絡也是其中的關鍵。對於打工度假者而言，社會網絡的有無與強弱會影響其遷移的意願，擁有社會網絡的個體其遷移的風險與所需的成本較低，因此其遷移可能性也較大。而社會網絡越強者，在澳洲當地所遭遇到的困難較少，特別是在找尋工作上，也保證了個體能夠在澳洲繼續生活下來。社會網絡的另一個形式展現在仲介公司上，對於社會網絡較缺乏者而言，尋求仲介是延長在澳洲時間的重要方式。而仲介發揮的功能卻不僅是仲介工作，還有著工作類型與型態以及分類勞工的功能。通過當地澳洲仲介找到的工作幾乎都是白工，是擁有完整權益保障的工人。但仲介所仲介的工作也多半集中在農工廠或大賣場中，因此能找的工作類型也受限。形成集中在這類型工作的現象並非單純的分派結果，而是仲介基於個體所屬國家的全球位階來做決定的，因此來自亞洲的台灣打工度假者多半被想像成不適合低階白領及服務業工作，同時又能夠接受較差的工作條件的勞工，因此所作的工作也集中在第一級產業。

透過打工度假是實踐現代性想像與消費的最佳管道，而現代性也是打工度假者選擇工作居留地時考慮的重要方向。對於部份打工度假者而言，日本除了是現代性國家以外，同時也具有文化上的親近性，因此選擇日本既親切又不陌生。然而，對大多數的打工度假者來說，有一種更普遍的現代性驅使著他們選擇澳洲，那就是西方現代性想像。通過選擇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在此獲得更高階的現代性文化體驗資本。而比起澳洲，還有更高一個層級的現代性國家，就是歐美國家。這些具有高度現代性想像的歐美西方國家，並非現階段打工度假者所能企及的，必須再累積更多的文化資本以後才得以前往。而這樣的思考邏輯與前往海外工作的菲籍移工不謀而合，就如同 Appadurai 描述全球化在亞洲所表現出來的被動接受甚至是渴求的狀態。



第三章 社會位置與打工度假經驗

本章針對打工度假者對於他們在澳洲的所作所為以及有所獲得進行分析，並且企圖論述出他們的異質性。即使同樣在澳洲打工度假，其所思所想仍會因社會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區別。由於所有的打工度假者均非同質化的個體，當他們面對相同情境時，做出的判斷也會有所不同，這樣的的不同取決於其文化與經濟資本的多寡。因此，我在本章先以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為他們做分類，並從三個層面切入，向大家展示打工度假者的異質性。首先從首站，也就是前往澳洲的第一個降落地開始，每個打工度假者便會因為其所處的社會位置、擁有的經濟與文化資本的多寡做出不同的回應，選擇不一樣/一樣的首站。而當台灣打工度假者進入澳洲當地後，他們的經濟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是如何展現在其面對工作的態度、旅遊的規劃，甚至是金錢的使用態度。最後，他們如何回應自己的打工度假旅程，以及試圖向他人闡述打工度假之所獲時，我們將能看到不同社會位置的打工度假者主要的對話對象究竟是誰，而他們又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打工度假經歷。

第一節 打工度假者的四種類型

「我是到澳洲打工度假的背包客」這句話幾乎已經成為了遠赴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必備的開場語，通過前往同樣的國家，從事同樣的打工度假行為，這群台灣青年將自身定義為澳洲打工度假的背包客。他們談論相同的澳洲風土民情，分享同樣的異國風情，卻不一定共享相同的經歷。打工度假者可能因為不同的動機與目的而選擇了不同的工作類型，得到了不同的工作體驗。他們也可能因為旅遊了不同的澳洲地區，而有了截然不同的旅遊經驗。更可能因為不同的社會網絡，在澳洲過了不一樣的生活樣貌。然而，無論動機、目的、旅遊或是社會網絡如何影響他們，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的不同才是他們擁有不同經歷最主要的決定性因素。



在台灣由於高等教育普及，台灣青年取得大學學歷的比例偏高，而台灣赴澳洲打工度假的青年也有 8 成 5 以上是大學學歷。雖然大學學歷容易取得，但大學的優劣仍舊影響著台灣青年在接收相關訊息以及其他文化資本的培養，例如語言。而語言在澳洲當地無論是求職或是交友，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打工度假者能找到的工作類型、工作好壞以及薪資基本上與語言能力是成正相關的。除此之外，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其擁有的經濟資本多寡也會影響他們在澳洲當地的行動策略。因此，我將語言與學歷劃歸到文化資本內，以文化資本的高低與經濟資本的多寡將打工度假者分成四類（見表五）。

表五 各國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之學歷

| | | 文化資本 | |
|------|---|------|----|
| | | 高 | 低 |
| 經濟資本 | 高 | I | II |
| | 低 | III | IV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屬於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都相對較高的類型，他們來自國立知名大學，科系也算熱門，英文能力普遍高於其他三個類型的受訪者。其家庭的經濟狀況良好，可以提供他們國內外旅行、遊學甚至留學的費用。而第 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則是經濟資本高，但文化資本較低的打工度假者，因為其家庭較為富裕，因此在成長過程中便有接觸外國人的經驗（如遊學、接待家庭）。然而他們畢業於後段大學院校，語言能力也不出色，持有的文化資本較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少。第 III 類型的特徵則是文化資本較高經濟資本較低，他們就讀國立知名大學，語言能力出色，也具有出國留學的能力，但其家庭經濟能力偏低，無法供應他們出國留學的經費。最後一類的打工度假者，他們多半就讀技職體系的學校或是後段大學院校，語言能力僅勉強用於溝通。而其家庭狀況也無法提供他們



出國的任何經費，即使旅行也是要自行存錢前往，這種文化資本低，經濟資本也少的打工度假者為第 IV 類。因為擁有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有明顯落差，因此他們在澳洲打工度假時所採取的手段方法也有明顯差異，下一節將從打工度假者對於首站的選擇來看打工度假者的四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社會資本對於打工度假者的各項決策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Bourdieu, 1984），但社會資本並不那麼隨著經濟或文化資本高低而起伏，許多打工度假者會透過在台灣上網找一起去的旅伴、當地 share house 認識的人以及工作的同事等，在當地累積新的社會資本，以便打工度假過程順利，因此我將社會資本當成一個重要變項，但不影響打工度假者的類型區分。

第二節 富含經濟與文化資本的第 I 類型

一、能夠自由選擇首次降落地點

「你第一站飛哪裡阿？」這個問題是打工度假者決定出發時面臨到的第一個選擇，而第一個降落地點不是隨意的決定，通常是多數打工度假者在深思熟慮並且多方查找資料後才選擇出來的，因為首站的選擇幾乎決定了打工度假者找尋的工作類型，對於部分打工度假者而言，什麼時間出發必須要跟首站降落地點搭配，才能將打工度假過程中找工作的風險與等待工作的時間降至最低，因而首站的選擇影響打工度假者對於此趟旅程順利與否的評價。打工度假者因為動機與目的不同，所以選擇不同的降落地點。而我的研究發現選擇以哪座城市為打工度假的起點與他們所擁有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多寡有關。因此，對於打工度假者而言，首站降落的地點並非任意挑選，而是奠基在他們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高低。透過評估這兩項資本的高低，來衡量降落在那一個城市對他們較為有利，所以，首站降落地點對他們而言十分重要。



打工度假資金的多寡會影響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當地的生活方式，語言能力則會影響打工度假者工作找尋與取得的難易，而人脈的有無對於打工度假者在當地的資訊獲得以及某些類型工作的取得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但這些變項對於第 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來說幾乎不起作用。這種隨心所欲的選擇不是所有類型的打工度假者都可以作到的，第 I 類打工度假者他們擁有充足的經濟資本，所以幾乎整個澳洲他們都能去，同時他們的文化資本也足以讓他們在城市與人溝通並且找到工作。而擁有去過得經驗這樣的文化資本本身也是來自於經濟資本的消耗所獲得的，因此，第 I 類打工度假者的選擇便反映出他們這兩項資本較高的事實。

對於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來說，由於其經濟資本以及文化資本相對較高的緣故，他們不受限於待在城市或鄉鎮，因為旅費較為充足；由於他們英文能力較好，所以他們不會受困於工廠農場，而能選擇相對較搶手的。因此在首站選擇上，多半以個人的意願為主而做出選擇。像 Isabel 輕描淡寫的說出她怎麼選擇澳洲降落地，「我選 Perth，就是因為我去過東澳了，所以就選西澳⁵」。因為去過東澳，所以選擇西澳的柏斯，暗示了 Isabel 曾經來過澳洲，並且在東澳待了足夠滿足體驗的一段時間，因此她才選擇西澳。這樣子的選擇法，帶出了 Isabel 來自於一個經濟相對優渥的家庭，能提供她出國的經費，事實上她之所以選擇澳洲作為她打工度假目的地，就是因為她高中時期曾前往澳洲遊學，對澳洲有著不錯印象的緣故，才選擇再次前來。由於 Isabel 以前就有接觸過澳洲的經驗，這樣的文化資本使得她在選擇首站的地點上以沒有獲得經驗的西澳為目標，而這樣的文化資本來自於其家庭的經濟資本較多，所以第 I 類打工度假者的隨心所欲是必須基於其較高的文化和經濟資本才能做出的選擇方式。

雖然對於第 I 類打工度假者而言，社會網路的影響相對第 IV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來說較不多，但也不是社會網路一定沒有影響，他們的社會網路影響的可能只是他們選擇澳洲的原因，因此降落的地點也是跟著社會網路而決定。

⁵ 20130923，Isabel 訪談。



以 Ian 為例可以較清楚的理解第 I 類打工度假者的社會網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影響其打工度假首站地的選擇。

「因為我姊姊要從澳洲畢業，所以我去（雪梨）找她參加畢業典禮，就留在那裡。飛雪梨的人很少，第一站選擇雪梨的人非常少。你想你在雪梨，一個背包客，台灣人的英語能力能跟歐美拼嗎？別說歐美，還有一堆雅思 6.5 以上的留學生。而且雪梨，都市嘛，在都市花錢的速度就會快」。

（20140125，Ian 訪談）

在開始分析之前，先要來了解 Ian 的背景。Ian 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國立知名大學畢業後父母希望他能出國深造。但 Ian 無法決定自己要先工作還是先讀書，剛好退伍後姊姊從澳洲研究所畢業，Ian 便決定前往澳洲參加姊姊的畢業典禮並且申請打工度假計畫到澳洲體驗看看，如果適應良好的話，他打算在澳洲就讀研究所，因此對他而言打工度假只是一個測試適應程度的方式，尤其是留學生活，因此他選擇與姊姊共同的城市前往。姊姊這個社會網絡提供了他關於澳洲當地的資訊以及具體的協助，特別是食宿問題。除了社會資本以外，Ian 提到雪梨是一個很少有人選擇的地方，其理由是英語能力與花錢速度，從這兩個理由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對於打工度假者首站選擇的直接影響，對文化資本較低但經濟資本較高的打工度假者而言，他們雖然能夠在雪梨維生，其語言能力卻可能讓他們在當地求職出現阻礙。

對經濟資本較低的打工度假者來說，無論有無語言能力，雪梨的高消費都不是他們所能負擔的。因此，能選擇大都市落腳的只能像是 Ian 這樣經濟與文化資本都高的打工度假者，他也因此區分了他與打工度假者的不同，「我住這邊物價指數比較高，所以相對來說就不是那麼多人住在這裡」，這樣的的不同也突顯了他們所能獲得的體驗類型，這將在第四節做出分析。



從第 I 類打工度假者對於首站選擇的情形中我們會發現，對他們來說，選擇首站的降落地點並不是必須深思熟慮的事情，可能因為之前的經驗或者是社會網絡的關係，所以他們選擇了某些地點。但相對於其他類型的打工度假者而言，這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對於首站的選擇更加自由，更不受限於資金與語言等條件。

二、以度假為主要目的

不同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當地對於工作的選擇以及生活樣式受限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多寡，而因為此種限制所得的結果反過來又會影響他們對於旅行與生活的安排模式。因此，我將從他們對於工作、旅遊以及生活這幾乎涵蓋澳洲打工旅遊的各個面向做切入，觀看他們採行怎樣的工作策略，以及對旅遊與生活如何安排與規劃。從他們對於工作、旅遊與生活的規劃與安排中，我們企圖進一步找出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如何影響每一個打工度假者，而他們又如何從自己的階級位置出發，突破階級所帶來的困境。

「機票錢我買國泰來回票，29000 元。我沒有時間去想這件事情，所以不搭廉航。我們家有比較常找的旅行社，我就直接打電話跟他說，請他幫我多留意一下最近的機票，可以的話就先幫我訂，我時間非常趕」。

(20140125，Ian 訪談)

經濟資本與時間的相互替代性對於第 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來說是高的，對 Ian 他們來說，時間比金錢來的重要，因此花錢能解決的事情，就不用在分神去處理才是有效率的作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第 I 類型打工度假者在金錢的使用上並不會有太多的規劃，因為經濟資本不是他們需要煩惱的事情。Isabel 對待金錢的態度也同樣如此，她來自於經濟狀況好的家庭，對她而言來到澳洲賺錢這一回事不是優先考量，「一開始都去觀光，去 Perth 附近觀光，觀光一兩個禮拜，花超多錢的」，因為她不需要煩惱經濟資本短缺的問題，即使她真的玩到沒錢了，「就回台灣就好」。



再加上她畢業於國立知名大學外文系，擁有相當好的語言能力，以她所擁有的語言能力在澳洲要找到工作並不難，因此她在一抵達澳洲時比較不在意旅費的花費。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皆充足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生活與旅遊型態十分接近傳統的背包客，他們可以對於旅行說走就走，旅費沒了可以靠自己賺取，無法生存下去便回到台灣，不用擔心太多問題。

因此，從他們的規劃與進行模式上我們可以看到經濟資本較充裕的打工度假者不用急著累積經濟資本，可於進入澳洲當地便開啟旅程，或者是工作途中便可毅然決然離開工作進行旅行。加上此類型打工度假者的語言能力較好的關係，即便中途離開工作，也能迅速地找到下一個工作機會。所以對他們來說，來澳洲旅費並不用戰戰兢兢地依靠打工來負擔，而是以度假為主，打工只是體驗生活的方式，更不需要賺取一定的金錢回到台灣，所以想去哪裡就即刻出發，不用思慮太多。

第三節 經濟資本充裕文化資本較缺乏的第 II 類型

一、目的導向的首站選擇

Oscar 因為不做農場工作，因此「第一站飛墨爾本，因為他是大城市」。Oscar 畢業於私立資工系，家中曾經有做過接待家庭的經驗，因此他在打工度假前就有與外國人密切接觸過的經驗。因為就讀私立學校的關係，英文程度中等，所以在畢業後趁著去歐洲旅行的時候，在英國上了三個月的語言學校。打工度假的資金由家裡援助，因為資金充足加上對餐飲服務業有興趣，因此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目標就是不做農場、工廠，只待在大城市找餐廳等服務性質的工作。所以他第一站選擇了澳洲的第二大城市墨爾本，以待在大城市找餐廳工作為行動方針。



像 Oscar 這樣便是屬於擁有高經濟資本，但文化資本偏低的第 II 類打工度假者。他們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本能夠讓他們選擇居住在花費較高的大城市。又可以再去澳洲前先行前往英國學習語言。Bourdieu(1984)分析階層化時提出四種資本概念，文化資本是承襲於家庭，反映出其階級的語言、行為等文化，然而，像學歷等文化資本也可以以花費經濟資本來做累積。所以，我們看到雖然 Oscar 文化資本偏低，但因為家庭資金充裕，他能藉由到國外就讀語言學校來積累語言能力。

當代的社會位置有時候並不一定是由家庭所決定的，許多時候個人的人力資本較高時，也能取得較高的社會位置，進而企圖將較高社會位置所帶來的經濟資本轉換成文化資本，以建立地位身份的正當性與持續鞏固。部份打工度假者因為在台灣的工作薪水較高，但其文化資本偏低，使得他們在工作上施展不開，但家庭狀況可能不能夠援助他們到國外進修，且自身的經濟狀況也不足以讓他們出國留學。因此他們選擇到澳洲當地用相對留學較短的時間累積文化資本。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目標很明確，我只能在城市，我只能在好的餐廳，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學到更多的英文和國外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去布里斯本。(20140125, Gill 訪談)

Gill 在台灣從事電腦業務工作，年薪超過 60 萬。但其畢業於私立技職學校，且沒有出國留學經驗，因此在跟國外客戶應對上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的同事都是國外回來的，只有我是從基本開始學。同事都是國外回來，我們在跟客戶接觸時，我自己覺得似乎沒有跟同事一樣可以跟客戶這麼快就打成一片。

因此她企圖藉由打工度假到澳洲累積能夠跟客戶打成一片的文化資本，以期業務能夠順利推行。文化資本揭示了階級的差異性，並透過品味展示之。個體會顯示出自身應有的位置感，並做出並且將每個人的行為導向合乎自身文化地位所應表現出來的樣子(Bourdieu, 1984)。由於 Gill 沒有留學的經驗，更沒有與外國人長時間相處互動的機會，因此她在面對國外客戶時，雙方沒有共鳴，所以 Gill 認為她



必須出國一趟，並且與外國人有密切的相處機會，以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我沒有喝過洋墨水，所以這應該也算是過水的一種吧」，她將打工度假視為一種轉換機制，通過在澳洲打工度假，她能將經驗轉化為文化資本，以利她在工作上的提升，並且進而轉換為經濟資本，提高她的業務業績。對他們而言打工度假提供的場域恰好符合他們工作的需要，單純的留、遊學反而用處不大。

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了解到對於第 II 類的打工度假者而言，雖然其文化資本偏低，但透過經濟資本的消耗，他們能夠順利的將經濟資本轉換成文化資本。而這樣的文化資本對於他們未來求職或是職涯發展都有顯著的助益。所以他們在選擇首站時考慮的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那個地方能夠符合他們累積文化資本的期待，而這樣的地方只能是在城市，而且只能是有接觸外國人機會的餐廳。

二、 累積文化資本為主要目的

第 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因為她們主要的目的在於將既有的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做累積，進而提昇或是鞏固固有的階級地位，因此旅遊對他們來說不在必要事項之內，受訪資料也顯示出他們除了去幾個著名的景點進行重點旅遊以外，多數的時間都在工作場所內與外國人積極的互動與相處，以達成他們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主要目的。對於經濟資本較高但文化資本較低的第 III 類打工度假者來說，他們對於工作的態度便完全不同，工時與報酬可能不是他們考量的重點，如何透過打工接觸到外國人，讓這樣的互動成為可累積的文化資本才是他們的目的。



因此我們可以從 Gill 的工作目標找到一點端倪：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我的目標很明確，我只能在城市，我只能在好的餐廳，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學到更多的英文和國外人的生活方式。我的目標只能在city，city之外，因為我不做黑工，就是我不做黑工，因為如果做黑工，這個薪水我不如在台灣就好。接著是我要鎖定比較好的餐廳，或者是跟我上班的人是外國人，或者老闆是外國人。(20140125，Gill訪談)

Gill 來到澳洲的目的便是為了跟外國人有更多的互動機會，以增加職場優勢，因此她在澳洲同時兼了三份工作：subway、高級外國餐廳與高級香港餐廳。由於她的目的是與外國人有更多的互動，能夠接觸到外國人的工作機會多半集中在餐廳等服務業，因此她專找這類型的工作。而她這樣的兼差模式也面臨到了一些困境：

subway平日也有班，平日有時候是兩到三個小時，比如說是下午六點到十點的，或是四點到六點、兩點到七點的，他們的班都很特別，都是這樣排，我只要可以軋的到的我都做。我的原則是我都先接，衝到其他工作的時候再請同事代。因為你拒絕的話，你好不容易得到的班，你知道嘛，所以我都是先接了再說。(20140125，Gill訪談)

Gill 採用的打工策略便是先應允再說，她清楚如果她今天拒絕太多排班的機會，那可能雇主就不會想要給她太多工作機會，那她也就失去了與外國人交流的重要管道。所以她只好把工作全都先接下來後，有衝突的工時便在做出取捨後請同事代班，如此一來，她便能用最少的時間做最多的工作與得到更多的交流機會。

第 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對於打工的主要目標並非打工與度假，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經由打工或是生活模式來接觸外國人，以取得較多的文化資本，因此其對於度假與打工形式與規劃較不在意。而藉由這種模式所累積的文化資本，未來在職場上也可讓他們轉化為經濟資本，就像 Gill 認為她回台灣後在業務處理上較以往得心應手的原因，便是來自於在澳洲打工度假期間與外國人相處的經驗所造成的。



第四節 文化資本充足卻缺乏經濟資本的第 III 類型

一、低成本高報酬的首站

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有著較好的語言能力，他們大多要思考的就是經濟問題，如何用最省錢的方法將澳洲玩遍，才是他們最為關心的。因此，從出發前的準備他們就是以最低花費為主。Nancy 便是以月份作為衡量機票金額的基準，「2010 年 9 月去的，因為春天跟秋天機票最便宜。所以我 9 月 20 號出發，單趟機票只要 8000 元」。Rita 也抱持著同樣的想法，「到伯斯，因為伯斯便宜就去伯斯」。對她們而言，因為有著好的語言能力，所以較不擔心在澳洲的工作與生活，所以只要能到澳洲，她們就有辦法可以維生。但她們的旅費不多，且家中也難以給任何援助，因此她們只能從各個地方省錢來讓她們打工度假的旅程走得更遠一點。而像柏斯之類的地方機票會相對便宜，還是由於台灣打工度假者大量前往當地的緣故，形成這樣的結果仍是跟柏斯位於西澳，且西澳屬於較為偏遠地帶，其僱用薪資較高的原因。所以，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選擇柏斯或是西澳地區也是為了後續找工作的經濟層面做了充足的考量。就像 Leo 告訴我們：

蠻多人第一站就去柏斯的，因為西澳畢竟還是工作薪水比較高，我覺得拉，我會比較喜歡柏斯，他是一個小小的城市，不像大城市壓力那麼大，待起來蠻舒服的。他是西澳的唯一一個城市，其他都算鎮。西澳跟北領地薪水都算高的。

Leo 認為西澳的薪資水準相較於東澳高，且因為柏斯算是一個小城市，比起大成是的花費跟生活壓力相對較低，因此選擇柏斯在經濟考量上最為適當。事實上，第 III 類與接下來要論及的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對於首站如何選擇的出發點都是來自於經濟上的考量，但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相對語言能力較好，因此對於社會網絡的依賴較低，從這也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在澳洲打工度假所發揮的重要性。



二、 打工與度假合而為一

在旅遊態度上與第 I 類型相似的便是文化資本較高但經濟資本較低的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但因為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經濟資本相對較低，因此即使他們跟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採取相同的旅遊方式，其玩法卻大相逕庭。

我在水蜜桃農場待了五個月左右就開始玩，是用打工換宿的方式。從 helperX 加入會員，好像是 800 元台幣吧。helperX 是打工換宿的網站，我中間有去 2 個馬場打工換宿，第一個待 3 個星期，第二個是 2 個多星期；還有去畫家的家裡待一個星期照顧貓、打掃餐廳。換宿超級推薦，可以體驗到台灣體驗不到的生活。(20140128，Nancy 訪談)

屬於第 III 類的 Nancy 採用了食宿交換的方式作為旅程的規劃，而跟她一樣採用食宿交換方式的還有 Rita：

我找到一個食宿交換，搭了 12、13 小時的地方去墨爾本近郊 3、4 小時的距離。那時候在墨爾本有一個 HelperX 的工作，住的地方像是民宿，是住車屋。早上起來餵動物，因為他們算是一個農場；然後會有來住宿的客人，我們帶著小孩子去餵食。中午就回去房子裡面看有沒有需要幫忙的，照顧生活起居。真的很深度瞭解澳洲人的生活，或者想法。澳洲人除非在城市長大，不然腔調都很重，會讓人聽不清楚。(20140126，Rita 訪談)

由於第 III 類的打工度假者擁有較好的文化資本，因此她們能夠得知食宿交換的訊息，並且有足夠的能力與有腔調的澳洲人溝通，藉此得到食宿交換的機會。因為她們的經濟資本較為缺乏，但她們又不願在打工跟度假的分配上偏向打工太多，因此她們透過食宿交換的方式體驗澳洲，並且將這樣的體驗視為深度了解澳洲生活最佳的管道，以此將自己所採用的方式做了一個更好的詮釋，顯示她們與其他打工度假者純粹在澳洲旅行所能得到的體驗的不同。



第五節 經濟與文化資本相對較低的第 IV 類型

一、逐水草與網絡而居

當打工度假者的文化資本不足時，可以透過經濟資本作轉換來彌補。但當打工度假者的經濟與文化資本都相對偏低時，如何讓經濟資本保持充足，甚至更多便是第 IV 類的打工度假者的首要目標，以便達成「留下來久一點」的目的。由於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所擁有的經濟資本跟文化資本都相對偏低，因此他們的打工度假每一步都必須深思熟慮，稍有不慎可能就要提前回國或是進入勞動條件更差的黑工生活。由於他們所擁有的旅費不多，加上英語能力偏差，能找到的工作也多半偏向較少互動的農場工廠。

即便在澳洲從事第一級產業的工作並不困難，但因為打工度假者眾多，許多農場早已有人先卡位或是一個拉一個，而工廠透過朋友介紹成功率遠高於自行尋找，所以第 IV 類的打工度假者想要找尋這一類型的工作時，就必須要對澳洲的農作物（或是漁獲）盛產的季節有一定的瞭解，或是擁有相關人脈，才可能順利取得這類型的工作。許多第 IV 類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機場降落後，便會直接前往目的地的鄉鎮尋找農場工作。但農場多半在偏遠的小鄉鎮，來回的交通費昂貴，因此打工度假者若沒有對當地的作物有相當瞭解或是有朋友先行卡位，基本上可能會血本無歸，花了車錢與住宿費卻找不到工作的情形也時有耳聞。

Hana 描述她為何選擇布里斯本的理由能夠幫助我們更加了解澳洲找工作的原則與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選擇首站的方向如何結合在一起的：

那時候看四月份 Brisbane 是草莓季，草莓的季節。剛好也是因為我姐的大學同學在 Brisbane 工作，所以我們一開始去的時候是先跟他聯絡，然後住他那邊。(20140129，Hana 訪談)



從 Hana 的敘述中可以整理出兩個影響打工度假中工作尋找的最大變數：季節與朋友。如果打工度假者試圖找農場工作，季節對他們而言就變得十分重要，他們要掌握各個農產品的淡季跟旺季。有時即使知道了季節變化，但因為競爭者眾多，許多人在季節開始前一個月便會落腳在附近小鎮等待工作，而等待工作等同於寅吃卯糧，因此透過以在農場工作的朋友介紹或是佔缺才是農場工作最佳的取得管道，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幾乎多半採取這樣的找工策略。

然而，對於他們而言，為何首站的選擇與工作必須要有所連結呢？以下我們將以 Hana 為例來談第 IV 類的打工度假者的思考模式，以便能讓我們更清楚的理解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都低的打工度假者，如何藉由季節以及人脈來確保自己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工作。

Hana 畢業於私立科大，英文並不算好，雖然預期的工作目標為 house keeping，但她猜想自己可能的工作類型應該還是以勞力為主的農場工作，因此在買機票的時候就選擇出發月份盛產該作物的城市。她就像多數的打工度假者一樣，必須先工作幾年存了一些旅費後才得以出國打工度假。由於資金有限，因此在澳洲若要多待一些時間，就必須要儘速投入工作中以便賺取旅費。然而，Hana 以及多數的打工度假者都知道 Caboolture 是布里斯本有名的草莓盛產地，而四月份正是草莓的旺季，如果要做農場工作選擇布里斯本可謂是最好的選擇。

此外，由於 Hana 姐姐的朋友在那裡，也可多一個人照應，因此她就選擇布里斯本為她的首站，開啟她為期兩年的打工度假之旅。由於 Hana 出國的經費是來自於她的存款，因此對她而言選擇打工度假才可以在國外待久一點。但若要待久一點，她必須盡早投入工作，賺取足以支持她留下的旅費，並且在其他固定花費上少支出一點，達到開源節流的效果。所以比起第二類打工度假者選擇大城市為落腳點，Hana 可能較無法負擔城市的花銷。此外，因為 Hana 的英文程度較差，城市的工作她可能也無法勝任，因此她選擇可以搭上農產季節的產地所在地降落。



另一方面，當地存在她可利用的社會網絡，也加深了她降落在布里斯本的意願。

透過移民在當地的摸索，他們能夠提供給後續者更多關於地方的資訊，甚至是具體的協助，就像 Hana 去投靠姊姊的朋友，而姊姊的朋友提供她初期的住宿以及相關的生活知識。Kiki 告訴我們她的決定就是取決於朋友在哪裡，「我一開始先飛 Perth 西澳，因為我那唯一的高中同學就在 Perth」，前往有社會網絡的城市，比起貿然前往一個陌生之地，對女性而言或許更加重要。除了性別以外，對於社會網絡的依賴隨著這類型打工度假者的經濟文化資本下降而成反比上升，越是缺乏這兩項資本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維生就越是困難，因此他們會更加依賴社會網絡。上一章所提到的 Danny 就是一個例子，對他來說，朋友是開啟他接觸到打工度假的主因，所以朋友在那跟他會合，他就必須要降落在那，而他也只能這樣想。

當經濟資本較為貧乏時，許多看似自由的選擇便成了紙上選項，有這樣的管道，卻無法隨心所欲的選擇。對於這些打工度假者來說，他們對於澳洲的認識可能只有雪梨或是袋鼠，但因為擁有的經費不多，導致他們必須查詢更多的資料，確保自己在澳洲當地能夠衣食無虞，且能賺取足夠的旅費讓他們體驗在澳洲生活。因此，他們順著季節性作物決定降落地點，通過對於社會網絡的依賴取得工作，就像 Hana 即使蒐集到布里斯本在四月是草莓季的資料，如果沒有朋友在那裡幫你穿針引線，很有可能到了當地只能望莓興嘆。以致於朋友、社會網絡成了決定要素之一。當首站的選擇與工作和朋友結合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是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相互運作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影響了打工度假者的選擇方向，使他們只能在既有的選擇下做選擇，而這樣的選擇又會影響他們在澳洲當地的生活方式以及尋找工作的方法。



二、 精心計算下的打工與度假

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皆低的第 IV 類的打工度假者幾乎不能在起初就將旅費消耗殆盡，他們基本上來自經濟匱乏的家庭，打工度假的基金是他們工作數年後才存下來的。加上他們的語言能力相對較差，因此在澳洲找工作並不容易，更無法採用食宿交換的方式來進行澳洲巡禮。所以，當他們抵達澳洲時，幾乎都在一個星期內便找到工作，有些甚至已經在台灣跟當地的黑工仲介聯絡上，深怕自己在澳洲面臨找不到工作很快就必須回台灣的窘境。Allen 跟 Danny 便屬於這類型的打工度假者：

Allen：我是拿公司的年終獎金去的，我是領完年終獎金之後就計畫出國。

Danny：我是用我的儲蓄，這很正常吧，你工作兩三年一定有存到錢吧。

Allen：我準備七萬塊，加機票跟電腦大概十萬十一萬，因為我機票買很便宜的，我買單程，不打算這麼早回來。

Danny：我也是買單程的

Allen：想說跟他賭一下，不要因為有來回機票就輕易回來。

Danny：我帶三千耶。因為我朋友跟我說帶三千去。

Allen：我先前大概準備了十萬左右，加買電腦。

Danny：機票一萬多還多少錢，那時候也是買廉價航空的，jetstar。飛新加坡，從新加坡飛澳洲。

Allen：我把股票賣了，就是為了去澳洲。(20140424, Allen 與 Danny 訪談)

如同 Danny 與 Allen 這樣的打工度假者必須在出國前存一筆錢，而這筆錢因為數目不大，如何以最少的代價換來最大的效益便是他們考慮的因素。所以他們選擇買最便宜的機票，即使要花時間轉機也無所謂，因為時間與金錢的轉換落差不大。為了讓自己這一趟是確實有實際上的金錢收入，他們破釜沈舟買了單程機票，如果他們在澳洲求職不順利，家中的經濟狀況也不足以支付他們回國的機票，且兩手空空的回國還會遭致責罵與冷眼。因此，他們必須一下飛機就找到工作並且上工，將



純粹花錢的時間壓到最低，避免上述的悲劇發生。而這類型的受訪者在花錢態度上最為錙銖必較，並且也跟在台灣的花錢態度相似。

Hana 的金錢使用態度就反應了第 IV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打工的思考重心：「因為我不會讓自己花到完全沒錢，我會至少留一些錢，等到那些錢到了一個底線，我就會開始找工作。比如說我就設個大概兩千塊，低於兩千我就開始找工作，不會讓自己身上完全沒錢」，對他們來說，一定比例的錢是不可動用的，因為錢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而且沒有錢會引起他們的恐慌，因此設置一條底限，至少最後還能夠回到台灣這件事情是首要準則，當身上所擁有的存款低於某一個基準線下時，這些打工度假者便會積極地尋找短暫的工作來繼續積存所需旅費。而這樣的守則也反映在他們對於打工與度假的安排與比例分配上：

Allen：我習慣是賺一部份的錢再玩，所以後面那兩個月我都沒工作，就是休息跟玩。

Danny：我會想要存到一筆錢才去玩，有錢才敢玩阿。

Allen：我是沒有（底線）拉，因為我自己都有預算好，我去玩得時候，那個錢我都預算好了，包括我沒工作的時候，我都預算好了。

Danny：我會看每個行程，每個行程有預定的額度阿，不要超過那個額度就可以阿。

Danny 跟 Allen 認為玩樂必須要在賺錢之後才能行動，因為有錢才敢玩也才能玩，所以他們會在工作結束後才進行旅遊計畫。而且每一趟旅程的花費都是有上限的，這樣的上限也會決定他們能去哪裡玩以及怎麼玩。因此，比起其他類型的打工度假者會毅然決然的拋下工作，或是請假個三五天出一趟遠門去別的地方度假，他們多半只會在農閒在附近來個當天來回，或者是長一點的三天、兩天旅程。像是 York 的旅遊計畫大部分都是「在工作中途（去玩），大概一兩次是玩兩天一夜或是三天兩夜，其他正常的都是當天來回」。



Danny 的旅行態度也是如此：

出去玩都是那種當天來回，開車去那個海灘，不是那種移動去那個地方玩，因為我們到一個地點，通常會待在那邊，然後在附近玩，等這個工作結束，才看說要去哪裡，都是這樣子。常常回到布里斯本市區，去附近某個海灘玩，或是去鄉鎮的某個市集逛街，都是這種的。（20140424，Danny 訪談）

對他們來說，打工與度假不是可以相互重疊的行為，是必須分開的，工作途中能進行的只是小旅行，而不是大度假，我認為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多在偏遠地區，而知名景點大多離這些農場較遠，旅遊成本會被提高，而農場工作有季節性，季節一到就必須要移動到下一個季節地才有工作，而這樣的移動通常都是非常遠的，跨越一個省以上的，因此如果將移動與旅遊相加在一起，反而能將成本降至最低。因此，大型的移動都是發生在他們要轉換工作地點時才會發生，且不是說走就走，而是必須要事先妥善規劃的。他們多半都是在季節快結束時，事先預約好各個可能停靠點的露營場地後，一群人開著租或買來的車移動，由共同旅行者分攤油錢以及中間住宿露營地的場地費，將旅遊花費降到最低。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是經驗，花費的經費多少並不會影響到他們回來跟朋友以及家人分享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資本都低的第 IV 類型不僅沒有足夠的旅費使其可以恣意旅行，語言能力也不足以使她們採用食宿交換的方式來節省打工存旅費的時間，因此他們的打工度假之旅真正在旅行的時間佔十分少的比例，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打工籌措旅費上。打工與度假的時間擁有絕對的此消彼漲的關係，因此對第 IV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來說，如何讓工作效率最大化可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我將特別分析第 IV 類型打工度假者如何使工作時間與效益最大化。



三、 最大化工作效益

每個個體所能做的選擇與決定有限，而這樣的限制卻能經由不同對於工作的應對策略中做些突破。面對有限的資源，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因為其經濟與文化資本相對較低的原因，他們必須採用了更多種手段來破除限制。最常見的就是尋找報酬較高的工作與重複待在同一個工作。在有限的時間內，打工度假者為了實現自己賺錢與旅遊的目標，他們必須要讓工作變得「好賺」。由於這類型打工度假者受限於語言與資金的限制，多半只能待在農場與工廠。

以農場工作中的草莓園為例，我們可以找到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的工作策略。草莓園多以計件為主，動作快慢決定了報酬的高低。許多打工度假者初次碰觸到這樣的工作，動作相對老手慢了許多，因此有時一個月所能賺取的錢多只能打平房租。而且有些農場除了計件制的計薪方式外，在草莓剛開始栽種時還有數量限制，每天提供固定數量的幼芽供打工度假者栽種，如果動作太慢，有時可能連一天的食宿費都無法打平，，打工度假者便會用分工的方式來因應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我們會分工，因為她是戳洞把苗栽進去，我們有時候會兩兩一組分工，戳洞然後插苗。那時候會覺得比較快拉，後來我們就會自己種。因為如果你分工另外一個比較慢的話，其實你會拖進度。就By Contractr就是速度，你速度越快錢越多，所以就是看速度。(20140129, Hana訪談)

從 Hana 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打工度假者在澳洲面臨到農場工作的艱辛時，基本上並不會坐以待斃，而是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去減低工作上的困境，因此 Hana 跟她的同伴使用分工的方式來搶快，等到熟悉以後才自己獨自動作。但計件制的方式實在對打工度假新手十分不利，因此部份打工度假者會像 Danny 跟 Allen 一樣，協助做農場內其他的工作，「我一開始第一天是搬鐵架，鐵架不是彎的，你要去抬用機器把他用彎。（Danny：好工作。對押，我後來有做耶，是時薪耶。）」。對他們來說，即使搬鐵架是一件辛苦又容易造成工傷的工作，但因為薪資計算方式是時



薪，對他們來講就是一件好工作。比起採草莓的計件制，這裡計時制要好賺得多。

對於第 IV 類型打工度假的新手而言，分工以及計時制是他們解決工作困境的方式，而當他們熟練時，尋找高報酬的工作就是首要目標了。

因為草莓數量少，那算第一批草莓出去，所以他會要我們很小心採，其實草莓你指紋一旦壓到，草莓就會爛掉，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採。那時候量少，也是人工拿籃子採，那時候是 by hour 的。(20140129, Hana 訪談)

從 Hana 的這段話能夠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到澳洲的農作物銷售生態，第一批作物的單價最高，所以賣相最為重要。如果此時便採用計件制，那麼採收人員為了追求數量一定會求快而不求好，草莓受損的比例可能就偏高，這樣在單價高時此農場能出售的草莓量就會少，利潤也隨之降低，因此農場主人通常在數量少時便會採用計時制，讓採收人員可以慢慢採收，不至於毀壞商品。而當農場的旺季來的時候，草莓的市價便會隨之降低，此時農場主人便會採用計件制來計價，打工度假者平均薪資也就被速度決定，動作快慢成為維生關鍵。而 Hana 因為已經知曉這個規則，此時她就選擇與朋友去旅遊，避開不好賺的旺季。由於採用的工作策略得宜，因此打工度假者可以用最低的時間與最輕鬆的方式賺進最多的錢。

當這樣的工作模式獲得驗證並且嚐到甜頭，申請二簽的打工度假者便會在第二年重新回到之前曾經待過的地方，重複去年所作過的事情，並且修正之前的經驗。舉例來說，Allen 跟 Danny 在一簽與二簽這兩次打工度假的機會中，基本上上市在同樣的草莓園輪流，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樣最穩定，「他每一年的每個時間都是這樣子阿⁶」。重複之前所作過得工作不僅能降低等工的風險，更因為有過經驗而能快速上手，對於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大多從事計件制的農場工作來說是更有效率與效益的。

⁶ 20140424, Allen&Danny 訪談。



我們可從Webb對於第二年打工度假的規劃得到印證：

後來（我）又回去第一份農場，原本當初想要去別間工作。但當初因為季節的關係，想要安穩的工作只能回到第一間。因為你回去二簽的人，在你前面的人都走了，除非你遇到新人的速度很快，不然你就會是裡面的老手。既然你比較有經驗，在這裡面你賺得當然會比新人還要多。做到八月，三個月後我就回到新南斯威爾斯的藍莓場工作，回到我做兩個月的地方。兩年我就這三個地方輪流工作而已，時間到、季節結束我就走。我八月回去，我做到十一月就直接移動到塔斯了，因為第一年不懂，都會傻傻的一直亂做，可是你知道以後，他的真正產季哪時候好賺哪時候不好賺，那你當然就選擇時間離開。你選在高單價的時間去做，妳的量多你就賺了，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跟別人搶那些量。做到他單價開始變低我就離開，因為我知道他那段時間已經要開始接旺季，單價低，薪水低，時數長。（20140428，York 訪談）

通過第一年累積的技術與經驗，這些打工度假者比起第一次簽證時更能掌握一個農場的淡季旺季，能清楚的判斷價值的高低起伏，因此第 IV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在第二年便可突破因為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帶來的限制，進而快速積累經濟資本，以便第二年做利用。在城市工作的 Oliver 也是採取同樣的打工策略，Oliver 起先是透過仲介找尋到一間有機蔬果超市，在裡面擔任門市人員，六個月期滿後便離開公司。但當他遍尋不著跟之前一樣擁有良好工作條件與待遇的工作時，便想到以轉換雇主的方式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甚至因為他已經熟悉這項工作以及與老闆關係良好，因此也擁有選擇新進人員的權力，Oliver 如果傾向招聘台灣的打工度假者，澳洲打工度假的社會網絡將又多出一條可供移民利用。

然而，這樣的工作策略同時也限制了他們這兩年所能做的工作項目，工作變成一個循環。他們以為自己是在澳洲體驗國外生活，並且將這樣的經驗視為自己跟單純的觀光客以及其他的人不同之處。即便他們曾經在澳洲完整的度過一段時間，但事實上他們僅僅是在澳洲過台灣的生活，甚至是在台灣不願也沒有想過的農村、工



廠等等的低階勞動生活。有趣的是，這樣的工作生活並未讓他們意識到自身在勞動上正在經歷向下流動，這樣的結果就如同華勒斯坦(1983)提出的「半無產階級化」的工人一般，比起無產階級出身的工人，資本家更傾向僱用在農閒時期出來作工的工人，因為這些工人同時擁有農夫與工人的身份，農夫的身份使他們忽略了自己處於被剝削的狀態，甚至甘願接受更低的薪水，因為這只是「暫時的」工作(Wallerstein, 1983)。

對於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來說也是如此，即便他們從事的工作類型是在台灣從不曾列入考慮的農場、工廠工作，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背包客，打工只是為了旅費所需，這種背包客—勞工的雙重身份掩蓋了他們因處於低劣的勞動條件下被剝削的事實。背包客的身份所帶來的自由與彈性，讓他們得意於可以自由的進出工作而不用受到年資、全勤等薪資上的懲罰，而忽略了他們之所以必須換工作且採取這樣的工作策略，正是源自於打工度假所帶來的不穩定性所造成的。

綜合以上對於不同類型打工度假者對於首站的選擇與度假模式的規劃的分析，我們了解到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高低對於打工度假者行為模式產生重大的影響。影響的結果如何合理化他們自身的打工度假經驗，我們將在下一節透過他們對於體驗的描述，來論述他們如何達到第二章所提到的主觀上積累文化體驗的結果，進而合理化他們的打工度假行為。

第六節 打工度假者的主觀評價

打工度假計畫設立的宗旨是希望簽訂協定國家的青年能夠藉由打工度假延長在澳洲當地的旅行時間，並且進行雙方的文化交流以增進理解。但打工度假計畫中，台灣打工度假者能從事的工作類型多半集中在第一級產業等體力性產業，少部份文化資本較高的打工度假者能夠擔任服務生或是 house keeping 等服務性產業，卻幾乎沒有打工度假者能夠從事低階白領的工作。然而，台灣的打工度假者



有將近九成左右是大學畢業，且在台灣從事的工作類型基本上與澳洲打工所從事的工作類型大不相同，幾乎全部的打工度假者在台灣都是白領工作，唯一的差別只是職位與薪水的高低。因此，我認為台灣打工度假者在澳洲至少在工作上是經歷向下流動的。然而，台灣前往澳洲的打工度假者多數在主觀認知上並不認為自己正在經歷階級向下流動，反倒以為自己透過打工度假的經驗，正在累積文化體驗資本。有趣的是，通過他們對於打工度假的體驗描述，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矛盾的狀態得以可能的機制是確實存在的。以下將針對四種不同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如何藉由不同的比較對象，使得工作地位向下流動的結果能夠順利地轉化成文化體驗的珍貴資本，並且讓他們得以在與他人的比較中，感受在主觀上略勝一籌的現象出現。

一、傳統 gap year 仿效：第 I 類對西方現代性的追求

打工度假應該怎樣展現與進行的問題，對於第 I 類打工度假者而言，答案就是 gap year。這個源自於西方的概念，是歐美青年在高中畢業準備要進入下一個生涯階段前的必經過程。gap year 是現代性想像的實踐，打工度假則是實現 gap year 的最佳管道。因此對於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來說，他們打工度假的目的就是為了要 gap year。

Gap year，好像是去各地遊歷，差不多會花一、兩年的時間。歐美的年輕人，完成她們的高中學業後會去遊歷一段時間，再去讀她們的大學。像我來澳洲，人家會問我來這裡幹嘛，我就會說 this is my gap year。我在這邊，我只要講 gap year，她們就會知道我是學生，只是來這裡遊歷的。

(20140125，Ian 訪談)

gap year 是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對於他們為何進行打工度假的唯一解釋，而這樣的行為是源自於西方世界的，所以 Ian 在澳洲當地遇到有人問起為何而來這類的



問題時，他就會說「**this is my gap year**」來回答。使用這樣的回答其實是預設 gap year 是西方世界專屬的象徵，而他藉由打工度假正式為了實踐自己的 gap year，因此進入這個富含現代性的澳洲，使用 gap year 便能進入他們的文化脈絡，進而取得相同的文化體驗。

而 Isabel 更進一步用 gap year 來說明為何申請二簽是來自亞洲國家的人才會有的行為：

我覺得文化差太多，為什麼年輕的歐洲人都不二簽，因為這是他們 gap year，也許歐洲人旅行的意義跟亞洲人旅行的意義不一樣。因為我覺得一簽太少機會跟別的歐洲人聊很多，我覺得有點沮喪，一切都讓人失望。

(20130923, Isabel 訪談)

因為亞洲與歐美國家的文化不同，來自歐洲國家的年輕人做的是 gap year 的行為，因此一年就足夠探索這個世界。而亞洲國家的年輕人來打工度假並不是為了實踐 gap year，他們的目的不一樣，所以來自亞洲的打工度假者才會申請二簽。這看似單純比較的說明，卻從接下來的說明中能感受到 Isabel 藉此評價歐美與亞洲文化優劣的想法。Isabel 懊惜沒能多跟歐洲人互動，失去了與來澳洲 gap year 青年交流的機會，所以她很失望。失望是來自於沒有跟同樣來 gap year 的歐洲青年一起探索世界，因為跟她來自同樣國家的人幾乎都不是為了進行 gap year 而來的，所以她失望。她更進一步藉由具體接觸經驗來說明自己的失望從何而來：

後來我們去遇到超多不是為了錢，有些是正面的目標，是創業之類的，就是他要帶那筆 錢回來改變他的人生，或者是想要轉換跑道，到一定年紀想要出去看看，轉換跑道之類的，這兩種人真是超無聊的，可是台灣人幾乎都是這種。(20130923, Isabel 訪談)

無論是為了賺創業基金或是為了轉換跑道，甚至是想要在 30 歲前出來看看的台灣人，都不是為了探索世界而來的，他們的目的與 gap year 不同，相形之下庸俗許多。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其家中的經濟資本能夠



供應他們出國度假、遊學與留學，在他們來到澳洲之前或多或少有國外旅遊經驗，或者早已在國外生活一陣子。因此對他們來說，大部分台灣的打工度假者就是重複他們之前的經驗而已，這種容易達成的體驗生活方式與歐美青年那種 gap year 探索異地風情的情操截然不同，也不具有他們對於打工度假就是實踐現代性想像的態度。因而他們開始與其他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做切割，像 Ian 的態度就是一例：

我對澳洲沒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我是蠻現實的說我不是來旅行的。我的目的是我要在不熟悉的澳洲生活一年，我是來生活不是來旅行，這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

Ian 強調他並沒有對澳洲有虛幻的幻想，他是要在澳洲生活一年，直接進入澳洲當地的生活模式，為了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在這個國家繼續求學。而 Isabel 則是比較了打工度假者與具有 gap year 精神的背包客有何不同：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只是換到一個地方，過一模一樣的生活，你覺得去過那個地方，我覺得你不要污辱了在旅行的人。像我們在旅行的人旅行久了之後會把 traveler 跟 tourist 分開，因為我們覺得 tourist 是那種令你討厭的，traveler 是 traveler 是做不一樣事情的人，觀光客跟旅行者是不一樣的。對我們來說，是你會認識，你會跟當地的人一起生活，做一樣的事情。譬如說一起趕公車，一起去市場殺價，瞭解當地什麼東西盛產，什麼東西好吃。可是觀光客只是去拍照了。

Isabel 使用我們來界定了他們（擁有 gap year 精神的背包客）與其他打工度假者的不同，因為他們是 traveler，所以他們能夠跟當地人一同生活，採取同樣的生活方式，這與屬於 tourist 的其他打工度假者是不一樣的。這樣的不一樣不只是行為上的不同，更是思想上的巨大差距，這樣的不同與差距，正是其他台灣打工度假者之所以不能是 gap year 現代性想像的實踐者的主因，。



因此，我們從第 I 類的打工度假者對於打工度假意義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們藉由打工度假實踐 gap year 這種充滿現代性想像的行為，來取得西方現代性作為他們的文化資本。而因為擁有這樣的文化資本，因此他們得以在文化階級上向上流動，而且是跟歐美青年並駕齊驅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同樣使用打工度假來達成 gap year 的實踐。所以，出發前他們是擁有較高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打工度假者，回來後他們的體驗經驗轉化為文化資本，使得他們的文化向上提昇，並且推動他們進入更高的階級。

二、 積累文化資本：第 II、III 類的文化向上提昇

打工度假是一趟有目的的旅行，是為了累積文化資本所採取的行動，是經濟資本高但文化資本較低的第 II 類打工度假者以及經濟資本低但文化資本較高的第 III 類打工度假者的共同目標。第 II 類打工度假者雖然擁有較高的經濟資本，但其文化資本略低，使得其可能無法繼續維持或晉升中產階級的地位身份，因此透過經濟資本的消耗，他們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定居在大城市內，積極與外國人接觸與互動，進而提昇英文能力以及與外國人應對進退的經驗值。通過這樣的體驗資源，他們回到台灣後可以在論述或是職場上轉換這些資源成為文化資本，並且藉由實踐它達成或鞏固中產階級的地位身份。我們可從 Gill 敘述她前往打工度假的目的與實踐的方法中來看：

因為我是有目的的，我去是以我的目的為主，working holiday只是附加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增進英文能力，然後體驗一下國外的生活。

Gill之所以會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主要為了兩個目的，一是提昇英文能力，二是體驗國外生活。因為Gill在台灣從事業務工作遇到外國客戶時總是無法從容的應對，因此打工度假是讓她可以獲得如何與外國人相處經驗的方式。所以她對於工作的條件很清楚：



我只能在城市，只能在好的餐廳，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學到更多的英文和國外人的生活方式。我的目標只能在city，city之外，因為我不做黑工，因為如果做黑工，這個薪水我不如在台灣就好。接著是我要鎖定比較好的餐廳，或者是跟我上班的人是外國人，或者老闆是外國人。

Gill 企圖藉由打工度假取得與外國人相處的經驗，所以她只能在高級餐廳工作，因為她在工作中接觸到的也不是一般的市井小民，而是具有身份地位的客戶，所以唯有在高級餐廳內接觸到的客人才符合其想像的歐美客戶形象，與他們的互動才具有參考價值。而她試圖藉由打工度假獲得的文化資本，其比較的對象是留學歸國的同事們：

我的同事都是國外回來的，只有我是從基本開始學。同事都是國外回來，我們在跟客戶接觸時，我自己覺得似乎沒有跟同事一樣可以跟客戶這麼快就打成一片。第一個文化上的差異，我想說可以的話最好出國去了解外國人的文化，也許對我以後的工作比較有幫助。

即便 Gill 擁有的經濟資本頗高，但因為其文化資本較低，所以可能無法透過留學之類的管道達成與外國人相處的可能。而她的同事們因為留學歸國，所以具有跟外國人接觸的經驗，因此在與外國客戶上的相處從容許多。這樣的差距是 Gill 想要追上的，要達到與同事一樣的外國經驗值，唯有透過留學與打工度假才能有長時間的外國生活經驗，在前者可能性不大的情況下，後者便是 Gill 唯一可以採行的方式，只要與同事一樣，她或許也可以與客戶互動融洽，因此她的比較對象是她的同事，而她的同事就是她想要達成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代表。而 Gill 也藉由她回國後在職場的表現來像我們證明她的文化向上提昇：

我後來在跟我的客戶相處的時候，我很容易打入他們，跟他們聊天開玩笑之類的。很容易 catch 他們的想法，或是那些，我也不知道怎麼講，你知道業務有時候就是要靠第六感，就是你可以知道他們大概在想什麼，然後或者他們想要做什麼。也在開發客戶上有蠻大的幫助的。



回到台灣的職場上，Gill 確實地解決了出國前的瓶頸，跟外國客戶的應對更加從容，因此她認為她的確透過打工度假積累一定的文化資本，進而達到跟她留學歸國同事一樣的文化階級位置，擁有同樣的與外國人相處的能力，並且這樣的能力確實幫助她解決工作上的困境，使她得以順利升遷。

此外，對於沒有具體比較對象的 Oliver 與 Oscar 而言，他們仍舊是以晉升中產階級為目標，再加上第 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多為已有工作經驗的台灣青年，因此他們的文化資本累積多半展現在台灣與澳洲工作型態與態度上。

台灣工作就是很忙，很急的，急的要死阿。在外國工作，澳洲的生活步調其實是很悠閒的，把本分內的工作做完就可以。壓力其實還好，在台灣工作反而壓力很大。

Oscar 在訪談中論述了台灣與澳洲不同的工作態度，台灣的工作步調是急急忙忙的，這幾乎是亞洲國家的工作寫照。而西方國家給人的感覺是悠閒，卻能有效率的完成工作，並且經濟發展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因此西方國家是進步的現代國家，而台灣發展可能還不到位，因此 Oscar 藉由他曾經體驗過這樣的工作經驗與敘述，證明了他曾在外國生活過一陣子，並且曾經深入進入他們的文化生活之中。而 Oliver 更進一步的要將這樣的態度實踐在他在台灣的職場上：

（我）很嚮往國外的工作型態，所以我要把自己的 team 搞成那樣，就是熱愛自己的工作，沒有壓力的工作，但是你績效還是有出來，這在台灣很難做到。

這種屬於西方社會特有的工作型態是台灣缺乏卻很難作到的，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沒有在這種高效率卻輕鬆的工作環境內工作過，因此當 Oliver 在台灣確實使用了這樣的工作方式時，也代表了他擁有了這樣的文化資本。

第 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從具體的解決職場瓶頸，到在台灣職場中實踐外國的工作型態，這樣的成果都顯示出了他們成功地累積到一定的文化資本，並且藉由這樣的文化資本在工作場域中獲得實際的向上提昇。



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也有類似的轉換機制，雖然他們具有留學的能力，但並沒有留學所需的資金，所以透過打工度假才能讓他們在國外待久一點，體驗留學才能體驗到的生活方式。Rita、Nancy 跟 Leo 就是想要出國留學，但家中經濟能力不足以供應的例子。Rita 在訪談中提到：「之前想要出國唸書，因為沒有錢，爸媽也沒有很同意，所以就都沒有出去，所以有一點點遺憾，想說趁這個機會可以出去，邊生活邊學習。想要出國看一看，想要生活不一樣的感覺」，雖然她很想出國唸書，但沒有錢，所以她只好另尋其他方法。剛好打工度假可以滿足她想要生活不一樣的感覺，可以讓她一圓出國夢，所以她就到澳洲打工度假。Nancy 也是如此，「我有點想要出國唸書，可是又沒有那個錢。但我很想出去看看世面，看來看去就 working holiday 最適合我了。你沒錢還可以打工，所以我大三就決定畢業後就要去澳洲」。Nancy 沒有辦法出國唸書，找尋到的解決之道便是打工度假，想藉此出去見見世面。

對於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而言，雖然他們擁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但仍不足以讓他們鞏固現有的社會位置，原因出在於其家中經濟資本較少。因此他們想到的可以藉由打工度假來達成積累相關文化資本的解決方法，而這樣的態度也通過他們對澳洲旅遊的安排上展現出來。像是 Leo 認為「在我的角度，賺了幾個月前就有辦法旅行了，但對某些人來說，要賺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去旅行」，因為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獲得跟他們在大學的同學一樣的文化資本，透過打工賺錢並非首要任務，賺錢可以回國在進行，出國打工度假就是要用來積累相關文化資本，所以他們賺到錢就會出發去旅行，體驗異國風景。或者如上述藉由食宿交換來節省食宿開銷，進而更快進入度假的狀態，以便能夠有更足夠的時間獲得體驗資源。

第 II 類型與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揭示了透過打工度假累積文化資本的過程，透過類似的轉換模式，兩類型的打工度假者都成功的將打工度假的體驗經驗轉化為可供自身晉升或維持中產階級地位身份的文化資本，並且通過這種文化基本的累積，在他們的職場生涯以及認知中達到文化向上提昇的現象。



三、體驗即是向上：第 IV 類的升級經驗值累積

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的由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都偏低，所以身處在各種差距概念下，因此他們希望藉由打工度假來讓自己取得高於原本自身所擁有的事物。這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平常雖然有自費出國旅遊的經驗，但其家庭經濟狀況多半不足以讓他擁有到西方國家旅遊的機會，他們只能藉由出國打工度假來達成在國外生活的體驗。Allen 的經驗就是一例：

因為我以前就很想去國外走走看看，但因為我沒有錢，那時候剛好聽到有這個機會，從朋友那邊聽到的，以前同事有去。

礙於經濟資本不足的關係，Allen 即使從以前就想要出國也力不從心，而 Kiki 也有同樣著狀況：

其實在剛畢業的時候，一直就有在想說打工度假這件事。但因為剛畢業，學生很窮，我大學是就貸，想說要先賺一筆錢，才會想工作再出國。

同樣面臨經濟資本的問題，因此他們兩個都選擇了先工作存錢才找適當的機會出國的策略。而這樣的情形其實是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的共同背景，在軍中就接觸到資訊的 Webb 同樣也必須在退伍後先工作一段時間才有足夠的旅費能夠前往澳洲，Hana、Wendy、Yvonne 以及 Danny 都是，所以對他們來說，出國打工度假這件事本身就意義非凡，是他們周遭的親友不太可能做的。這樣的行為也讓 Allen 在朋友圈內展露出不一樣的形象：

像我現在的公司，我朋友就跟我說，很多人因為他家開公司，想要去他家上班他都拒絕，他會想找我過去是因為我以前在澳洲生活過，他覺得這種事情他辦不到。所以他覺得很多事情他沒辦法，但我可以去做，所以他把我找進去。

Allen 的打工度假經歷成為他找到工作的關鍵，也呈現出他在其人際網絡中脫穎而出的現象。



Wendy 則是藉由她在那邊所觀察到的現象來展現她曾經接觸過進步的西方國家的經驗，在訪談中她描述兩邊工作的不同，「在台灣就是沒日沒夜加班，但澳洲很早就下班。比較少看到他們在加班幹麻的，感覺比較懂得生活」。比較懂得生活的澳洲以及沒日沒夜加班的台灣，孰高孰低似乎顯而易見，這樣的差距也形成了她累積相關文化資本的經驗，並且與她仍在醫院拼死拼活還吊著點滴上班的同事有了區隔，那就是她開始不能接受這樣的工作，因此她接下來還想出國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型態與生活態度才是好的。Hana 也有同樣的觀察，她通過這樣的觀察，赫然發現台灣打工度假者的角色可能與外籍移工並無二致：

台灣人就會習慣性晚下班，這是一種文化，文化的不同，他們（義大利人）覺得亞洲人很奇怪。像他的話，他如果超時，或是時間超過，他就會去跟他（雇主）argue，我 pay 就是要多給我多少。可是亞洲人就不會去吵，就默默的接受。他就會覺得說亞洲人很奇怪，為什麼很多事情默默的接受。英文也有關係，第一個英文，再來就是文化。我覺得種族多少有點差，可能菲律賓、越南，外籍的到我們台灣，他們也是任勞任怨，我們看他也是以有色，也是稍微比較低階的感覺。

Hana 在這段敘述中帶領我們看到他們所作的比較，如何展示他們所累積的外國經驗。在 Hana 與義大利打工度假者的討論中，Hana 發現對於歐洲國家而言，台灣人任勞任怨、習慣性晚下班的態度代表的是一種低階的感覺，因為文化與語言排序較低，因此我們接受任何工作要求，這是歐洲人無法接受的工作條件，所以他覺得台灣人很奇怪。這番言論也讓 Hana 理解外國的工作型態與條件，進而發現了台灣與外籍移工在全球排序下可能相差不遠的現象，這是在台灣的親友無法察覺的現象，只有像她一樣走出台灣前往西方世界才能得到的。

即使他們必須工作才有足夠的薪水來支付旅行所需，因此工作時間就會拉長。有趣的是，雖然這類型的打工度假者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在打工上，平均幾乎超過八個月，但若問起「你認為你是偏向打工還是度假」時，他們多半都會回



答：「當然是度假」這類的答案。可知即便打工佔掉他們比較多的時間，在他們的認知中仍是較傾向自己在澳洲是度假偏重那頭的。因為對第 IV 類打工度假者而言，在澳洲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向上提昇的珍貴素材。即使在澳洲的生活跟在台灣並無兩樣，甚至還要更辛苦，但因為是在澳洲這塊土地上，所呈現的意義就與在台灣大不相同。因此在澳洲即使在附近的海邊走走或是去市區玩，都是一種西方的生活經驗。因為澳洲是一個陌生的西方國家，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城鎮，碰到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在台灣接觸不到，也造就了即使只是在週邊的鄉鎮玩玩，或是在假日的時候 BBQ，都是異國體驗與異國情調，每一個在澳洲的經驗都是打工度假才能得到的珍貴資源，也是台灣的親友得不到的經驗。

所以 Webb 才會說出這樣的一席話：「在那邊是一種不同的體驗，因為你在台灣不會體驗到這種生活，不會體驗到這種累的程度」，在台灣體驗不到的生活，甚至連累的方式都是只有在澳洲才能感受的到，這都是專屬於打工度假者的經驗。Hana 更是告訴我們打工度假對她的影響何在，「因為我在澳洲變成我喜歡交朋友，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我喜歡聊天」，這種大方交朋友的想像其實也是一種對西方的現代性想像，因為他們的開放。

Allen 更以打工度假前後的行為來形容打工度假帶給他的影響：

像我回來台灣，中間新加坡過境，我就是行李寄放，自己跑進去新加坡晃晃。我會覺得我以前沒辦法作這件事，現在可以自己幹這件事。因為我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由於打工度假，所以 Allen 獲得了獨自在異地生活的經驗，對於日後他到任何一個異地都能不再畏懼，可以自己自由的行動，這樣的成長也是只有到外國生活過的人才能有的成果。Danny 則是跟還未去過澳洲的台灣人相比，來凸顯自己藉由打工度假得到的可貴經驗：



像一些還沒有去打工過的，可能沒辦法像我們這樣，身上有帶一點錢回來，也認識一些國外的朋友，看到一些國外的事情，知道跟體驗到一些他們沒有體驗到的事情。

第 IV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因為身處的階級地位相對較低，擁有的經濟與文化資本也低於其他三類打工度假者，因此對他們而言，在澳洲的所有行動與所有行為都是使他們向上流動的珍貴體驗。而他們的向上流動並不是以中產階級或是更具現代性的西方想像為目標，而是與他們在台灣的親友圈互相比較產生的差異為依據。所以他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也常常使用「體驗過」這個片語，證明他們與台灣的親朋好友已經不再處在同一等級之中，而是確實地比他們多體驗了一些什麼，多累積了相關的文化體驗資本以及經濟資本，產生了較台灣親友圈高出一截的主觀評價。

第七節 小結

近年來，打工度假成為台灣青年走出國門的熱門方式之一，每年數以萬計的台灣青年懷揣著不同的目的與企圖前往海外，其規劃打工度假的方式及獲得體驗也不盡相同。通過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研究，我在本章將他們分為四種類型，並且從打工度假的各個層面切入分析，試圖帶領讀者瞭解打工度假者的異質性。這樣的異質性是來自於其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多寡所形成的不同，經濟資本影響了不同打工度假者採取怎樣的工作策略以及生活規劃模式；文化資本的高低凸顯了打工度假者對於社會網絡的依賴以及偏好哪些類型的工作。

文化體驗資本除了用來區分打工度假者的類型外，同時他也可以用來分析為何打工度假者不認為自己從事第一級產業的工作，可能正在進行向下流動的過程；反而讓他們認為自己藉由在澳洲打工度假所獲得的體驗，可以轉換累積成文化體驗資本的結果。這與 Rhacel Parrenas(2001)與藍佩嘉(2008)對於菲律賓移工在



移居國與地主國感受到社會地位下降的問題可能有點類似，同樣透過遷移獲得了足夠的文化資本，菲律賓移工認為自己或是其子女可以因而向上流動；而打工度假者認為自己可以藉由這樣的經驗轉換成的文化體驗資本讓他們與其他的打工度假者，甚至是在台灣的親朋好友有所不同。

但這有所不同並非一體適用，不同類型有不一樣的比較對象。對於經濟與文化資本較高的第 I 類而言，打工度假累積的文化資本讓他們與歐美青年的 gap year 產生共鳴，因而向上流動到充滿現代性的西方文化想像。第 II 與 III 類的打工度假者所企圖達成的流動便是向上成為或鞏固中產階級的地位，第 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透過經濟資本的消耗，將獲得的經驗轉換為可供積累的文化資本，因此進行向上流動。而第 III 類型的打工度假者則以文化資本來彌補經濟資本的不足造成的困境，藉由食宿交換等特殊的體驗方式來企及中產階級藉由出國留學所體驗到的在地生活。最後，經濟與文化資本都少的第 IV 類型則帶我們看到了凡事皆累積的文化累積方式。因為澳洲的一切都是在台灣的他們及其人際網絡所經驗不到的，諸如三倍落差的薪資、不同的工作態度以及異國風情等等，所以當他們描述他們獲得的體驗之時，就是與在台灣的親友圈做出區分，並且將自身放置於更高一層級的地位。



第四章 遷移經驗的性別化

本章主要聚焦於遷移與性別的關係，性別作為一個遷移中重要的變項，其影響跨越了階級與國界。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其選擇出國的機會以及面臨的問題、思考的邏輯會因其性別產生的限制而造成差異。這樣的差異對於打工度假者的遷移經驗有別於第三章的社會位置，也可以看出來自不同國家，卻有著類似思考脈絡的亞洲女性會如何想像打工度假，並且試圖透過國際遷移帶來怎樣的體驗與流動。從表六我們得知前往澳洲打工度假者多以女性居多。

表六 各國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之男女比例

| | 男性(%) | 女性(%) |
|-----|-------|-------|
| 韓國 | 56.1 | 43.9 |
| 日本 | 26.2 | 73.8 |
| 德國 | 44.7 | 55.3 |
| 英國 | 46.1 | 53.9 |
| 法國 | 52.2 | 47.8 |
| 義大利 | 62.7 | 37.3 |
| 荷蘭 | 49.3 | 50.7 |
| 加拿大 | 41.2 | 58.8 |
| 台灣 | 30.5 | 69.5 |

資料來源：Evaluation of Australia's working Holiday Maker (WHM) program (2009)

台灣部分資料來源：康文文教基金會⁷

因此，本章從性別與遷移出發，探討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的遷移動機為何，由女性經驗比較來觀看當代台灣女性的遷移主要目的。接著將以父母態度做切入，通過打工度假者對於父母提出要出國的打算，得到的回應做切入，展現台灣對於男女性別氣質以及生涯規劃的想像。此外，我也將分析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當地求職遇到的不同狀況，來觀看打工度假中的性別與求職難易度所帶

⁷ 財團法人康文文教基金會，在 2013 年 9 月 19 日公布針對打工度假所做的網路問卷結果，有效樣本數為 226 份。



來的結果。最後，透過訪談資料中對於在打工度假旅程中跨國戀情的敘事，分析不同性別對於遷移中的性抱持著怎樣的想法。

第一節 性別文化脈絡下的打工度假

在台灣各個角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裡居住著。有些透過婚配，有些則是來台工作，而她們多半是女性。在地球的另一端澳洲境內，聚集著世界各國的年輕人在此打工度假，她們或許是為了賺一桶金，或許是為了尋一個夢想實踐，也或許是為了永久留在澳洲，無論原因為何，這些停留在澳洲各個角落的打工度假者也多半是女性。因此，本節我們將分析個體動機在性別的影響下，形成怎樣的差異。又這樣的差異置放於台灣的性別文化脈絡下，對於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又有哪些不同的限制。

在台灣傳統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地位與身份是附屬於男性身上，並且依據其與男性的關係而定，「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成為女性的角色地位的依據。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許多台灣女性接受了現代西方教育之後，女性自我意識也隨之出現。象徵獨立、自主的單身主義女性逐漸在台灣社會中嶄露頭角，卻也承受著剩女⁸、敗犬⁹等污名。但並非所有的高學歷女性都抱持著單身主義，多數台灣女性仍有結婚的意圖。Kiki 在工作三年後便辭職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影響她急著出國的理由便是家庭與婚姻因素。「如果現在再不出發，感覺未來就沒辦法成行。因為除了家人，未來如果真的有要結婚的考量的話，我就會覺得這樣拖下去不行」，對於女性而言，婚姻作為生涯規劃的一部份時，很多時候也具有中斷的含意。踏入婚姻到子女能獨立自主，至少需花費 10

⁸ 剩女，源自於中國，指的是已過社會普遍認為的適婚年齡而未婚的女性。這裡的女性基本上以高學歷、高收入與美貌長相的 27 歲以上女性為主，因為擇偶條件較高，因此無法尋得理想歸宿，該字詞已於 2007 年收錄於中國教育部漢語新詞內。

⁹ 敗犬，源自於日本女性作家酒井順子在 2003 年所著《敗犬的遠吠》一書。作者在書中以敗犬自嘲，後被引用為形容超過適婚年齡（30 歲）仍未婚的女性。



年以上的時間，這段時間女性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空間。當這樣的外在壓力解除時，也過了打工度假的年齡區間。因此澳洲打工度假者的性別比例幾乎年年是女多於男，因為相對於男性可以藉由出差、調派等方式飛往其他國家，女性多半因為家庭因素而被這樣的機會排除在外，打工度假便成為她們結婚前出去看看世界的方式。

對於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女性而言，母國的婚姻制度、社會習俗乃至於勞動市場都對女性有諸多限制，為了破除限制，海外工作成了她們掙脫父權體制的管道（藍佩嘉，2008）。在台灣，即使女權意識高漲，但社會氛圍以及傳統觀念仍舊迫使多數女性必須進入婚姻。因此，打工度假對於台灣單身女性而言，同樣具有擺脫父母管束以及探索異國的手段。就如同 Yvonne 選擇打工度假的理由一樣：

我真實的想法講出來每個人都會笑阿，真實的想法主要是想逃離我媽的掌控阿，她管太多了。有時候家人給的過度的關心跟意見，會讓我感覺到有壓力。因為他們會把一個框框套在你身上，我想說藉由這個機會出來走走看看，讓自己到外地生活。

Yvonne就像菲律賓以及印尼的女性一樣，為了逃離家中的控管，選擇了海外工作來暫時喘口氣，同時，也讓自己出來走走看看。到國外探索成了台灣女性打工度假的主要動機之一，到國外看看進而累積語文能力，也是許多女性打工度假者用來說服父母的主要理由：

那時候其實當下我是跟我父母講說：我覺得人都要出去看看阿，趁年輕的時候，又剛好有工作，有筆積蓄出去，也不花到家裡的錢，我爸媽就說：不要花到我的錢都可以。我說我錢都自己出，我都自己來。我就跟我媽講說，我出去國外，看外面的世界，也當作練習英文，因為畢竟他是外語系國家嘛，也增強你的英文（20140129，Hana訪談）。

從Hana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在遷移的路途中阻礙通常高於男性，女性比男性更缺乏經濟資源，因此在起初的遷移資金上常需要更多時間儲存，因此台灣



的女性打工度假者多半需要先進入職場賺取足夠的資本後才能前往澳洲打工度假，Kiki跟Hana都是如此。

此外，在台灣社會中，女性畢業後開始工作時，也意味著隨時準備進入婚姻；工作上也受到性別影響，女性較難透過年資累計等方式在職場達成升遷。因此，對於台灣父母而言，女性打工度假者只要確保安全無虞的問題，通常不會面臨太大的阻礙。像是Gill因為之前便有海外出差的經驗，因此父母只有要她小心就好，並沒有太多的反對。但對於沒有太多類似經驗的女性，父母對於安全的疑慮便成為反對的依據。Hana剛跟家人提到想要打工度假時，得到的第一個回應便是：「這麼遠，妳一個人去喔？」。安全問題成了女性打工度假者遷移前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因此，有沒有伴影響了她們的遷移意願。

我覺得一個女生妳到那麼遠的地方出去，就是一個女生到那麼遠、陌生的，從來沒有去過得地方，一定還是要有伴拉，因為是女生（20140129，Hana訪談）。

Wendy同樣也是因為找到旅伴的原因，才驅使她前往澳洲打工度假。Boyd(1989)強調在研究移民網絡時，必須要置入性別觀點，思考移民網絡內各種變項是否會因性別而有所差異。對女性而言，遷移所冒的風險比起男性要大得多，除了資金籌措以外，另一個就是身體。台灣社會對於女性的身體應該如何保持與保護有一套論述，外交部在打工度假手冊上也耳提面命女性必須避免遭受性侵害，因此安全問題中含有的身體規訓其實才是影響女性打工度假遷移意願的主因。

安全問題並不會阻礙男性遷移，「因為基本上男生比較沒什麼差¹⁰」是多數男性打工度假者抱持的想法，而其父母多半擔心的層面也不在此，因此網絡作用對於男性打工度假者而言，在前期規劃出發時的影響力不大。

表六顯示，亞洲國家除了韓國男女比例較平均外，台灣與日本分別是近七成與超越七成的女性比例居赴澳洲打工度假國家的女性之冠。形成這樣的現象的主要

¹⁰ 20140424，Allen 訪談。



原因在於台灣對於男性的生命歷程想像與女性截然不同，台灣男性在畢業後多半必須先入伍，退伍後便踏上成家立業的人生道路。相較於女性將打工度假視為結婚前探索世界的管道，男性在婚後以及職場上所擁有的機會較多，打工度假並非其唯一且最佳的方式，因此來自父母的反對力量相對較大。

另一方面，女性因為其生命歷程中可能會有結婚以及生育等規劃，因此在職場升遷上也較難取得更好的職位。反之，男性因為被賦予養家的想像，加上不會因為生育等規劃離開職場，所以累積年資等職場升遷條件是其必須努力的目標。所以，打工度假對於男性而言，帶來的負面效益可能遠大於正面探索世界的意義。Leo 的父母在聽聞他計畫去澳洲打工度假一年時，「會覺得說這一年等於是出去玩，都已經當完兵了，當完兵的時候應該是好好找工作」，而對他這樣的計畫表示反對。而 Gill 身邊也有這樣的例子出現：

在我們 08 年的時候，幾乎沒有男生，因為好像他們說當兵再回去工作會有很大的問題之類的，那時候男生真的超少的，現在也許多一點。除了兵役之外，他們也擔心工作出路，我遇到的是這樣子。

因為退伍對於台灣男性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生涯轉折點，退伍後尋找工作進而成家才符合傳統男性應有行為的想像。許多工作要求男性役畢的同時，也象徵了男性即將邁入下一個人生階段。當男性選在役畢後打工度假時，可能會產生一至兩年的空白。

事實上，台灣目前對於打工度假的印象仍是負面大於正面，許多企業明列不歡迎打工度假的員工。1111 人力銀行曾經在 2012 年進行「企業進用海外經驗人才調查」，當中僅有 2 成 6 的企業會因為求職者擁有海外打工度假經驗給予加分，有將近八成的企業不青睞打工度假回國青年，甚至 Leo 也在訪談中提到「我是沒有拉，但我朋友有因為去打工度假的經驗而被拒絕面試」的現象發生，顯示打工度假經驗對於台灣企業而言，象徵的是不穩定等負面形象。而台灣父母多半抱持與 Leo 父母一樣想法，認為打工度假就是出去玩。因此，相較於女性，男性



更容易受限於將來出路以及生涯規劃，導致台灣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性別比例產生如此大的落差。而對這群男性而言，他們必須提出更合理的理由才能順利踏出國門，像是現代性追求、專業技能（如英文）的精進以及將打工度假視為替代留學方案等更具正當性的理由，來合理化他們的打工度假之旅。必須更合理化成為其努力的目標，所以他們在訪談中會更加強調他們獲得的體驗能夠如何實際運用於職場或是生活中，例如 Oliver 將澳洲的工作型態落實在團隊帶領以及 Allen 將自己能夠獨立在國外自由行歸功於受過打工度假的洗禮等。

然而，並不是所有男性都會面臨相同的處境，社經地位也必須與性別放置在一塊討論。害怕找不到好工作，或是中斷年資等焦慮多半屬於社經地位較高男性。從 Danny 的敘述中或許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瞭解：

Danny：以我們這些比較，我們這種打工的家庭，比較不會特別去想這個。做工仔的家庭，我們的想法可能就比較不是這樣。你剛剛講的那個是父母會想比較多，怕工作上面沒有找個好工作，繼續往上爬，需要時間需要年資。可是我們做工仔的家庭就不會這樣想，就覺得說你有找到比較好的，有比較好的出路，就做阿。（年資）可能是其他人比較會想的。我覺得某些家庭會想拉。

對於 Danny 來說，由於其社經地位較低的關係，在台灣並不容易找到普遍認知中好的工作。而其父母因為從事的是不穩定的土木營造業等行業，累積年資不在其工作脈絡之中，因此對於兒子企圖前往澳洲賺取比台灣高出數倍薪資的行為基本上不會反對，甚至認為如果這是條更好的出路，反而比留在台灣好。

另一方面，性別所帶來的限制也同樣反映在當打工度假期滿時，打工度假者選擇回國或是留下來上。對於女性而言，在台灣性別文化脈絡下她們要出走相對男性較為容易；然而，她們要留下來所要面臨的困難卻大於出走。



我那時候想要留在澳洲工作，我不要拿二簽，我要拿工作簽。他就說：

「不回來就分手」，所以我就回來，一年也夠久了。在台灣那時候的工作是業務，後來我回來是當助理，因為我的目標是六點下班，因為那時候我要結婚。但我後來沒有結婚，所以我後悔，為了他回來，不然我現在應該在澳洲吧。(20140125, Gill訪談)

由於婚姻問題，Gill 在男朋友威脅不回來就分手的情形下，放棄了澳洲餐廳老闆要幫她轉工作簽的機會，回到台灣走上符合女性生涯規劃的道路。為了完成終身大事，Gill 不僅選擇回到台灣，放棄在澳洲留下的機會，更為計畫結婚這件事情改變了自己的職務，甘願領較低的薪水只為了能夠在晚餐時間下班，過正常的夫妻生活。然而，最後婚也沒結成，澳洲也沒待成，這樣的狀況使得 Gill 至今仍在後悔。而我們也能由此看出女性在出國前面臨到的阻礙可能沒有男性來的大，但當他們想要留在澳洲繼續工作時，卻礙於理想的生涯規劃想像而必須要回國，選擇進入符合想像的生命歷程軌道上。

台灣社會中對於性別應有生命歷程的想像也影響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對於女性而言，打工度假被視為結婚前探索世界的方式，加上因為其生命歷程中可能會有數次中斷職場工作的緣故（如結婚、生育），在職場上升遷相較於男性來的困難，因此女性出國打工度假這件事所遭遇到的阻礙並不大。由於女性的身體受到道德規訓，因此社會網絡的有無對於女性遷移的意願扮演重要的角色，若不能結伴而行，父母與女性自身對於遷移將有更多的考慮。

然而，網絡的有無對於男性可能較無影響，但生命歷程對於男性的阻礙卻大過女性。台灣社會傳統上，男性在役畢後，就應該投入職場，並且早日成家，才符合台灣男性應有的想像。因此，其父母對於兒子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想法多半認為他們只是去玩，不務正業。而男性普遍在工作上積累年資以換得升遷的機會，如果中斷工作，或者是退伍與工作中間出現空白，對於男性的求職產生莫大的影響，因此男性因其生涯規劃遭受到的阻礙大於女性。然而，這樣的阻礙傳統



主要是以中產階級男性為論述對象，也並非適用於所有的男性群體。對於社會背景較低的男性而言，其工作多半不穩定或是沒有透明的升遷管道，因此累積年資等傳統升遷的方法並不在他們的生命經驗中。弔詭的是，女性在出走時由於台灣社會對其抱持著不同於男性的期待，使得她們的離開遷移相對容易；然而，在台灣社會的性別文化應有的想像下，她們的留下變得困難重重，因為她們必須回到台灣進入符合想像的生命軌道中。

第二節 困境轉變為獨立自主的實踐

澳洲打工度假每年吸引了上萬名台灣青年前往澳洲，他們在澳洲開展了短則一年，長則兩年的打工度假之旅。其中，有超過七成是女性。近代國際遷移以女性為主，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遷移到鄰近國家從事家務勞動或是照護工作。相較於外籍女性移工多半在地主國從事照顧產業等符合女性想像的工作，澳洲缺乏的是供應農場、工廠等體力性工作的臨時勞動力。有趣的是這種符合男性想像的工作，迎來的卻是數以萬計的女性打工度假者。因此本節將以澳洲當地求職所面臨困境的性別差異切入，分析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對於澳洲打工求職的阻礙的看法以及因應策略。

澳洲屬於畜牧社會，許多打工度假者所能從事的行業多半為體力性的第一級產業。這類的工作被歸類成男性的工作，即使女性能夠證明自己有足夠的體力勝任，多半雇主也傾向雇用男性。工作的分配受到性別隔離的影響，使得多數女性只能集中在符合女性特徵的工作中（England 1989, 1992b，引用自張晉芬）。男性的工作其特徵是機會多、工時長、工資高，因此許多男性打工度假者比起女性較容易找到工作且只要從事一份便可維生。然而，女性能找尋的工作類型較少，且大部分屬於包裝或收銀機之類傳統被視為女性的工作。相對於男性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工時短、薪水低，許多女性根本無法靠一份工作的收入餬口，而必須要兼



兩份以上的工作才得以達到維生甚至是存錢的目標。但就算以上對女性打工度假者較為不利的結構環境，還是不能阻礙大量台灣女性運用此一遷移管道進入澳洲打工。

即使女性企圖證明自己也能從事這類的工作，但多數雇主仍會傾向雇用男性。Wendy 對於求職便有這樣的心得：「男生會（比較好找工作）耶，像肉場感覺就是錢比較多，但肉場幾乎都不想要女生，因為都勞力」，這也是許多女性打工度假者面臨的問題。受到性別隔離的影響，女性多半只能尋找符合女性特徵的工作中(England,1989)，如收銀、包裝農作物以及服務業等女性的工作。然而，相較於男性的工作具有的機會多、工時長以及工資高等優勢，女性相對擁有的工作機會較少，且工時以及工資都較低。在這樣的情形下，相對於男性只要一份工作便可維生，女性必須要兼更多份工作來因應基本開銷以及達成存錢的目標。如同 Oliver 在受訪時提及：

女生只能做 cashier，收銀機的，女生又不會去搬東西。一個禮拜 20 小時，最多 40 個小時而已，女同事的比例蠻高的。女生還是有接其他工作，都黑工。

從 Oliver 的訪談資料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澳洲打工度假中女性其實是佔多數的，然而符合女性想像的工作卻不是澳洲最缺乏的勞動力類型，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平均每名女性所能分得的時數與隨之而來的薪資也就較低。因此，許多女性會額外接其他的工作來應付開銷，而這些工作的類型也大多屬於黑工，因此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陷入惡劣的勞動條件內。

即使男性與女性在同一個農場內打工，仍舊面臨相同的問題。Isabel 以她在草莓園的經驗為我們做了很好的說明：



我們女生幾乎快一個月沒有工作，可是男生跟女生在農場裡面做的工作不一樣，所以我男朋友一開始就有工作，他就有在賺錢。所以我幾乎是第一個月沒有工作，第二個月可能一個禮拜工作 12 到 15 個小時。我是到第三個月多才有在賺錢，可是我第三個月就賺了四千多。第四個月就一半，草莓季快結束。我們女生做的是包裝，可是男生可以下田、撒種子、插秧。同樣是在農場工作，女性面臨等工與缺工的時間相較於男性更長，男性從草莓季剛開始便可從事插秧、播種等耕作工作，在收成時也多半被分配到採摘的工作，到了草莓季要結束時也有後續的整田工作可以從事。相較於男性幾乎毫無間斷的工作機會，女性能做的工作只有採收後的包裝。同樣住在草莓園 share house 的女性打工度假者在等工時仍舊必須支付必要花銷，甚至時常出現寅吃卯糧的窘境。由於農場地處偏遠，為了解決這樣的經濟困境，在農場工作的女性無法像在城市的女性一般，透過身兼數職的開源，她們多半只能從節流著手，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交男朋友藉以減低或節省每日必要花銷。

很多台灣女生，馬上就跟房東搞在一起，房東也是華人。吃住不用錢，就有人包吃包住。不只我的住處有這樣的情形，我朋友之前去修車，有別的老闆問台灣女生為什麼會這樣子。去澳洲打工旅遊的台灣人真的很多。
(20140217，Oscar 訪談)

為了省住宿交男朋友，為了體驗、存錢去做性行為。（20140128，Nancy 訪談）

（女生在求職上）比較不吃香拉。都是仰賴另外一半，很多都會交，就感覺不錯，大家一起住，share 掉房租，或是男方出阿。像我們 shop 有一個台北女生，跟我們老闆都有一些（性）關係。（20140206，Oliver 訪談）



「為了省住宿錢而交男朋友」幾乎是每一個受訪者談到在澳洲的台灣女生時都會有的一席話，這樣的敘述方式一方面點出了台灣女性在澳洲打工度假普遍面臨到的維生困境外，也隱含了對於女性身體的道德規訓。女性移工的身體經常面臨道德管束與自我規訓，其身體也常常被視為國家領土的延伸，保持身體的純潔象徵著國土的不被侵犯(Constable,1997;Lan,2006)。因此，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在描述這群交男朋友的女性打工度假者時，都會帶有諷刺與貶低的意味，而用身體換取工作機會或是減低工作勞力強度的行為更是需要被譴責，其原因乃是因為這群女性對於身體不加以規訓的行為，某個程度上象徵了異國男性對於台灣的侵略，台灣女性交往外國男友的跨國戀情面臨到的污名化相似。

許多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當地的行為也被放大檢視，特別是與外國男性產生跨國戀情上。透過 Isabel 對於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的比較以及與他人談論台灣女性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在澳洲的跨國戀情隱含的國族意識：

去澳洲的台灣女生分兩種，一種是有想法，因為我之前認識一個很棒的台灣女生，他跟他兩個朋友一起去澳洲，他們打算工作兩年，要把他們的創業基金賺完回台灣，這種人真的太少，他們已經二簽要結束了。另外一種女生就是純粹只是花瓶，我覺得太多了，就是只想著要交外國男朋友的台灣女生在澳洲一堆。我之前有聽過其他男生講他覺得在澳洲最好把的女生是日本女生，再來是香港台灣阿。我覺得他們被種族主義，就是白人優越主義統治的太嚴重了。

對於 Isabel 而言，為了累積創業基金的女性是好的，是具有獨立自主思考精神，展現當代對於有企圖性的單身女性的風範。相較之下，前往澳洲主要目的為交外國男朋友的女生便不具有這樣的風範。這種花瓶女性除了沒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以外，也受到了白人優越思想的統治。這樣的行為並不能讓女性走出傳統的範疇，更加重了來自相對落後國家的形象，讓人清楚地感受到這群女性運用跨國戀情達到社會地位向上的企圖。



男性對於女性的跨國戀情的描述多半著重在經濟層面，並加以譴責的行為來自於國家領土被侵略的焦慮。而女性通過與這群經營跨國戀情的女性的比較則凸顯了自己相對較為獨立自主。相較於這群柔弱的女性不能適應澳洲辛苦的工作，因此藉由交往來減輕經濟負擔；其他的女性打工度假者從事這類勞力工作的行為恰恰證明了她們更加的獨立自主，不需要依靠男性也能在異國生存。

Sassen(1998)指出移民形成乃是因於全球化，由於資本的移動與勞動力的遷移，因此外國資本進入第三世界後，能夠快速且大量地動員當地的女性勞動力。而這些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女性，在製造一堆外資商品（如 Nike）時，也製造了他們對於第一世界的生活型態與消費文化的想像，促成她們想要前往海外工作的想望。這樣的想望在藍佩嘉對於菲律賓移工的研究便可清楚得知，對於菲籍女性移工而言，經濟固然是重要誘因，但更大的原因來自於對現代性的追求，即便海外工作的技術層級以及社會位置相對於母國較低，但透過工作所獲得的出國機會已經足以讓他們在親朋好友間抬頭挺胸（藍佩嘉，2002）。然而，對菲籍移工以及外籍配偶而言，出國工作主要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挹注家中經濟，現代性與獨立自主只是相應而來的副產品。即便海外工作使得女性能讓女性能夠透過賺更多錢來獲得父權社會下的自主性，但維生仍是她們的主要目的，自主性僅是伴隨而來的副產品。就像越南新娘選擇遠嫁台灣主要目的是為了挹注娘家，幫助家庭經濟。而菲律賓更因為強烈的家族觀念，出國成為一種自我犧牲，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優先考量，她們遷移到海外工作被認為是一種「家族生存策略」（邱淑雯，2003）。然而，對於台灣的女性打工度假者而言，獨立自主卻是其主要目的。

在第二章我們已經提到台灣打工度假者選擇打工度假作為海外探索的方式之一，是一種現代性的實踐。此外，打工度假也可用以象徵獨立自主。傳統對於女性的想像多半是柔弱，必須依附在家庭或是男性身邊，缺乏自主思考的個體。而打工度假卻能使得這樣的想像翻轉，建立女性獨立自主的形象。由於打工度假是實踐Gap year最佳的方式之一，而gap year代表的是離開舒適圈探索異地的行為，



因此對於個體而言，經由打工度假來實踐出自於歐美青年的gap year行為，除了可獲得現代性體驗資本，也是一種獨立自主的象徵，象徵他們從離開熟悉的台灣，在外國成功的生存並體驗當地風俗的行為中獲得了成長。

我覺得自己比較獨立，成長許多。在台灣的話是被家人保護好好的，沒有辦法有自己的想法，可是自己出來看之後，想法跟遠見會跟以往不一樣。
自己也比較獨立，可以自己一個人說走就走。(20140429，Yvonne訪談)

Yvonne 對於打工度假所帶來的回饋與多數女性打工度假者相似，她們大多強調打工度假後的自己比起之前的自己，甚至是比留在台灣的親友更加的獨立自主。這樣的獨立自主不只展現在自身給他人的感覺中，而是在想法與生活型態上都會有所成長。這裡的成長也帶有現代性的想像，象徵她們取得了更現代化的生活風格與思考邏輯，更含有「見過世面」的想像。

以獨立自主為主要的目的，除了通過離開舒適圈前往異地探索以外，上面所提到的不依靠男性在澳洲當地生活也是取得獨立自主經驗的手段。透過從事勞力性工作，這群追求獨立自主的女性打工度假者與怕累而從事性產業的其他女性打工度假者一比，前者的行為便成為了獨立自主的表現。然而，打工度假的女性也並非同質性地個體，如同第三章所述，打工度假者仍會受到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影響，導致工作與生活方式產生不同。對於經濟資本較好的女性而言，她們可以不用兼許多差，或者斤斤計較自己是否能夠度過明天。而對文化資本較好的女性來說，她們在工作找尋上也相對有利。

此外，她們也因為英文能力較好，可能可以與外國男性較為平等的自由戀愛。然而，對於經濟資本較低，或者是語言能力沒那麼好的女性而言，交一個外國籍的男朋友，代表的不僅是跨國戀情而已，也是一種經濟上的成本考量，讓自己的身體轉化為可供使用的資本，並且同時獲得與西方男性交往過得文化體驗資本。訪談資料顯示，女性打工度假者跨國戀情的對象並不完全是西方男性，許多是擁有澳洲籍的亞洲男性，特別是二房東多半為東南亞籍。因此，許多打工度假



青年才會在訪談時透露出她們的比較與批評，因為在台灣東南亞籍人士仍被視為是從事 3D 產業的下層階級。但無論是否有與外國男性產生戀情，對於女性打工度假者而言，打工度假所產生的困境對她們來說，仍是象徵著一種獨立自主的樣態。

第三節 台灣性別延伸的身體與婚配

文化上的動機也是驅動個體移動的重要原因，菲籍女性移工前往台灣工作的誘因之一可以是「皮膚會變得比較白」（林秀麗，2000），藉由移動到海外工作，這些菲籍女性移工不僅可以賺取高於故鄉數倍的薪資，也是購買更符合現代性的女性化身體想像。與黝黑的膚色相比，白皙的肌膚具有更現代性的身體象徵。藍佩嘉(2008)在菲律賓時，也遇到當地人前來觸摸她的皮膚，說「妳皮膚好白」，這樣的現象清楚地顯示了白皙肌膚帶來的現代性想像。同樣地，對於台灣的女性打工度假者而言，即使在澳洲從事農場工作必須曝曬在烈日下，也必須使肌膚保持白皙。在打工度假熱門書籍《打工度假聖經》中的攜帶物品清單中，便將防曬衣物列入其中。

（每一國的人都會包的跟村姑一樣？）沒有，就只有台灣人。你看每個人穿著都包緊緊的，全部都台灣人，這一車裡面都是。日本女生還好，沒有像台灣人包這麼緊，台灣人很怕曬傷。（20140129，Hana 訪談）

採草莓的薪水比較好，也是算件的，可是他要曝曬在 40 度以上的，你知道澳洲陽光很強。我是看到一個女的，曬得跟乾一樣，也沒有必要把自己搞成那樣。（20140125，Gill 訪談）

從 Hana 跟 Gill 的訪談資料中可以看出防曬對於保持身體的白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甚至增加經濟收入都不能成為使皮膚變黑的理由。對打工度假者而言，打工度假是實踐現代性想像的方式，獲得的體驗資本也能使她們更接近現代化想



像。然而，白皙的身體也是台灣對於現代性想像的一環，為了追尋現代性而使皮膚變黑，使得身體失去現代性象徵這樣的行為是不容許出現的。所以，普遍認知中的草莓園並非女性打工度假者的首選。事實上，符合女性想像的 house keeping 反而是許多女性受訪者的優先選擇。

那時候最想做house keeping，因為他在室內不用曬太陽，我想很多女生都會想要這樣，至少身體都是乾乾淨淨的。（20140429，Yvonne訪談）

只是這類型的工作多半座落在城市，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打工度假者而言，要取得這類型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難度。house keeping 工作對於台灣的女性打工度假者而言，無疑是維繫現代性象徵的身體最好的工作之一，其他如咖啡廳的服務生、餐廳服務生等也都明列在女性打工度假者受訪時提及最想要做的工作的前幾名，乾淨且不必曬太陽的工作更能讓她們保持符合現代性想像的身體。

必須注意的是，在這裡的現代性身體想像延伸台灣既有的性別想像。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高瘦白是當代美麗女性身體的象徵，而西方現代對於擁有黝黑身體象徵健康的想法並未進入台灣女性的現代性追求想像中。

而跨國婚配現象也受到台灣性別想像的影響，對他們來說，跨國移動除了可以讓在家鄉的無酬勞動變成有酬勞動外，跨國婚配更可讓她們達成向上流動。在菲律賓社會傳統中，女性可以藉由婚姻達到社會流動的功能，嫁得好不好可從丈夫提供向上流動機會的多寡判定。而跨國婚配現象中，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與第一世界的男性婚配，也是一種上嫁婚姻的方式。不一樣的是，在跨國婚姻中的社會位置流動是基於新郎與新娘出生國家在全球化下的位階高低判定（藍佩嘉，2008）。在全球化下，個體擁有的資本，如學歷等都有不同的換算機制。駱明慶（2006）在研究台灣女性與外國男性的婚配關係中指出，迎娶外國新娘的台灣男性多半教育程度較低於台灣男性教育平均值；而與外國男性結婚的台灣女性教育程度卻明顯高於台灣女性的教育程度平均值。外籍新娘多半嫁入台灣鄉村內，而外國新郎則集中在都會地區。由這兩點上來看，可以看出傳統的上嫁下娶放在全



球化脈絡下，是以個體母國的資源擁有多寡來決定的，並非僅僅是基於個體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個人擁有的人力資本。

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對於跨國戀情抱持的想法有著顯著差異，對男性而言，在澳洲當地與白人女性交往可能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我們可以從 Danny 跟 Allen 對於與國外女生交往的意義詮釋中得到解答：

沒有，那時候看到一些國外女生，會覺得可以跟他認識已經很不錯了。算奢望吧，沒有想說一定要認識國外女朋友，就是在路上可以跟他聊個天講個話，這樣就算很不錯了，是沒有想到那麼遠去。

(20140424，Danny訪談)

對朋友來說，(交到外國女朋友)他們會覺得我很屌，其實跟女生心態一樣，其實多多少少都有。(20140424，Allen訪談)

對於亞洲男性，西方女性身處在更具現代性、擁有更多資源的西方現代國家，與傳統台灣社會「男下娶，女上嫁」的社會文化產生出入。因為國家處在不同的全球位階之下，這樣的差異換算之下，屬於亞洲國家的台灣男性基本上無法高攀西方女性，與西方女性交往是一種奢望、一種可以用以炫耀的方式。同樣地換算模式也出現在女性打工度假者經驗裡，Yvonne在訪談中指出，許多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所交往的對象「幾乎都不是白人，但是他們的身份卻是澳洲籍的身份」，這與傳統對於跨國戀情導致的社會流動想像不同，即便交往的對象不是金髮碧眼白皮膚的白人男性，但與擁有澳洲籍的非白人男性交往也能具有同樣的效果，因為他們仍是與出身於全球位階較高國家的男性交往。

以動機作為切入，我們可以看到遷移是如何受到性別影響。不同性別的打工度假者面對遷移時，採取的策略必須放置在性別文化的脈絡下觀看。遷移對於女性而言，除了因經濟收入增加可能帶來的性別位置變動以外，對於移入國的現代性想像也是促使她們移動的主因。由於這群女性的身體受到現代性想像的規訓，



為了維持現代性的象徵，保持白皙的肌膚成為其義務。另一方面，跨國婚配現象同樣也拓展了遷移的可能結果，而這樣的現象必須置於全球位階下進行分析。除了個人動機具有的性別差異外，通過不同性別面對的阻礙，也能看出台灣社會的性別文化脈絡。

第四節 小結

性別跨越了階級藩籬，對打工度假的個體產生跨階級的影響，形成遷移經驗的差異。性別作為遷移社會學重要的變項，不僅是將女性放入其中，而是應就其性別所涉及的結構與社會文化脈絡一同討論，才能更全方面的看出遷移者的異質性。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有七成是女性，這些女性構成了打工度假的主體，與男性產生了怎樣不同的經驗。透過對於遷移社會學的性別分析，我們從遷移動機切入，討論經濟層面的動機所帶來的收入增加，可以提升女性在性別關係中的權力位置，進而改變既有的性別位置。文化層面的動機則讓海外工作與打工度假成為購買現代性象徵的途徑，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藉由防止皮膚曬黑來維持由台灣性別延伸出的現代性象徵的身體意象。此外，透過國際遷移，女性得以在結婚前出去看看，甚至獲得更多元的婚配機會。對於來自相對落後國家的女性而言，與地主國男性的跨國戀情也可能使社會地位向上流動。對於遷移社會學中各個性別面向進行分析之後，我們回到台灣的性別文化脈絡中做討論。

傳統台灣社會的對於性別既有的想像有相當的差異，傳統女性的角色隨著與家庭和男性的關係產生改變，到了當代獨身女性的出現雖然某個程度上撼動了社會結構，但相應而來的污名化論述仍舊帶出了對於女性生命歷程的想像。在女性的生涯規劃中，結婚與生育都可能是其離開職場的原因，因此女性在工作場上較不受到青睞，相對於男性升遷不易。再者，女性在進入婚姻之後便是一個轉捩點，數十年的時間無法離開家庭，也不像男性擁有出差等海外外派的機會，因此



打工度假是他們婚前探索國外的方式。從父母態度上我們可看出當基於身體道德規訓想像的安全問題藉由社會網絡解決時，女性在出走這條路上並未受到太多阻礙。反而是在澳洲當地的留下受到台灣社會對於性別的限制較多，多數女性打工度假者選擇回台灣走上符合想像的道路。相反地，男性礙於社會對於其生命歷程的規劃，反倒比女性遭受的阻礙更多，特別是在年資累積的焦慮會使得男性不容易透過打工度假探索世界。但這樣的現象並非普世男性皆然，而是一種基於中產階級男性的想像。

然而，雖然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的比例遠高於男性，但澳洲當地的工作卻是屬於男性的工作，因此女性在當地的求職容易受挫。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多半採用兩種方法來解決，一是藉身兼數職來達到維生與存錢的目的，二是交男朋友降低日常開銷。這樣的行動策略除了帶來了對於女性身體規訓的想像以及隨之而來的焦慮外，也成為部分女性打工度假者建立獨立自主形象的比較對象。相對於這群怕累、無維生能力的女性，靠著自己雙手在勞力性工作為主的工廠、農場工作的女性打工度假者顯得更獨立自主，這也正是台灣女性打工度假的主要目的。

因此，我在研究中指出打工度假對於台灣女性而言，具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首先，女性希望藉由打工度假完成結婚前去看看世界的想望；其次，打工度假也讓台灣女性的婚配對象有更多元的選擇，跨國戀情以及通婚也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關鍵。最後，對於女性打工度假者而言，無論打工度假的結果如何，她們都通過打工度假這樣的行為，取得了獨立自主的成長經驗。相較於菲越兩國的女性移動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家中的經濟，自主是隨之而來的副產品；台灣女性則以打工度假作為塑造獨立自主象徵的方式，進而區分出自己與其他台灣女性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度假同時也讓台灣女性的身體被置放在現代性之下，通過維持白皙的肌膚來與西方現代性做更緊密的連結。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中對於男性的分析相對較少，這可能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男性氣質的想像以及成就的實現方式。我以滾雪球的方式邀請受訪者之際，



女性幾乎沒有拒訪的情形，但男性的拒訪率高達 3 成，原因多半是不想提起或是曾經有不開心的受訪經驗。我認為對於男性而言，打工度假這樣的經驗本身便帶有矮化男性氣質的象徵。對於台灣社會而言，男性透過留學或是外派等工作方式前往國外工作，是符合台灣成就的想像。因此，男性受訪者在提及工作時，對於工作的敘述常會帶有象徵陽剛氣概的說法，例如「我們男生都做需要體力的工作」或是「工廠之類的不請女生，因為女生力氣不夠」等類似的字句在訪談中不曾間斷。然而，這樣的工作多半集中於藍領，對於男性也是一種貶低。像是 Leo 曾經提到女性有較大機會可以應徵上服務生，顯示男性從事體力勞動雖然一方面象徵陽剛氣概，但一方面也是象徵階級向下流動，這樣的焦慮，使得許多男性並不願意多闡述關於工作的經驗，甚至拒絕訪談。此外，從跨國戀情來說，我們也可知男性交往外國女性一方面會被認為很有能力，一方面卻不符合男下娶的現象。這樣國家位階與性別想像相互交織的結果，導致台灣男性不知從何談起他們對於打工度假經驗所獲得的抽象體驗，多半只能用獲得勇氣、實現體驗國外生活等更加抽象的字句，來證明自己通過打工度假成長許多。



第五章 結論

打工度假，對於台灣青年有著非凡的吸引力。而打工度假對於台灣青年而言，卻不單純只是打工或是度假，而是一種帶有文化想像的行動。本論文旨在研究台灣青年赴澳洲打工度假的動機以及其結果，釐清台灣青年甘願從事體力性工作也要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揭示台灣青年如何藉由打工度假來實踐現代性追求，並且獲得足以讓他們感受到階級流動的文化資本。用以回答本論文最主要的三個提問：台灣青年為何打工度假，為何傾向選擇澳洲的原因，以及打工度假者如何合理化他們的打工度假經驗。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近年來，台灣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在其畢業後，或是工作一段時間後去異國打工度假，在許多選擇當中，多數人青睞澳洲作為打工度假的目的地。這些人為何千里迢迢去打工度假以及為何多數選擇澳洲，其動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探討。從經濟動機層面來看，台灣當代青年勞動市場的情況越顯惡化，受到低薪化的影響，相對高薪的澳洲產生了經濟上的拉力，利誘台灣年輕人遠赴澳洲賺取高額的薪資。然而，從新加坡開放最低工作准證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僅有經濟拉力並不能完全解釋台灣青年的遷移行為。現代性與對西方國家的憧憬同時影響打工度假者的選擇。

對於打工度假者而言，在去除所有外在影響因素後，部份打工度假者選擇前往日本，是由於日本文化藉由大眾文化以及與文化共通性，使得東亞國家與日本產生較為親近的印象（五十嵐曉郎，1988；李文鐸，2002）。而部份則仍舊選擇澳洲作為打工度假居留地，其原因乃是因為澳洲作為現代西方國家之一，是台灣



青年獲得現代性與滿足生活在西方國家的想望的最簡單可到達的國家。雖然部份打工度假者會選擇歐洲，但同樣所屬西方國家，若直接前往歐洲、美洲等西方國家，勢必面臨更大的文化衝擊以及語言能力不足帶來的困境，而歐美西方國家象徵更高的現代性，也容易使得打工度假者卻步不前。因此，同樣屬於西方國家且現代性象徵略低於歐美西方國家的澳洲，便成了進入西方國家較為便捷的道路，這種帶有文化意涵的動機，驅使著台灣青年蜂擁而至澳洲。

為了追求現代性與實現對於西方國家的渴求，打工度假成為最佳的實踐手段。休閒本來是屬於上層階級的行為，當代中產階級模仿這樣的行為，並且強調獲得體驗用以炫耀自己的階級地位。休閒必須獲得體驗，體驗的時間必須被拉長才能轉化為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因此休閒展現出的是一種中產階級式文化消費。相對於中上階級採用留遊學的方式來延長在國外生活的時間，中下階級便採用打工度假作為拉長旅遊時間的手段。打工被轉化為體驗，體驗是中產階級式消費行為。此外，採用打工度假作為體驗生活的方式，本身便帶有實踐西方青年 gap year 行為的想像，而打工度假也被視為是實踐現代性最好的方式。因此，我認為台灣青年之所以選擇打工度假作為離開台灣的方式，其原因便是為了實踐現代性的想像，為了與歐美青年 gap year 取得類似的效果。而以澳洲作為工作居留地的原因除了高額的薪資外，更重要的是滿足對於西方現代國家的渴望，並且藉以取得進入更高層級歐美西方國家的門票。

移動之所以可能，除了驅動個人移動的動機外，網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人際網絡或是仲介，都是打工度假者在澳洲找工作的重要途徑。當人際網絡無法發揮功能時，甚至成為他人獲取金錢利潤的途徑時，仲介便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澳洲當地的仲介深入各個領域，他們不只幫忙找尋員工，也協助分類員工。他們依據語言以及種族來將打工度假青年放入不同階級的工作內，相對於來自西方國家的打工度假者，亞洲的打工度假者大多順理成章的被放入不需要英文也不容易跟西方人接觸的第一級產業內，這與台灣多數打工度假者在台灣的工作



類型與社會位置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澳洲仲介就像派遣公司，而雇主與要派公司相同。雇主雇用的只是勞動力，一旦產生勞資糾紛或工作傷害，雇主便將責任推給仲介，這也讓打工度假者如同免洗勞工一樣，通過打工度假這樣的美名來掩蓋被剝削的勞動力。對於打工度假者而言，儘管他們能夠清楚認知自己在澳洲當地所從事的是低階勞動，也明白自己處於被剝削的狀態，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正在向下流動。

形成這種狀況的可能原因有二，首先，因為打工度假是暫時性狀態，這樣的狀態並不會延續到他們回國，甚至在澳洲當地打工獲得的英文能力以及與外國人相處的技巧可能讓他們回國後向上升遷。其次，由於台灣青年同時扮演背包客以及勞工的角色，這種勞動中的雙重身份掩蓋了剝削的事實，而體驗將從事低階勞動行為所累積的經驗轉化為文化向上流動的必要資本。

因此，我們可知對於打工度假青年而言，澳洲打工度假從事的工作類型與勞動條件雖使他們經歷向下流動，但藉由轉化這樣的經歷而獲得的文化體驗資本，使得他們在主觀評價上認為自己向上提昇，藉以合理化自己的打工度假歷程。但並非每一個打工度假者都是採用一樣的合理化方式，如何合理化以及經歷了怎樣的向上流動，是取決於其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相互影響下的社會位置。對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相對較高的打工度假者而言，打工度假是讓他們更接近歐美青年 gap year 的方式，經由在現代西方國家澳洲的探索，可以讓他們獲得主觀感受上的文化向上提昇。而對於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僅有一者較高的打工度假者來說，為了維持或是晉升中產階級，藉由打工度假積極與西方文化與西方人做接觸所得到的西方文化接觸資本，讓他們在職場上確實能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最後，對於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皆低的打工度假者，打工度假本身就是一種區別他們與其親友圈的方式。因此，無論他們在澳洲獲得了什麼，前往澳洲打工度假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讓他們與在台親友做出區別，任何經驗都是珍貴的體驗資本，讓他們在親友間脫穎而出，成為更具現代性想像的個體。



打工度假除了有社會位置帶來的不同體驗之外，也會因性別產生不同的經驗以及限制。澳洲打工度假的性別比例以女性居多，佔了將近七成。許多台灣女性由於生涯規劃與性別想像，將打工度假視為進入婚姻前的放手一搏，藉由打工度假實現到國外生活一陣子的願望。而打工度假女性所面臨相對於男性更多的工作困境，也被她們視為實踐獨立自主所必須的經歷。然而，並非所有的女性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較缺乏的女性，面對到民生與工作上的問題比起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較高的女性而言更頻繁。因此，許多污名化女性打工度假者，認為她們將身體作為資本，交換住宿或是工作的批評，也是性別與階級交織的結果，而非專屬於女性。

另一方面，對於台灣女性而言，打工度假除了能夠獲得外國生活機會外，更是一種婚配自主的手段。台灣女性打工度假者若與當地澳洲人婚配，將能取得永久居留權，實現空間上嫁的可能性。就算沒有正式婚姻關係，與外國人交往過本身就帶有進入西方世界的想像。

相較女性，對於台灣男性而言，打工度假對於男性而言較具污名，也不甚符合傳統對於男性成就的想像。男性的性別想像與生涯期待反而縮小了其打工度假的機會，更帶有怠惰於工作的污名在其中。因此，男性打工度假者在形容其打工度假經驗時，往往會使用較多具有陽剛氣質的語句來描述其勞動狀況與行為。然而，由於男性較符合澳洲當地的工作需求與想像，因此當男性前往澳洲後，相較於女性反而更如魚得水。而從跨國戀情與婚配上來看，台灣男性與外國女性交往是相對較難以想像的，那是由於澳洲之於台灣在全球位階排序下排名在前，相較於與澳洲公民交往的台灣女性，符合傳統女上嫁的想像。台灣男性認為西方女性高不可攀，與西方女性婚配更顯癡心妄想，若有機會與西方女性交往，便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這樣的心態正好反應了國家在全球位階中的排序，如何使得上下關係在空間中展現。綜合以上所論，因為打工度假對男性有著更負面的評價，因此在受訪邀請時，男性拒訪的比率也比女性高出許多。



近年來，台灣青年接連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走出國門，打工度假對於台灣青年而言，是有效打破階級藩籬，使得在國外生活一陣子這樣的想望得以實現在中下階層。對於台灣青年而言，為了賺取更多的錢，也為了體驗國外生活，更為了累積文化體驗品味，他們遠赴澳洲，甘願忍受艱困惡劣的勞動環境。這樣的經驗，造就了他們成為打工度假的體驗者，累積了相當的文化體驗資本。透過這些體驗資本的累積，他們與他們所預想參照的群體產生區隔，產生了略高一等的主觀評價。

在文章中，我們看到打工度假做為 gap year 這個歐美現代性想像的實踐，回答了台灣青年為何選擇打工度假作為遊歷他國的方式。因為追求現代性，特別是西方現代性，打工度假青年多數選擇澳洲而非他國，最為打工度假的目的地。每個打工度假者有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大不相同，其社會位置如何影響他們前往澳洲的生活規劃以及度假模式，影響了他們用以合理化打工度假經驗的方式，也形成了不同的主觀評價。最後，女性人數高於男性人數的打工度假者，置身於台灣的性別文化脈絡下，我們看到的是女性與男性因為社會對其生涯規劃的不同，導致他們/她們出國的難易度有了落差；而在當地面對不利於女性的艱困環境，女性如何將之轉化為獨立自主的轉捩點，以及性別與社會位置交織下，女性身體作為資本，用以交換生活材料的方式會帶來怎樣的批評。藉由他們不一樣的合理化描述，以及不同性別所做出的不同行動，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打工度假者是一群異質性的個體。

打工度假者因為不同的動機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獲得了不甚相同的結果。從他們的描述與評價當中，我們可以了解不同的社會位置與性別影響其動機的型塑與打工度假的方式。這樣的影響又導致了他們在澳洲的打工與度假受到限制，進而產生不一樣的合理化方式。他們的動機與結果必須被放置在結構中觀看，進而找出影響他們的主要原因，而本篇論文便是以現代性、社會位置與性別作為主要的分析架構，分析不一樣的打工度假者與其所獲所得。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採用滾雪球的方式尋找受訪者，因此較缺乏以工作為目的而前往澳洲打工度假青年的意見，以及以傳統背包客形式遊歷澳洲的打工度假者的看法。且由於我並沒有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實際經驗，因此對於打工度假者的勞動意識分析以及工作條件的掌握可能有未盡之處，這留待未來其他研究者對這一方面做補充。另一方面，對於男性的訪問相對較少的關係，我並無法深入地掌握關於男性想法，這也是論文中最大的缺憾。

此外，礙於篇幅的關係，我無法對打工度假受訪者進行追蹤研究，希望未來有其他研究者能夠針對這一部份繼續研究。在我的研究中訪問到的受訪者，回台灣後產生不一樣的生活風格以及工作態度，其中以文化資本較高但經濟資本較低這類型的打工度假者最為有趣。在我研究中這類型的研究者，當他們回到台灣工作時，對於工作的忍受力變得十分低，打工度假前他們所能接受的工作條件與勞動環境，在打工度假回來以後變得不可忍受。我認為這是因為對於文化資本較高的打工度假者而言，他們覺得在澳洲從事體力性的工作就能獲得相對於生活費仍顯較高的薪資條件，但在台灣他們卻連從事白領勞心工作都未能獲得同樣的薪資水準，因此他們開始抵抗台灣的工作環境。然而，相對於經濟資本較高的另外兩類打工度假者而言，他們具有的能動性更低，甚至已經沒有出國旅行以外的出國機會與勇氣。所以，從他們的言行或是 facebook 動態消息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澳洲的回憶以及外國工作的憧憬，卻又因為經濟資本不足而受困於台灣，只好一個工作換過一個工作，或是對於工作採取得過且過的怠惰態度等台灣勞動條件適應不良的症狀出現。因此，我認為台灣政府應該積極解決台灣青年勞動市場惡化與低薪化的問題，使打工度假者在澳洲學習到的工作方式與態度能夠順利地與台灣接軌，進而影響並改善台灣的職場與勞動環境。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Antonio Tujan Jr 著. 黃國治譯，2006，〈勞工遷移、彈性化與全球化〉。《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唐山發行。

ETtoday 生活新聞(2012)，〈Google 美國總部直擊！五月天：Google 吃到飽是真的〉。12 月 2 日。

ETtoday 生活新聞(2013)，〈年輕人瘋「借錢」出國打工 「拼一周就可買 iPhone！」〉。9 月 21 日。

Peter Stalker 著，蔡繼光譯(2002)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離國出走」，台北市：書林。

Saskia Sassen 著，黃克先譯，2006，《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台北市：巨流。

Thorstein Veblen 著，李華夏譯，2007，《有閒階級論——一種制度的經濟研究》。台北：左岸文化。

Yes123 (2013)。放眼全球！九成三上班族有意出國工作。4 月 10 日。

中國時報 (2013)。借錢出國打工，青年貸很大。9 月 21 日。

王宏仁、張書銘(2003)，〈商品化的台越跨國婚姻市場〉，《台灣社會學研究》，第六期，頁 177-221。

朱敏(2010)，文化與「中產階級」旅遊消費行為分析，《魅力中國》，2010 年，第 29 期。

吳家瑋(2008)澳洲打工度假課的動機與體驗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所碩士論文。

呂昭瑩(2009)海外打工旅遊者跨文化經驗學習動機與其影響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所碩士論文。



呂美慧(2011)，台灣年輕族群參與澳洲打工度假之經驗與自我能力提昇。中興大

學行銷學系碩士論文。

巫佳芬(2010)打工度假者經驗學習歷程之研究。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

李欣倫、王哲彥，〈壯遊?台勞?—赴澳洲打工度假者之工作問題探討〉，《網路社會

學通訊期刊》，<http://society.nhu.edu.tw/e-j/109/A45.htm>。

杜億婷(2012)，澳洲打工度假：台灣青年打工度假者類型及影響其選擇之重要因

素。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理所碩士論文。

林秀麗，2000，《來去台灣洗 BENZ—從台中地區菲籍女性家戶工作者的日常生活

實踐談起》，台中：東海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林耿平(2009) 我思•故我在澳洲— 一趟打工度假之旅的看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

憩管理所碩士論文。

邱琡雯，2003，《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

國人赴澳洲度假打工之注意事項，外交部。2012/2/21。

張巧臆(2012)，打工度假旅遊者之自我成長與能力提升。南華大學旅遊管理系

張晉芬，2011，《勞動社會學》。台北市：政大。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海外生活體驗專案貸款自即日起受理申請，國際及兩岸教育

司，102 年 3 月 28。

陳雅玲（2007）。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商業週刊，1004。

陳輝立(2011)，〈經濟問題與社會責任：北台灣菲律賓移工的觀點〉，《輔仁社會研

究》，第一期，頁 51-72。

彭詩容(2010)，從空間流動觀點探討打工度假者跨文化適應與自我認同之研究—

以國人赴澳洲打工度假者為例。南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曾嬿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73-107。

-(2014) 低工資與台灣人才流失的困境，巷仔口社會學。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2/17/tsengyenfen/>。

黃承泰(2008)天主教耶穌聖心堂週邊菲籍移工的文化地景與消費空間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黃淑玲、游美惠，2007，《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台北市：巨流。

褚士瑩，2013，《比打工度假更重要的 11 件事》。台北市：大田。

劉怡伶(2012)，打工度假者人格特質、旅遊風險知覺與旅遊目的地決策之研究-以赴澳洲為例。銘傳大學觀光事業系碩士論文。

劉佩昀(2013)，工作 vs. 休閒？美國打工度假之動機、跨文化衝擊與適應。靜宜大學觀光事業系碩士論文。

澳洲打工度假背包客須知，外交部。民國 101 年 8 月 9 日。

藍佩嘉(2000)〈人際網絡與經濟活動的辯證：傳銷商的網絡建構、行動意義與權力關係〉。《台灣社會學研究》，4:1-50。

-(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168-218。

-(2002)〈階層化的他者：種族化的家務移工招募過程〉，《人籟月刊》，第 34 期，頁 36-43。

-(2005)〈飄洋過海來幫傭：外籍家務勞工的生命地圖〉，《台灣社會學刊》，2005 年 3 月號，頁 1-57。

-(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4:107-150。

-(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



英文文獻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295-310.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9). Evaluation of Australia's Working Holiday Maker Program.
- Boyd, Monica.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637-670.
- Constable, Nicole. 1997. Maids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Ithaca: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 Gurak, D. T. & Caces, Fe(1992). Migration networks and the shaping of migration systems. In Mary M. Kritz, Lin Lean Lim and Hania Zlotnick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150-17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ibria, N. (1990) Power, patriarchy and gender conflict in the Vietnamese immigrant community. *Gender and Society*, 4(1).
- Massy, Douglas S. (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383-413.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en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 Verso.
- Tan Yan, Sue Richardson, Laurence Lester, Tracy Bai, Lulu Sun. (2009) Evaluation of Australia's Working Holiday Maker (WHM). Flinders University.



Hondagneu-Sotelo, P. (2003). Gender and immigra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introduction. In P. Hondagneu-Sotelo (Ed.), *Gender and U.S.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trends* (pp. 20-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 2013/6/30 。



附錄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 名字 | 性別 | 年齡 | 學歷 | 出國基金 | 工作經驗 | 打工度假期間 | 澳洲打工工作類型與找尋方式 | |
|---------------|----|----|----------|-----------------|-----------------------------------|--------------------|---------------|---|
| Wendy | 女 | 26 | 私立護理科 | 工作存錢 | 醫院護士，底薪 28,000。 | 2013/4- 2013/11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朋友介紹 |
| | | | | | | | 類型 | 港式飲茶餐廳服務生、水果農場 |
| Oliver | 男 | 34 | 公立科大水土保持 | 家中援助 | 保險業務員(出國前後) | 2010/3- 2011/3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仲介、網路、朋友介紹 |
| | | | | | | | 類型 | 有機超市 |
| Rita | 女 | 28 | 國立物理系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公務員 回國後：公務約聘 | 2012/4- 2013/3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仲介、上網、HelperX |
| | | | | | | | 類型 | 酒廠裝箱、葡萄園剪枝、食宿交換、cosplay 展場工作、飯店 housekeeping、shopping mall 販售 |
| Kiki | 女 | 26 | 私立日文系 | 工作存錢 | 日代理公司業務助理 月薪 28,000。 | 2013/11~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朋友介紹 |
| | | | | | | | 類型 | 葡萄園、飯店 house keeping |
| Ian | 男 | 25 | 國立社會系 | 借體驗生活貸款(拒絕家庭援助) | 家中駕訓班當教練 | 2013/11~ | 方式 | 掃街丟履歷、開車找、仲介、朋友介紹、網路。 |
| | | | | | | | 類型 | 按摩員 |
| Nancy* | 女 | 26 | 國立運管系 | 打工存錢 | 回國後在台灣從事國際貿易 | 2010/9- 2012/11 | 方式 | 朋友介紹、Wwoof 打工換宿 |
| | | | | | | | 類型 | 水蜜桃農場、馬場、餐廳、雪山洗衣部 |
| Gill | 女 | 35 | 私立保險與貿易科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電腦業務 回國後：業務 (年收超過 70 萬) | 2008/4- 2009/4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朋友介紹、網路、 |
| | | | | | | | 類型 | 壽司店服務生、草莓工廠、餐廳服務生 |



| | | | | | | | | |
|----------------|---|----|---------------|------|---|--|----|---|
| Hana* | 女 | 30 | 私立資管系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 貿易公司業務 回國後：保險業經理 | 2010/4- 2011/1 2011/6- 2012/5 | 方式 | 網路、仲介、朋友介紹、老闆引薦、掃街投履歷 |
| | | | | | | | 類型 | 草莓園、桃李工廠、龍蝦廠、亞洲餐廳黑工、交換食宿、冷凍食品、house keeping |
| Oscar | 男 | 25 | 私立資工系 | 家中出錢 | 無 | 2013/5-9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朋友介紹、網路 |
| | | | | | | | 類型 | 餐廳服務生、超市補貨 |
| Leo | 男 | 26 | 國立社會系 | 家中援助 | 回國後：餐廳服務生、攝影助理 | 2011/11- 2012/11 | 方式 | 掃街投履歷、網路、朋友介紹、仲介、開車找 |
| | | | | | | | 類型 | 廚房助手、洗車、草莓園 |
| Isabel | 女 | 25 | 國立外文系 | 家中援助 | 出國前：無 回國後：人資助理 | 2011/9- 2012/7 | 方式 | 投履歷、仲介、朋友介紹 |
| | | | | | | | 類型 | 咖啡廳服務生、草莓農場、 |
| Danny* | 男 | 31 | 私立夜工專 機械系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運輸司機 (27,000-30,000) 回國後：暫時無業 | 2011.6- 2013.8 | 方式 | 朋友介紹、網路 |
| | | | | | | | 類型 | 草莓農場、藍莓農場 |
| Allen* | 男 | 32 | 私立科大應 外系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 證券公司櫃台(22,000) 回國後： 磁磚行(25,000) | 2011.5- 2013.3 | 方式 | 朋友介紹、上網 |
| | | | | | | | 類型 | 草莓農場、藍莓農場 |
| Yvonne* | 女 | 32 | 私立科大企 管系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人資助理 | 2009/8- | 方式 | 網路、朋友介紹 |
| | | | | | | | 類型 | 海鮮工廠、house keeping、 |
| Webb* | 男 | 27 | 私立科大保 險金融系 | 工作存錢 | 出國前： 肉廠(28,000-70,000) 回國後：自由業 | 2012.3- 2014.3 | 方式 | 網路、朋友介紹 |
| | | | | | | | 類型 | 草莓農場、藍莓與覆盆莓農場 |

*為有二簽經驗



附錄二 訪談大綱

一、出國前的工作

1. 出國前有工作嗎？
2. 什麼類型的工作？
3. 大概作多久？
4. 薪水大概多少？

二、出國前

1. 什麼時候想要出國工作？/為什麼會想出國打工？

2. 當時接觸到的管道是什麼？

3. 為什麼會選擇澳洲？

如果沒有簽證跟語言問題的話，依舊會選擇澳洲嗎？如果不會的話，想去那個國家？

4. 從哪些地方蒐集資料？（朋友、網路、仲介、其他）

5. 有計畫一起要去的人嗎？家裡/朋友有人有去過嗎？

6. 從你蒐集的資料以及你自己對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

有想要達成的目標？

7. 大概準備多久？準備了哪些東西？帶了多少預算？

8. 出發前有先預定住宿地或工作嗎？大概預定多久？

9. 第一站飛哪裡？有預先安排行程或計畫要去哪裡玩嗎？

三、在澳洲當地

1. 抵達後多久開始找工作？

- 1-1. 如何找工作？

（網路、自己投履歷、朋友介紹、仲介：華人還是當地仲介所）

- 1-2. 使用過後你認為哪一種比較有效？哪一種找的工作比較好？

2. 做過哪些工作？



- 2-1. 薪資、平均時數
- 2-2. 黑工/白工/灰工
- 2-3. 有同工不同酬嗎
- 2-4. 找工作有沒有設定條件？或是有沒有哪一種工作一定不做？
- 2-5. 找工作有沒有遇到困難？有沒有找工作遇到的特別經驗？
找工作的難易度如何？

- 2-6. 一週大概的花銷多少？可以詳細說明嗎？
3. 大概工作多久後會去玩？如何計畫？
 - 3-1. 你認為你工作跟玩樂的比重如何？事實上是如此嗎？
 - 3-2. 旅行有結伴嗎？跟哪些國家的人呢？

四、其他

1. 就你觀察到的，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在背包客當中，你都遇到哪些國家的人呢？哪些國家的人多呢？
3. 你/妳在當地有交往對象嗎？那個國家的？現在還在一起嗎？
4. 有印象深刻或特別的經驗嗎？（主要針對種族歧視）
5. 有觀察到什麼樣特別的現象嗎？（性別、國家）

五、二簽

1. 為什麼想要二簽呢？
2. 如何集二簽？
3. 有遇到哪些困難或阻礙嗎？
4. 二簽時做了哪些工作？

六、回國後

1. 現在從事哪種工作？找多久？薪資大概多少？
2. 有將打工度假經驗寫上履歷嗎？對找工作有沒有影響？
3. 還有計畫出國打工/工作嗎？